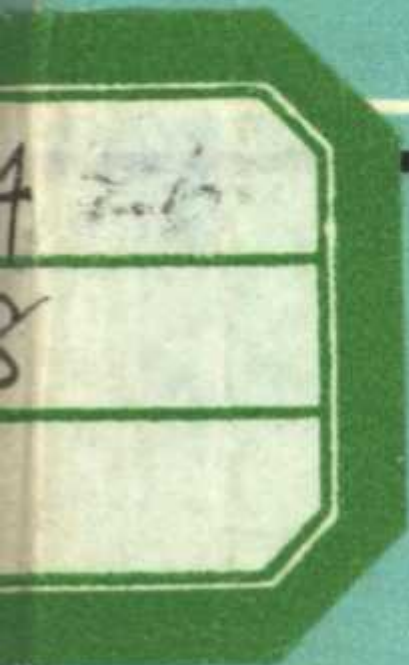


# 阿 明

字社

[英] 朱迪思·利斯托威尔 著





##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叙述乌干达总统阿明由士兵到总统的经历的小册子。它通过描述阿明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乌干达国内的两政变、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一些情况；也反映了乌干达的对外关系。本书对于乌干达和英国的矛盾，也提供了若干历史背景，所述驱逐“亚洲人”（即持英国护照的印度、巴基斯坦人）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乌干达人民反对英帝的情绪。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乌干达及非洲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朱迪思·利斯托威尔是一个出生于匈牙利，求学于伦敦，常为一些广播电台写些有关非洲和东欧情况报道的女作者。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偏见，使她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乌干达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必然后果；更看不到今天广大非洲人民团结反帝的斗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者不谴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却把这一切归咎于某个人的无知、寡信和残暴，这说明她的唯心史观，也说明了她的政治态度的错误。此外，本书内容中，还存在其他的错误观点。希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平等的背景	5
第二章 从小兵到少校	12
第三章 统率	19
第四章 初入政界	28
第五章 和奥博特的最后对抗	41
第六章 第一年	55
第七章 被嫌弃的亚洲人	73
第八章 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	87
第九章 阿拉伯人来了,亚洲人走了	98
第十章 未遂的入侵	110
后记	125

## 前 言

1969年2月，我第一次会见伊迪·阿明·达达将军，当时我受英国广播公司的委托，正在为一套广播节目搜集关于乌干达政局的材料。这次会见，是在古卢为贾纳尼·卢武姆牧师出任北乌干达圣公会主教所举行的盛大就职典礼的时候。除了奥博特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外，我们都呆在当地旅馆里。宴会后，我被介绍和其他客人相见。一位照料我的新闻部官员对我说，“利斯托威尔夫人，请你来见见陆空军司令阿明将军。”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位身材魁梧、目光敏锐的军官的笑脸。他邀我去喝咖啡。他是个彪形大汉，但是他那双美丽纤细、十指尖尖的手却吸引了我。

我不记得他用缓慢、谨慎的英语说过什么有意义的话，除非是说“我喜欢英国人，他们是好人，文雅的人”。“文雅”这个形容词出自一个非洲军人之口，令人感到意外。越来越多的人坐到我们桌前来了，每个人都想和这位将军聊聊。我被挤到了第二排，审慎地走开了。

次日，我们都去迎接奥博特总统的飞机。在小小的机场上，阿明将军站在一群阿乔利舞蹈演员前面。新闻部的那位青年人向我解释说，他们以前是皇家舞蹈演员，自从弗雷迪国王(爱德华·穆特萨爵士二世)被逐后，人们应当称他们为王室舞蹈演员，而不再叫皇家舞蹈演员了。“阿明将军亲自带头

攻打门戈山的王宫，”他想了一想之后补充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为了主教就职典礼，专门搭了一座典礼台，台前有一个细长的金色十字架。台对面，有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看台，与典礼台形成了一个大圆场子。典礼台上覆盖着鲜艳夺目的东西，宽阔的红地毯从典礼台的台阶开始，一直铺到圆场的入口。参加典礼的，有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族的显贵，以及陆军和警察的高级军官。我和其他记者一起端坐在由三条无靠背的长凳组成的记者席上。但是从这里却能很好地观看他们的到来。

突然，一个身穿黑袍的牧师从典礼台的台阶上跑到我身旁的一个妇女面前，气喘吁吁地问道，“你带着圣经没有？”她答道，“我还真带着呢，给你。干什么？”“我们忘了带圣经，我们没法举行就职典礼，如果没有……”那个牧师显然定心了，飞步奔回典礼台。我的邻座原来是那位慌慌张张的乌干达教会代理区干事的妻子，她跟着我一起乐了。

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恩祖布加阁下到来时，出现了一种我感到是最不协调的气氛，虽然典礼是由很注意威信的非洲人经办的。当地军乐队奏起了当年哈布斯堡皇朝的颂歌：“上帝保佐弗兰茨皇帝，我们的好皇帝弗兰茨……”我几乎怀疑我的耳朵是否听错了。然后我猛然想起，海顿的这首庄严的曲调已经改谱列入《古今赞美诗集》了。随着汗流浹背的乐队的铜管乐声，我暗自哼着：“万古磐石为神基，平安无扰保安息。”即使在非洲烈日之下，这个调子也完全适合这种头戴法冠的基督教主教们的集会的。

典礼根据古代宗教仪式进行，简单而又严肃。后来，奥博特总统为新主教举行了四百人的招待会。会后，我们回到圆场观看部族舞蹈。

阿乔利人头戴采色缤纷的羽毛，先登场演出。接着是各个北方部族和很多南方部族的舞蹈。一群舞女绕着圆场跳跃，上身戴着用离奇古怪的颜色和材料制成的乳罩——以前他们是裸露上身的。这时，一位侍从副官邀我去和奥博特总统坐在一起。我向奥博特总统赞美了这个灿烂壮观的场面。他用生硬但颇为精确的英语回答说，“你知道吗，当我还是个学童的时候，不仅不准我们做这样野蛮的跳跃，而且一旦被发觉，就马上开除？”我很快地估计了一下说，“那不会在三十多年前……”“不到三十年……，”奥博特博士微笑着回答。

不一会儿，我站起来打算走了，但是总统挽留我继续在台上观看舞蹈，在这里要比记者席看得清楚些。我在右边第三排的末端坐下。突然，我听到一种故意要人听到的耳语声，“你见到了阿明将军？”我看不见说话的人，事实上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对我说的。

“夫人，是的，我是对你说的。夫人，你见到他了吗？”这个非洲人说话的声音响了一点。某种东西告诉我不应回头张望，我就尽可能用正常的声调回答说，“我见到了，昨天晚上我见到了他。”“那就再去看看他，你会听到更多有关他的事情。”

我溜到典礼台的后部，爬了下来。我无法认出那个神秘的说话人，我想找一位知道将军在哪里的军官。我又见到了他。他正在喝啤酒，其他军衔的一些军人围住了他。他松了

领带，解开了上衣扣子，不时拍拍人们的后背。他仰头哈哈大笑，军人们也跟着笑，他们谈笑得痛快极了。

我猜想，这些军人一定是北方人，可能是兰戈人或阿乔利人——那就是说，奥博特的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两个部族并不是一直友好相处的。阿明将军却在这里和这些人一起喝酒，寻欢作乐；在总统的阵营里结交朋友。据我看来是很成功的。

1972年2月，我再次见到了阿明将军，这时我才理解那位从未见过面的耳语者想告诉我什么话。

## 第一章 平等的背景

伊迪·阿明·达达将军知道他出生于与苏丹、刚果接壤的乌干达西尼罗河行政区靠近科博科的一个小村子里，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的。这并不奇怪；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总统和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都不知道他们的出生日期，甚至可能不清楚他们出生在哪一年。伊迪·阿明说他四十六岁，就是说他生于1926年，但是，他们家的富有观察力的邻居，象很多非洲人一样具有了不起的记性，认为阿明可能是生于1925年。

阿明祖先的世系是不容置疑的。他是卡克瓦族人，虽然他母亲属于与该族有血缘关系的定居尼罗河一带的卢格布拉族人。大部分卡克瓦人居住在苏丹，其余的居住在扎伊尔（原刚果）。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因为在十九世纪，殖民地统治者就在某些欧洲官衙门里在非洲地图上乱划界线，根本不管也不关心这种做法将意味着把一个部族划入两个或更多的国家。

卡克瓦人认为他们最初来自北方。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部族这个词。卡克瓦人决不会问：“你是哪个部族人？”但是他会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卡克瓦人极重人品，不重身分或地位。他们没有酋长，也不承认部族领袖。根据这种传统，阿明自幼的教养就使他相信所有的卡克瓦人都是平等的，不过有些人由于不幸或残废，才不得不给比较走运的人当奴仆。



这些为数较少的社会成员叫做“杜比”。雇用“杜比”的主人必须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在他们娶媳妇的时候给女家送聘礼。他们如果和自由的卡克瓦姑娘结了婚，就能恢复自由人的地位。

但是，一个没有酋长的非洲社会也有不利的一面。在乌干达南部班图族中占多数的巴干达族人中，一个酋长的总部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部族生活的中心：法庭、社交中心、俱乐部、食堂、新闻社、药房和学校或学院，其范围取决于该酋长的重要性。父母把孩子送到酋长家里去当男仆或女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提拔，才能受到担任负责工作的培训。阿明得不到这种训练，因为卡克瓦族没有酋长。他最近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充分说明，他必须从一个农民的背景不经任何封建性的中间准备阶段，一跃而进入现代世界错综复杂的政治活动中去。因此毫不奇怪，他会犯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笨拙的和任性的错误。他把耳朵贴地，就知道自己的人民需要什么——他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理解不了欧洲人的反应，而对于这种反映，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穆干达人<sup>①</sup>却比较容易体会。

此外，卡克瓦族是一个有自尊心的部族，具有朴素农民的自尊心。伊迪·阿明具有双重的自尊心：农民的自尊心和军人的自尊心。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拒不承认他时，他为什么感到那样愤慨和屈辱。

伊迪·阿明从小耳濡目染的宗教和他的部族一样单纯。

---

<sup>①</sup> “穆干达”是巴干达族每个族人的称呼。“布干达”是地区名称，“干达”是相应的形容词。

卡克瓦人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恩古莱索”，即天上的上帝。这位上帝从天上降下一个人来教人们如何种地。还有一个恶神名叫“恩古莱特”，他带来疾病，但是可以用献祭和敲鼓的办法来祈禳。卡克瓦族还有一种教叫做“雅康之水”——雅康是“舅父”的意思。这个教的教友分高、中、低三级：高级拥有“雅康之水”，中级可向高级购买此水，低级仅能参加集会。阿明在青少年时代参加过这些集会，可能学会了制造“雅康之水”的方法。它是用一种从水仙属植物中取得的名叫“卡米奥乔”的药物配制的。卢格巴拉族——阿明母亲的部族——从卡克瓦族那里得到了制作这种水的秘密，把它称为“狮之药”。“卡米奥乔”是一种猛药，会引起兴奋和激动，剂量用大了会导致癫狂。

阿明的父亲是个农民。阿明喜欢谈论他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年轻时，我得放羊、挑水、做饭，甚至晚上还得苦干，给父母挣钱。”这完全与肯雅塔和尼雷尔的童年一模一样，虽然肯雅塔出身于名医家庭，尼雷尔是酋长的儿子。阿明的父亲在西尼罗河省的极肥沃的褐色土地上种地。假如西尼罗河省能采用现代的耕作方法，就可能成为非洲粮仓之一。当地大量生产的主要农作物有：玉米、穆子、花生、白薯、芝麻、木薯。卡克瓦族喜爱蜂蜜，所以也养蜂。

阿明童年时代所住的房子是卡克瓦族的典型房子。用柳条编成帘子，涂上泥，再抹上水泥。如果白蚁蛀蚀了帘子，泥土还是很牢固的。他父亲的粮库也是用柳条编的，搁在立石或硬木的座子上。象许多非洲人一样，他们的饮食是单调的。阿明每天只吃一顿饭。象很多居住在尼罗河附近的人一样，

卡克瓦族在上世纪末欧洲人来到之前，一直是裸体的。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很多人还只围一块遮羞布进进出出。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当阿明正在成长的时候，一个卡克瓦族的求婚者不仅要拿出聘礼，还要为他未来的丈人耕种或盖粮库。在这期间，未来的新娘由她妹妹陪同，跟求婚者一起住在另外的房子里。直到求婚者拿出全部聘礼，新娘才被涂上香油，送到求婚者自己的房子里去。卡克瓦族盛行一夫多妻制。阿明的父亲成了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基督教徒，这从两点看来是极不寻常的。第一，在十九世纪末，卡克瓦族经常受到来自苏丹北部的阿拉伯穆斯林奴隶贩子的袭击，深受其害。第二，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在尼罗河一带讲尼罗特-哈米特语人中间非常活跃。在苏丹内战期间，有很多关于维罗纳神父们的传说。他们对当时南部叛乱者阿尼亚尼亚族有巨大影响，而卡克瓦族同阿尼亚尼亚族有着种族上的密切关系。但是阿明的父亲想要有四个妻子，根据穆斯林的信仰，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阿明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乌干达人，同四个部族的人结了婚。他的第一个妻子西阿玛是卡克瓦族，第二个妻子诺拉是穆尼安科累族，第三个妻子萨拉是穆索加族，第四个妻子凯伊是兰戈族。阿明至少有十五个孩子，对这些孩子他都很喜爱。去年9月，为了庆祝三岁的儿子摩西的生日，阿明带着他作了一次重要的边防视察。穿着全套突击队员军服的孩子，受到热烈拥护将军的乌干达军队的高声欢呼。

象今天大多数非洲人一样，阿明希望他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机会得到一个赚钱的职业。但是，为了达到他建立



一个统一的乌干达的目标，他要使他的两个儿子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目前已经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院学习。去年2月，当阿明从麦加朝圣回国时，他们还到机场接他呢！

1972年3月26日，将军同干达地区的一个年轻姑娘玛迪娜·娜杰巴结了婚。据乌干达电台说，“她是巴干达族为了报答他对该族的宽大和友爱而送给他的。”婚礼在离坎帕拉二十哩的一个农村举行，主持人是这个农村的小学教师。新婚夫妇坐在土房子外面的照片登在坎帕拉的报纸上——阿明穿着一件运动紧身衣，新娘穿着白衣服。结婚的当晚，阿明赶回坎帕拉做政治报告，玛迪娜·阿明夫人则参加了他丈夫的其他四位妻子的行列。萨拉于1971年曾随阿明访问德国。1972年初，即将军通过政变上台一年以后，她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是关于她的最后消息。可能阿明已和她离婚，以便符合伊斯兰教一个男人只能有四个妻子的规矩。阿明对她们的照顾总是公平合理的，给她们的衣服和奢侈品也一样多。自从当上国家元首后，他带她们轮流参加国事典礼。在他的讲话里，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里，他反复强调，“一个男人的责任是把他的爱情公平地分给他的妻子，使她们感到丈夫需要她们，使她们感到快乐。”

在阿明当士官的时代，有一段时间他只能带一个妻子同住在兵营里。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来视察，发现阿明的房里有两个女人。他问她们是谁。阿明指着其中一个回答说，“这个是我的妻子。”

“那么那一个是谁呢？”

“她是我的姐姐，我的‘达达’。”“达达”在斯瓦希利语里代

表姐姐。这故事在兵营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位将军就被叫做伊迪·阿明·达达。阿明很喜欢向朋友们，甚至向贵宾讲这个故事，笑着谈他的急中生智。

1925年左右，即伊迪·阿明出生时，乌干达正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间接统治的美好日子接近尾声。在间接统治下，布干达、布尼奥罗、安科累和托罗这四个王国同英国人协调合作，发展很快。根据1900年的乌干达协议，布干达将近一半土地给了世袭保有土地的各门旧族的后裔。他们引种了咖啡和棉花，成了有钱有地的贵族。他们的子弟在英国政权和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和学院里，在西方的教育机构里，受到了极好的教育。有几个还得到了学位并出国继续汲取经验。这些年轻人开始要求对乌干达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怨恨英国保护政权指手划脚的做法；但英国人却不想让别人分享他们的权力。

在布干达和其他王国有了这些发展时，卡克瓦族却没有多大变化，他们中间并未出现有产阶级。唯一赚钱而不同非洲部族的人往来的是印度人——当时被称为亚洲人。二十世纪开始以来，他们一向拥有那些无所不包的村落店铺，即所谓“杜卡”。因为他们有时欺骗非洲人，他们在卡克瓦族地面和东非的其他地方都发生过一定程度的纠纷。阿明对印度人的看法和其他许多非洲农民一样。他憎恨他们，因为这些印度人和他们不一样，在买卖上又那么狡猾。

阿明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当地教会学校上学，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不得不帮他父亲种地。三十年代初期，许多非洲人不怎么懂得教育的好处，何况卡克瓦族也不在最进步的

部族之列。但是阿明在学校里至少学到了斯瓦希利语。这时英国人要把斯瓦希利语变成东非三国的混合语，以便把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组成一个大自由贸易区。这个计划定名为“东非联邦”；它失败了，主要是由于巴干达人和乌干达其他主要的部族拒绝参加。乌干达是一个黑人的国家，他们唯恐最后受到支持这一计划的肯尼亚白人移民的统治。阿明之子伊迪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东非联邦”<sup>①</sup>，但是他学到了斯瓦希利语中的三个“r”。

阿明长成了一个棒小伙子，身高六呎四吋，他由于体力勇猛，富于领导才干，势必使他的同辈相形见拙。他开始渴望扩大眼界，多见世面，显姓扬名。1946年，他找到了这条道路——参加英国非洲步枪队。

这个团队曾在缅甸遭到惨重损失，牺牲了一千九百二十四名非洲士兵。它返回东非后，第四营驻在内罗毕城外的兰加塔兵营。他们派了一个征兵队到北乌干达，招来了一群卡克瓦人，其中就有阿明。除了身材高大，他和其他招来的新兵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那时他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好兵，也许有朝一日当上一名中士。

---

<sup>①</sup> 建立“东非联邦”的问题，是1900年英驻乌干达专员哈里·约翰斯顿提出的。历史上，英帝曾不断酝酿把英属东非殖民地（如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等）建立成一个联邦。最初，英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或跟它的殖民地的殖民统治阶层各自的利益冲突，以后是，觉醒的东非人民的反对；东非联邦长期未能成立。1953年底，乌干达的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也因反对此事，被英国废黜。为了缓和乌干达人民的反英斗争和进行欺骗，1955年11月，英又准许穆特萨复位并不得不宣称今后不经乌干达人民的同意不建立东非联邦。——译者



## 第二章 从小兵到少校

在兰加塔兵营，阿明很快就习惯了军队的日常生活。发给他的全副装备中竟有一条苏格兰兵穿的短裙；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传下来的装束。1916年，当乌干达营正待命准备到纳拉贡比同德军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的部队作战时，卡其布短裤奇缺，因此发给该营一些卡其斜纹布，建议可以把它用作围腰布。由于该营苏格兰军官很多，围腰布立刻变成了短裙；沿着缝线的地方还缝上了一长条绿带子，裙前挂一个皮“荷包”以代替毛皮袋。在1946年，新兵还穿这些遗留下来的短裙。乌干达步枪团的军乐队把这种短裙一直穿到1963年，这一年奥博特总理出来制止说，“我不喜欢我们的部队打扮得象女人一样。”

阿明第一次逛了内罗毕夜间灯火通明的大街，有些街道还铺了路面。他看到了漂亮的餐厅。纽斯坦利和诺福克是最高级的旅馆，还有一个剧场和几家电影院。然而阿明最关心的是执行值勤，不久他的责任心和机敏就引起了长官的注意。他还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很快就成为杰出的运动员和拳击手。他精于拳击，1953年参加了乌干达轻重量级锦标赛，获得冠军，并且连续九年保持了冠军称号。

人们开始传说有关他的体力的故事。有一件事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团队每年一度的运动会是件大事。1957年，在

茅茅运动以后，他那个营回到了金贾。指挥官想把运动会搞得特别成功，便请来了一个亚洲艺人。他带来一只箱子，里面装了一条蟒蛇，他逗弄它，用指头戳它，他的大胆表演把女观众都吓呆了。接着这个亚洲人吞了一个电灯泡。最后他躺在地上，把一块大水泥板压在胸部，大叫大嚷：“谁拿锤子来把它在我身上砸碎？保你伤不了我！”

场地的一边出现了阿明高大的身躯，手拿一把相当大的铁锤。一见到他，观众刹时鸦雀无声，然后又发出了不安和紧张的低语声。人们知道阿明是能够砸碎那块大水泥板的。

阿明迈着均匀的步子，走到那躺着的亚洲人身旁，停了下来，把大锤高举过顶，狠狠地打在水泥板上，把它砸成好几块。观众都往前挤过来看那亚洲人怎么样了：他皮肉受伤，骨头散了架子，震得丧魂落魄，但还不可思议地活着。阿明扶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把他背出了场地。

1948年，阿明升为下士，在北乌干达对部族劫掠者的讨伐中初露头角。但是，他对付偷牛贼所采用的严厉办法经常引起疑问。阿明对他的英国长官是相当尊敬的，他总能用有趣的斯瓦希利语成功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49年，该营开往索马里，在那里驻扎了一年。阿明看到了新的一部分世界。他决没有想到二十二年以后他会在何等不同的情况下重访摩加迪沙。

1952年秋，A. E. D. 米歇尔少校来到乌干达，他几乎是立刻接到命令，率领他手下的英国非洲步枪团的一个连去肯尼亚协助对茅茅作战。米歇尔对身材高大的下士伊迪·阿明印象很好。他告诉作者：“他很安静，很有礼貌，尊重长官，忠心耿

耿。他是一个好射手，实际上是靶场上的神枪手。卡克瓦人相信自己不会受伤，在野战时总是把茅茅匪帮赶跑。他们过分自信，因此当我们把后备队调上去时——这次我们不应当进入阿伯德尔山森林——他们坐在卡车上，两腿垂在两旁，抱着长枪，说是戒备，实际上是在打盹。伊迪可不是这样，他始终很机警，注意极细微的动静。他的眼力特别好。不止一次他对我说，‘瞧，长官，那边有人，那边，山顶上’，或是‘在那边山沟里’。我拿出望远镜，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到人在哪里。伊迪总是看对了，但令人惊异的是，他是用肉眼看见的。”

1954年，该营开回到金贾接受女王视察。趁她去为欧文瀑布水闸剪彩的机会，她给英国非洲步枪队第四营授新军旗，并接受该营的招待。伊迪下士在准备迎接女王视察的工作中处处抢在头里。士兵们喜欢庆祝活动和检阅，对身上穿的制服特别讲究。他们把制服浆得象硬纸板一样绷硬笔挺，站岗时象塑像一样岿然不动。他们操练起来几乎象仪仗队营一样整齐一致，因为作者在庆祝典礼中见过分属于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英国非洲步枪队的各个营，对这一点可以作证。独立以来，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这种高标准。

总督安德鲁·科恩爵士要求一伙高级军官在他举行花园招待会时不让人群挨近女王。指挥官唐纳德·诺特上校认为军官们的金属衬底的帽子很笨重，不合当时的条件，便给他们找来了墨绿色的步兵便帽——墨绿色是第四乌干达营的营色。帽子戴起来特别舒服，因此军官们只要不受检阅，经常戴着它，直到独立时为止。阿明将军现在还戴着这种便帽。在他通知英国高级专员理查德·斯莱特同最后一批亚洲人一起



离开乌干达时拍摄的那张在全世界发表的照片上，阿明就戴着四营一连的军便帽。有些过去和他在一起的军官认为他们还看得出帽上的红色麻栎子形帽徽以及上边阿拉伯字“4”。

还发生一件同1954年授新军旗有关的历史性插曲。当时任坦噶尼喀总督的爱德华·特文宁爵士赶到坎帕拉来参加这个仪式。爱德华爵士在英国非洲步枪队接受旧军旗时是该队的一名年轻少尉，这时他受指挥官委托把旧军旗送到金贾的圣安德鲁教堂，现在还陈列在那里。

以后，一连又回到肯尼亚，伊迪下士也跟着一起去。这时茅茅已转入伏击战，沿着阿伯德尔山脉曲折盘旋的大路——更确切地说是小道——进行伏击是很容易的。这个乌干达营奉命协助肯尼亚保安部队进入阿伯德尔山森林作战。士兵们、特别是卡克瓦人仍然很自负，都很兴高采烈——结果，在黑暗的森林里，一些侦察兵由于误会而互相射击，造成了两名伤亡。这事发生在茅茅袭击了奈瓦沙警察所以后，他们不仅抢走了枪支、弹药和金钱，还抢走了警察的制服。他们装扮成警察，多次袭击了乌干达人。这事教训了卡克瓦人，他们从此不再把吉库尤人看成“粪土”了。

在这一切事件中，阿明表现得都很出色。米歇尔少校想尽一切办法要提升他为中士，但很困难，因为阿明通不过比较简单的用英语回答的考试。这时他仍然只会讲卡克瓦语和斯瓦希利语。

阿明在这个营的各部门都干过：迫击炮排、运输连、信号班。最后他确实成了一名中士——他有好几个星期清早起床就学习必要的英文字，还参加上英语课。1957年，他被派往

在肯尼亚内罗毕以西九十哩的纳库鲁镇举办的“埃芬迪”训练班受训。“埃芬迪”是为卓越的非洲士官创设的一个军阶——这是一个非洲士兵过去所能达到的最高军阶。现在它成为他们以后能当上军官的进身阶了。由于加纳在1957年获得了独立，尼日利亚在1960年独立了，几个东非国家显然迟早也会取得独立的。阿明在“埃芬迪”训练班因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光荣剑。在奈杰尔·塔普少将给他授剑时，阿明受到训练班同伴的欢呼，因为他们认为他完全应该得到这种奖励。

1961年，伊迪·阿明被任命为陆军少尉，从此他就不再被称为“阿明之子”了。把非洲军官加以训练，以接替英国军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时阿明在乌干达步枪队（英国非洲步枪队在乌干达独立后改称此名）三连的休·罗杰斯少校手下任职。三连再度被派赴肯尼亚——这次是去北部边境地区协助扫荡偷牛贩。三连被划归第五英国非洲步枪团由A.P.H. 哈特利中校指挥。任务是解除图尔卡纳部族恩格瓦泰拉部分的武装。罗杰斯少校负责某一地区，他把该地区的防务再分给手下的三个排和连指挥部负责。阿明是其中一个排的排长。在罗杰斯少校一度必须离开的时候，阿明还代理过连长。

据了解在部族人手中有一百一十件武器，该连缴获了九十九件。罗杰斯巡视了手下军官的行动，表面上一切正常。但在训练结束以后，图尔卡纳人控诉说，他们有五个人被杀害。两个人是有原因可以说明的——一人死于心脏病，一人死于某种慢性病。但图尔卡纳人的控告坚持说，其余三人是阿明杀死的。因此在北部边境地区的洛德瓦尔进行了调查；

罗杰斯少校和几个军官必须说明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阿明目前的敌人，例如前总统奥博特和其他乌干达逃亡者，现在坚持说这三个图尔卡纳人就是阿明杀死的。但英国人的观点如何，以下事实是最有力的说明：1962年10月9日庆祝独立时，阿明是同罗杰斯少校一起值勤的。

1963年在北部边境地区又有另一种的训练。乌干达步枪队、坦噶尼喀步枪队、肯尼亚英国非洲步枪队（当时肯尼亚尚未独立）和一些英军单位举行比赛。各营选出一个连队为代表；乌干达步枪队由三连代表。如果伊迪·阿明中尉没有显露出他的才干和领导能力，他就不会获准参加这次训练，更不必说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了。由于他聪明的筹划，三连在这次比赛中绰绰有余地获得优胜。阿明将军至今还不时提到这次胜利。他1971年访问英国时，遇见了几位以前的指挥官和同僚，他和他们每个人谈话时都提到这件事。

阿明同罗杰斯少校（现任中校）相处得很不错；当罗杰斯于1963年底离开时，阿明为他举行了一次欢送的鸡尾酒会。为此他请了团队的乐队，并根据他所看到的欧洲军官的做法，对一切细节作了安排。阿明这时住在军官宿舍，只有一个妻子跟着他。他要在各方面都符合欧洲的规矩，并取得了极大成功。他的英语有了进步，没有人怀疑他最后会当上营长。由于他的资历和明显的领导能力，实际上这是意料中的事。只有一个苗头本来值得深思，即他和一些重要的政治家交了朋友——可是这一点被英国军官忽略过去了。他的叔叔费利克斯·奥纳马已任内政部长。密尔顿·奥博特总理1963年访问以色列时，把阿明（已晋升少校）当作额外侍从副官带去。阿

明甚至可能知道奥博特和以色列的协议，即由以色列派一个六人小组在特索地区进行基本侦察训练。奥博特曾经拒绝J.M.A.蒂利特上校的关于由英国军官训练乌干达陆军的安排，只是把他们当作辅助军官留下来。如果说阿明知道以色列提出的训练计划，他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蒂利特上校或其他任何人。同他一起任职的英国军官虽然看到了他的工作效率和领导才干，却想不到这位平时非常健谈的少校居然也会用非洲人天赋的沉默来对待他不愿讨论的问题。

### 第三章 统率

1964年1月29日下午两点，伊迪·阿明开始了解到他对乌干达陆军士兵可能具有的影响。军队里有过不少麻烦；但他们正在摆脱大部分的英国军官，并从乌干达政治家那里得到他们几乎全部所需要的东西。除警察以外，军队是乌干达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武器精良，有很多车辆和装备。阿明上面还有一个英军指挥官和一位高级乌干达军官，但他觉得到时候可以取而代之。

英国人训练和装备了六十三年多的有纪律的军队，在四天之内就动摇和涣散得不象样子。这是由东非的下面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

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发生政变；苏丹外逃，约有一万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被杀害。这对乌干达军队没有影响。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哗变，士兵的饷给得到了相当大的增加。这消息刊登在乌干达报纸上，于是金贾军营的乌干达部队变得不听话了：他们也要提高饷给。1月22日肯尼亚军队中一些分子哗变，金贾的气氛高度紧张起来。英国军官虽然其中有些人生于肯尼亚，能说标准的斯瓦希利语，却没有看出即将出事的苗头。<sup>①</sup> 内政兼国防部长费利克斯·奥纳马是

---

<sup>①</sup> 然而，的确有些苗头说明可能产生麻烦。独立后不久，该营的一些成员写过两封破坏秩序的信，肇事者被开除了。当时认为只有一小撮人同意他们的



阿明的叔叔，他征得内阁同意，给准尉和士官提饷，其他级别不动，并准备以后宣布此项决定。次日，金贾营部警卫连（乌干达步枪队）的士兵要求晋见在12月接管该营的指挥官J. B. 汉密尔顿中校。他通过翻译<sup>①</sup>对他们讲话。他的话讲得很精采，当他劝他们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前仔细考虑一下时，士兵们很注意地听着。他讲话结束后，一名上士命令“立正”。只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其余的人大叫大嚷地把他轰了下去。情况变得无法控制，士兵们拒不解散。

警卫连的闹事头头于是要求见奥博特总理或内政部长奥纳马。奥纳马于下午四时在警察保护下到来。士兵们把警车推下公路，殴打了警察。军队和警察早就互有猜疑，这下子可算上老账了。奥纳马被士兵们从车里拖出来，扔到警卫室里，由士兵的发言人卡拉莫贾族保罗下士代表士兵和他谈话。这位部长在胁迫之下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把饷给提高一倍。士兵们高声欢呼，把他带到食堂，破门而入，弄来了啤酒，开怀痛饮，有些人喝得酩酊大醉。

这时，陆军指挥官蒂利特上校坐了一架警察飞机从恩德培飞来。让两位英国高级军官蒂利特上校和汉密尔顿中校分驻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显然在思想上是容易引起反应的，所以蒂利特上校立刻就走了。为了避免士兵纠缠，他不得不溜出后门，徒步跑到机场（离兵营很近）。有一段时间英国军官们

---

观点。英国军官和在蒙斯受训过的青年乌干达军官之间在食堂里关系有些紧张，后者动不动在小事上找岔挑毛病。然而，这些乌干达军官对于八位在以色列作为军官培养的乌干达青年军人却也并不尊敬。

<sup>①</sup> 汉密尔顿中校在到达金贾后的六个星期中还来不及学斯瓦希利语。

以为他被扣留了，因为他的车子显然来不及先到机场去跑一趟，而是直接开回来了。司机弄得晕头转向，什么情况也说不出。

奥纳马部长从食堂被释放以后，来到军官餐厅，这时英国军官都聚集在那里。奥纳马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一个劲地厚着脸皮撒谎。汉密尔顿中校被眼前的局势吓坏了，问他说，“你了解到这意味着什么吗？你在每一点上都向士兵让步，你让他们白白地揍了你的警察卫队，粗暴地对待你。纪律就此完蛋了。这将影响到乌干达的整个前途。”

在一个英国军需官的主持下，会计们通宵工作，调整薪水和津贴，因为同奥纳马达成的协议规定，要马上把新工资数登入士兵军饷册上，好让他们在第二天早上看到军饷册上的新工资数。但早晨列队点名时有些人不来，还有些人拒不服从命令。那天上午，运来了一批三百万发子弹的军火；军火库地方不够，不能全部锁入库房，只能卸在兵营的军需品场院里。

当奥纳马还在警卫室时，一些忠于当局的人就向英国军官告密，说他们的生命可能发生危险。第二天，命令已传达不到营里了。傍晚，士兵们又喝起酒来。通讯军官罗杰·谢林上尉一直同恩德培保持着通讯联系。傍晚，他们估计局势不可控制，汉密尔顿中校便决定请求支援。金贾的英国军官不知道奥博特已同意请英国帮助，英国斯塔福德郡团的第一营和苏格兰卫队的两个连于两小时内从内罗毕空运赶到，午夜左右降落。

在恩德培机场发生的一场虚惊，典型地说明了当时东非的气氛。正当那些斯塔福德兵要下飞机时，他们看见有一群

人在夜色苍茫中向飞机走来。他们手按步枪扳机，做好射击准备，跳下飞机，冲向他们认为是乌干达叛兵的那些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陆军参谋军官和一位政府部长前来欢迎英军恢复法律和秩序的。于是双方相互解释，照例表示了歉意。

陆军司令部参谋詹姆斯·豪斯顿少校在市长、议员和当地亚洲承包商的协助下，帮忙找到了运输工具和向导，于1月24日上午四点四十五分把斯塔福德团送到了金贾。根据预先约定，有三名从金贾“逃出来”的英国军官在半路上迎接部队，然后充当向导。斯塔福德团在黎明对金贾兵营实行了漂亮的突然袭击，在门岗能进行抵抗和向他们自己人报警之前，兵营里的士兵居住区就被隔离包围起来，军火库也被占领了。

半小时内发出命令，要寻找带头闹事的人。三十名乌干达士兵被带到警卫室，然后送进监狱（直到3月3日斯塔福德团撤离后不久，他们才被释放出来）。以后，斯塔福德团撤到恩德培，只在金贾留下一个连。所有的武器弹药——可装很多卡车——以及英国人的家属，也都撤出了金贾。事态恢复正常，但这仅是表面的。形势继续紧张，仍有一些乌干达士兵拒不服从命令。英国人再次采取了行动，这次对坚持不服从命令的反抗者都当场开除。陆军司令官蒂利特上校和奥博特博士商定把警卫连和一连完全解散。乌干达还算走运，因为第一营有一半不在当地而驻在肯尼亚、刚果和卢旺达的边境线上；第二营在理查德·格鲁姆中校及其副手沙巴尼·奥波洛托少校的领导下，正在莫罗托筹组之中。豪斯顿少校很快地组织了运输力量，并遵照奥博特的命令，给解职的士兵发了一个月的薪饷和应发的津贴。其中有些人这辈子还没看见过这么多

的钱。车辆在兵营广场上排成了长队，那些有家属的人把他们的床、铺盖和杂物都装上了汽车。然后，他们被遣送回到本部族地区，中间不少人因为当了“坏兵”，玷辱了荣誉，被乡亲们甚至家人饷以石子。很多部族都认为有儿子在军队里当兵是件光荣的事。

在整个闹事期间，很少见到非洲军官和上士。他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站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而反对哗变士兵的；但是他们是极少数，也没有力量，为了少惹麻烦，所以就不露面了。

伊迪·阿明当时不在场，他受蒂利特上校的派遣，到上乌干达征兵去了。他是少数几个有正当理由不在场的非洲军官之一。他可能不知道闹事的经过，虽然未必是这样的情况。他和他的叔父费利克斯·奥纳马非常接近，甚至在他去征兵的远行期间还可能和他叔父有联系。阿明在1月26日英国第二次干涉前返回金贾。征得指挥官和陆军司令的同意，他和受到良好教育、能说流利英语的卡塔巴瓦上尉一同乘警察飞机飞往恩德培会见总理；他于当晚返回。汉密尔顿中校在餐厅里叫阿明去弄清情况，他于两小时后汇报说，“今晚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他说对了。

等到被解散的士兵最后走完了，阿明才活跃起来。从坎帕拉来了一些政治家，他们都对他很友好。关于伊迪·阿明将出任新的指挥官的传闻，开始散布开来。他陪同政治家们分别对军官、士官和其他各级人员讲话，但是没有任何英国军官获准参加这些会议。这些“巴拉扎”<sup>①</sup>的结果是作出了各种

<sup>①</sup> 巴拉扎 (barazas) 斯瓦希利语，指商量问题的聚会。——译者

决议。草拟了必须立即离开而由乌干达军官代替的英国军官名单。这都是早已在原则上决定了的事。阿明接管第一营，奥波洛托指挥第二营。阿明仍很倾向英国，那些熟悉他的人认为，他对最近的一些事件真心感到羞耻。他把所有的英国军官和士官召集起来，要求他们通力合作来挽救一营所受的损失。当时在场的一位军官告诉作者说，“阿明的讲话非常诚恳动人，他详尽地谈到了我们传统的关系，竭力要求我们勉为其难，共同应付这个局面。”

汉密尔顿中校的回答是严峻的，不合作的和带有责难的。这很不幸，因为这对阿明产生了坏影响。但是汉密尔顿中校刚到非洲不久，一直（并且当时仍然）感到很紧张。在阿明方面，他不能体谅这种生硬的拒绝；他脸上露出了敌意和怀疑，他对英国军官的态度改变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他这次和以后的行动。

到这时为止，阿明一直是个谦恭的、有效率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军官。现在他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他在电话上同莫罗托联系并和奥波洛托少校谈了二十分钟的话。他们讲的不是斯瓦希利语而是通讯军官谢林所听不懂的一种尼罗特-哈密特语。他的印象是他们讨论了如何应付局势。

1月28日，决定让某些主要的英国军官留下来：副指挥官J. W. C. 摩根少校担任顾问，罗杰·谢林上尉作为通讯官，托尼·帕金充当机械化运输军官，还留了军需以及其他一些军官和上士。此外，还决定让阿明于次日下午对士兵讲话以后接管一营。

经汉密尔顿中校批准，谢林上尉向集合的士兵宣布，假如



他们胆敢碰一下阿明，就将受到停在广场四个角上的英国“搜索者”侦察装甲车的机枪扫射。谢林上尉是不带武器，站在士兵面前用扩音器这样宣布的。

1月29日下午二时，当阿明中校（他和奥波洛托少校都已晋级）走进广场时，罗杰·谢林——一个二十三岁的高个子年轻人——紧跟着他。阿明转过身来对他吼叫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长官，我打算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攻击你，就枪毙他们”，谢林回答。

“滚开，我不需要你，也不要你作什么安排”，阿明大声嚷道。这是当着士兵的面说的；他开头这一手搞得很好。

阿明的讲话很精采。他提醒士兵们，现在他们已如愿以偿，如果他们再不回去工作，就会失去一切，这是很愚蠢的。士兵们立刻欢呼起来，但是阿明在讲话结束时告诉他们，他要求他们表现出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行为。罗杰·谢林已经退回到一辆“搜索者”侦察装甲车里，士兵们的反应使他大为惊奇，连阿明说些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去。<sup>①</sup>新上任的指挥官对该营的士兵施展了几乎象是催眠术般的影响。

在阿明发表讲话的一小时里，他自己好象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他走到指挥官办公室去接管仿佛本来就是他占有的地方。秩序立刻恢复了——除了个别一两件小事以外。阿明

---

<sup>①</sup> 三周以后，阿明把谢林上尉叫他办公室里。当谢林进去时，阿明对他吼道，“你丢了两封电讯。”谢林吃惊地答道，“长官，你指的是哪些电讯？我没有丢什么……”“不许回嘴——滚出去——给你两个小时收拾行李”，这就是他送别的喊叫。二十分钟后，罗杰·谢林上尉最后一次走出了金贾兵营。

显然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很得意，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同汉密尔顿中校的那场争吵。他谁也不信任。对于谁卷入了这次哗变，他有他自己的怀疑，并且他还有个人的旧怨宿恨要报。他坐着指挥车围着营房转，有时停下，指着一个人吼叫：“给我滚！”这个人就赶快离开兵营。阿明并不担心那些四十多岁的比较老一点的人或者那些很年轻的非洲军官，特别是如果他们表现出应有的顺从的话。同时他很照顾他的同族卡克瓦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西尼罗部族人。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和一个熟谙英语的军官在一起研究“女王条例”，以便找到一些条文来开脱一个由于哗变而坐牢的卡克瓦族士兵。在整个这段时间内，阿明故意怠慢他的英国顾问摩根少校，并清楚地表明他不愿听取他的意见。

自然，阿明那时还不大知道怎样指挥一个营。谢林的桌子上乱放着来自一些巡逻队的电讯，报告他们已有一星期没有得到口粮供应，也有来自边境某处的军官请求指示的电讯；但是粮食和指示均未送出。运输工具似乎消失了，就是下了命令也不见出现。但是阿明知道士兵们都支持他。1月30日早晨七点，他把全营五百人集合在兵营的操场上，教他们玩橄榄球。他是一个优秀的橄榄球手，金贾橄榄球俱乐部的唯一非洲会员，并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会员。然而，对这一场早晨橄榄球练习，却有一个英国军官吹冷风：“他要教他们玩橄榄球，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对付他们。”这话说得极不公；按阿明本身的水平来说，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人。

阿明突然觉察到他有一种自己以前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地位上，他仍然有一个英国陆军司令和奥波洛托中校在他上

面，但是他的叔叔费利克斯·奥纳马部长正在筹划未来的事宜。这时，奥纳马也许在梦想接替奥博特的职位——当上总理。毫无疑问，阿明也会跟着跑，只要这对他合适。不过这局牌以后却不是这样打法。

密尔顿·奥博特总理使全世界、甚或他自己对这次哗变产生了错觉。他宣称秩序已经恢复，罪犯已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话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士兵已经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并且他们知道，包括政治家在內的所有的人都怕他们。他们听阿明的话，而阿明相信他能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他了解到自己的手里有了权力，并蓄意要扩张这个权力。

## 第四章 初入政界

哗变一年以后，阿明开始尝到权力的甜头。作为第一营的营长，他干得很不错。他没有白白地注意观察欧洲军官，没有白白地和他们交朋友，并且从表面上看来他还学到了他们的指挥艺术。他恢复了秩序，把第一营管理得成为一个符合英国军队最高传统的、有高度纪律的单位。动不动开除的情况已经停止，人们恢复了安全感。在恩德培，仍旧有一个英军司令部，但几乎是没有什么权力了。来到金贾的英国军官对阿明的成就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这期间，阿明通过他那当内政部长的叔叔和总理密尔顿·奥博特搞得很熟。奥博特是一个精明的、注重现实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看到，独立时形成的自相矛盾的情况——由卡巴卡<sup>①</sup>即爱德华·穆特萨二世爵士当总统，由他自己当总理——不能继续下去。这位卡巴卡想要在布干达地区以及历来由国王和部族酋长统治的乌干达的四个王国里<sup>②</sup>保持他自己的封建特权地位。1953年，他和英国总督安德鲁·科恩爵士发生冲突，后者因为他反对民主改革，曾把他放逐到英国呆了两年。这次这位卡巴卡遇到了一个强劲得多的对手。奥博

---

① 卡巴卡系乌干达语国王之意。——译者

② 乌干达原分五个联邦国(布干达王国、布尼奥罗王国、安科累王国、托罗王国、布索加地区)和十个属中央管辖的行政区。——译者

特是个激进派，他曾设法在麦克雷雷学院受到高等教育，1950年投身工会活动，然后去肯尼亚帮助建立肯雅塔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1952年，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被禁止活动，他被驱逐出境。1957年，他进入乌干达立法会议。五年后，在卡巴卡的党“卡巴卡耶卡党”(独尊卡巴卡)的帮助下，奥博特把他的国家引向独立，并担任首届总理。

这位卡巴卡一般称作弗雷迪国王，是来自北方并统治布干达至少达五百年之久的他那王朝的第三十五个君主。他深信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种种权利，因此他拒绝与安德鲁·科恩爵士的进步改革合作。当决定采取全国普选后，他下令抵制1961年的大选，结果由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领导的民主党取得了巴干达的所有席位，基瓦努卡终于成为总理(关于他那悲惨的结局，下面的章节将有所论述)。卡巴卡对于这件事以及基瓦努卡胆敢“厚颜无耻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不禁勃然大怒，于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和奥博特组成联盟，在1962年大选中共同斗争。结果“卡巴卡耶卡党”获二十一席，人民大会党(奥博特的党)获三十七席，民主党获二十四席。奥博特得到了议会五十八个议员的支持，从而能够组织政府，英国也能批准乌干达的独立日期——1962年10月9日。一年之后，根据新的宪法，总督府撤销了，卡巴卡当选为总统。新宪法为了尊重班图族君主，避免采用“共和国”的字样。似乎为了象征南北和谐，奥博特和一位美丽的穆干达族女秘书结了婚。<sup>①</sup>

---

<sup>①</sup> 婚礼耗资二万九千英镑，看来奥博特博士出不起这么大的一笔款项，但他指责那些谈起这件事的外国记者，说他们干涉乌干达内政。



但是，真正的分歧不久就公开化了。1964年2月，奥博特倡议一党执政。联合政府中的成员相互猛烈指责和反指责。这时，“卡巴卡耶卡党”的成员指控说，人民大会党的成员对他们施加压力，企图吞并他们。此外，人民大会党由于驱逐了亲共产党的总书记、它的激进青年派的领袖约翰·卡孔基，改选保守的穆干达人格雷斯·伊宾基拉而大得人心。

1964年8月，“卡巴卡耶卡党”多数成员在国民议会中倒戈。信新教的卡巴卡和信罗马天主教的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势不两立，使“卡巴卡耶卡党”和民主党不能形成联盟，于是奥博特大获渔利。由于他是一个狡黠的操纵者，他让五个前“卡巴卡耶卡党”党员在他的政府里任职。但奥博特是一个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不可能不知道和卡巴卡的最后摊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他知道当时已升为上校的高级军官沙巴尼·奥波洛托是忠于卡巴卡的。因此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同也已提升为上校的部队副司令阿明交朋友，以便一旦需要时保证有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对奥博特来说，问题不是是否实行摊牌这个策略，而是何时实行。

因此，奥博特在阿明上校身上下功夫。他经常邀请他前往坎帕拉和恩德培的国家宫。他把当时的情况向阿明作了介绍，或通过费利克斯·奥纳马这样做。奥博特还设法使政府拨给他一辆梅塞德斯(本斯——译注)牌汽车，还给了他其他许多阔气的东西。阿明很欣赏这种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他不是开车能手，但很喜欢把他那辆本斯牌汽车嘟嘟地开来开去。

象许多北方人一样，阿明极不喜欢说班图语的南方各族人民，特别讨厌巴干达人。对此他毫不隐瞒。但对于弗雷迪

国王，他却毫无厌恶之感。他知道弗雷迪在剑桥得过学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弗雷迪曾在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担任军官，就是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对于这个阶段的阿明来说，一个军人比一个政治家重要得多。如果卡巴卡在对待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的问题上不是那么固执，阿明的事业和乌干达的前途可能完全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就在那段时期，阿明也被卷进了一场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在1964—1965年期间，刚果人正在开展斗争。奥博特和他的左派朋友同情反叛者。这一派的主席是克里斯托夫·格贝尼，外交部长是托马斯·坎扎，财政部长是托尼·尼亚特。奥博特对于两派的观点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和尼雷尔一样，非常敬慕帕特里斯·卢蒙巴，因为卢蒙巴是第一个起来为刚果广大群众说话的人。他们相信是有人按照卡萨武布总统和蒙博托上校的命令去杀害卢蒙巴的，而不是象他们自己的告密者所说那样，由冲伯下的命令（虽然他们憎恨冲伯），因此他们支持蒙博托的对手。

在蒙博托这边的白人雇佣军和反叛者一边的军事顾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概永远也不会完全弄清楚。事实上，奥博特博士是在1964年底派阿明上校进入刚果去为反叛者建立训练营的。阿明还奉命从反叛者的领袖那边运出黄金、象牙和咖啡，作为他们接受武器和装备的代价。只有奥博特可能知道有多少黄金运进乌干达，以及这些黄金是怎样处理的。很久以后，据报道阿明曾向伊恩·格雷厄姆少校<sup>①</sup>承认，他经

---

<sup>①</sup> 见1972年10月29日《星期日泰晤士报》。

手把钱从刚果运了出来，并从这些钱里得到了一定的数量。如果他得到了一些钱，那么很可能奥博特、奥纳马——这时任国防部长——和计划与社会发展部长奥多科·内基翁得到了其余的部分。他们一起卷入了刚果事件。

刚果事件的秘密保守不住。1965年3月，反对党副领袖达乌迪·奥钦在国民议会上出示据称是阿明上校1965年2月银行存款帐目的照相副本，账上说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存款达到一万七千英镑。1965年9月，奥钦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暂时停止阿明的部队副司令职务，并正式调查他的财政状况。这项动议没有通过，因为奥博特总理说，由于对阿明的银行存款的调查已将完成，他竭力反对这项动议。但是奥钦还说，阿明同那在东乌干达对一些青年小组进行的旨在推翻宪法的秘密军事训练活动有牵连。奥博特矢口否认这个说法。但是据后来的情况看来，这里面也有几分事实根据。伊迪·阿明第一次牵连进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政治问题，还不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他喜欢那种出差刚果的骑士式的秘密旅行，私运黄金和象牙，秘密出售象牙，运用自己的小聪明躲过他一向不喜欢的警察和海关。他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却不知道赌注多大。

在这期间，奥博特利用提供职位的办法，诱使议会反对派领袖巴西尔·巴塔林加耶和他的五个支持者倒向支持政府的议席这边来了。1966年1月31日，“卡巴卡耶卡党”（换句话说，就是弗雷迪国王）终于进行反击。正当奥博特为了避免对抗而到上乌干达去的那段时间里，卡巴卡的忠实朋友、反对党议会督导员兼副领袖达乌迪·奥钦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停止

陆军副司令阿明上校的职务，并控告他曾在 1965 年边界战斗中从刚果掠夺黄金、象牙、咖啡和金钱，同总理、国防部长和计划与社会发展部长朋分实际所得的款项。他们四人都是北方人。奥钦指出，他们在邻近的刚果出售黄金和象牙，所得的收入共十二万五千英镑，其中阿明上校个人分得一万七千英镑，奥博特博士得五万英镑，两位部长各得二万五千英镑。

奥钦还宣称，“阿明上校之所以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是因为政府里有少数几个人正在通过他来策划一次推翻宪法的政变。”这次，奥钦提出的关于在调查阿明的银行存款期间暂停其上校职务的要求在国民议会里通过了；只有费利克斯·奥纳马投了反对票。奥纳马说，“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谣言，如果奥钦先生到国民议会外面不受议会豁免法保护的地方去重复他现在说的话，他就会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

尽管议会表决通过，阿明却没有被停职。总理在他北方之行的期间驳回了控告，并提醒人民提防“伪装的先知、自封的酋长以及自命正确的政客”。但是他并未提到奥钦控诉的他同奥纳马和内基翁策划在阿明上校帮助下暂时中止实行宪法的问题。

1966 年 2 月 12 日，奥纳马部长在国民议会向奥钦先生保证，他正在处理有关议会里提出的要求停止阿明上校陆军副司令之职的动议的文件。据奥钦先生透露，他接到了无数威胁性的电话，感到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他要求总统、即卡巴卡指派一个由乌干达首席法官会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其他三个独立民族”的法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他说，乌干达人民要想知道谁发动了乌干达和刚果之间的战斗——因为确实有

过战斗；又有多少乌干达士兵阵亡、受伤和被俘；有多少黄金运进来；这些黄金是在什么地方熔化的；政府曾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措施去拘捕应对私运黄金的非法行为负责的人，或者至少要补收这笔黄金应缴的税款。

同一天，坎帕拉进驻了增援部队。在此以前，有谣言说军队里的叛变一触即发，还说可能发生尼日利亚式的政变。<sup>①</sup>后来，根据可靠的说法，这时曾经有过两起阴谋杀害奥博特的事件。

奥博特于2月13日自北方旅行回来，在恩德培国家宫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我绝对否认我曾经从去年的刚果边境事件里得到任何金钱、黄金、咖啡或象牙，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利可图的物品。我两袖清风地领导着政府。这是为了要败坏我的名誉而捏造出来的罪名。我的那些敌人无中生有，企图借此说服我自己党里的成员，使他们不信任我。”他还竭力为阿明上校辩护。当天晚一点的时候，奥纳马部长在国民议会里要求奥钦撤回他提出的要阿明停职的动议，并威胁说，如果不撤回，就要对他起诉。

奥博特博士对于他自己党内形成的针对他的反对派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它的领袖是国务部长、执政党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的总书记格雷·伊宾基拉。奥博特了解到支持伊宾基拉的批评的人日益增多，关于十二万五千英镑的事实也存在着迟早会暴露的危险。在国民议会里，他同意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对达乌迪·奥钦的控告进行调查。但私底下他在

---

① 尼日利亚的政变发生于前一个月。



阿明的支持下正在进行其他的准备。

2月22日，内阁召开一周一次的例行会议，这时装饰华丽的秘书处会议室的门突然打开，十多个警察毫无礼貌地冲了进来，逮捕了五位部长——格雷斯·伊宾基拉、巴拉基·基里亚、马蒂阿斯·恩戈比、乔治·马盖齐和欧内斯特·卢穆博士，他们都是来自南方的班图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总理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党的领导人。他们边挣扎边喊叫，被抓到外面，塞进了几辆吉普车，押送到坎帕拉以北三百哩的古卢。

那天晚上奥博特宣布，他已取得“政府的一切权力”，因为只有他“了解人民要求和平、秩序和繁荣的愿望”。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陆军司令沙巴尼·奥波洛托上校，由阿明控制乌干达陆军和空军。阿明向总理保证部队的忠诚。但是他的任命却从未在官方的公报上出现——这是对阿明一生中这一插曲的一个奇怪脚注。

过了惊慌失措的沉默的三天，达乌迪·奥钦于2月2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奥博特阐明他的行动，并提醒公务员，要他们记住自己对总统爱德华·穆特萨爵士所作的忠诚宣誓。这天下午，阿明以新上任的陆军司令的身分来到总统府和仍然是总司令的爱德华爵士商谈。布干达谣传军方在逮捕卡巴卡，忠诚的臣民拥到总统府，沿路抓起了棍棒、石头和砍刀。但是，当他们得到保证说没有人企图伤害他们的国王时，他们就听从劝告解散了。

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奥博特宣布“暂时停止”宪法，因为在他北方之行的期间，“几个地位很高的人出于私利，企图

用外国军队来推翻政府”。乌干达有许多人认为这是指卡巴卡的。

3月2日，奥博特取得了总统和副总统的权力，他在一次电视和广播的采访节目里说，卡巴卡曾召见外国使节，要求派兵到乌干达。对此，爱德华爵士打破了沉默，否认他曾寻求外国的军事援助，但承认他曾进行过试探，以防万一局势变得无法控制，因为他相信有人正在训练军队以便推翻宪法。奥博特跟着也起来否认，说是在卡巴卡要求外国出兵的时候没有解除过或停止过任何军官的职务。

奥博特同意成立的司法调查组由东非上诉法院的克莱门特·德莱斯坦爵士主持，成员有肯尼亚高等法院的法官亨利·E·米勒和坦桑尼亚高等法院法官奥古斯丁·赛义德，他们开始对总理、费利克斯·奥纳马部长、奥多科·内基翁部长以及阿明上校等贪污和颠覆的指控进行调查。<sup>①</sup>他们听了一长串证人的证词，但没有多少进展。关于有一定数量的刚果黄金运进了乌干达这个事实已经确定，对此，从未有人提出过疑问，但是对于人人都想知道的事情，如在什么情况下运到的，现在到哪里去了等问题，却没有搞清。乌干达的公众被蒙在鼓里，因为最令人瞩目的证词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而秘密听取的。重要的证人之一，刚果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尼古拉·奥伦加将军，甚至不在秘密讯问之列，没有机会作证。奥伦加在1966年3月8日提供证明，承认刚果革命派的钱曾用包括阿明在内的许多人的户头存入乌干达的国家银行。他

---

<sup>①</sup> 1971年4月阿明将军通过政变掌权后，公布了调查记录和报告，现在还可以在坎帕拉的书店买到。

说，他曾打电报给奥博特，要求乌干达政府冻结这些存款，因为其中有些已被盗用。

据 1972 年 10 月 29 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以后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奥伦加声称在喀土穆还存有其他记录文件可以证明之后，他被通知说，在得到这些文件之后，他将被再度传讯。但是沒有几天，警察袭击了他的家，闯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拉走了。临走之前，警察烧毁了一个皮包，据信其中装有上述证据。”

对于阴谋“企图使用武装力量或其他方式”迫使宪法失效，或推翻“根据法律成立”的政府等方面的控告，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沒有结果。正如著名律师阿布·马扬加先生在给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事实上宪法已被推翻，五名部长被强迫去职的情况下，居然去调查这些指控并一开头就遭到失败，那是非常可笑的。

几名前部长被委员会传讯。他们由狱卒加上手铐，衣衫褴褛，领带沒有系，胡子也沒有刮。他们被赶到议院大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就在这议院大厅，仅仅两个月前他们还坐在前座，作为部长发表演讲。他们的证词也是秘密听取的。

在这情势下的另一件怪事是马扬加-克拉克公司这个法律事务所所起的作用。克拉克先生代表阿明上校、奥纳马部长和內基翁部长，而马扬加先生则代表爱德华·穆特萨爵士对乌干达政府起诉，而马扬加先生是乌干达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这两位法律伙伴的会谈一定是一次相当有意思的经历。

爱德华爵士正在力求证明他仍是总统，并说 1962 年暂时中止宪法是非法的。然而，乌干达议会于 4 月 15 日以五十五

票对四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废除 1962 年宪法，采用新宪法。新宪法不仅规定设有执行总统，并且赋予中央政府以更广泛的权力。两天之后，巴干达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接受新宪法，重申 1962 年宪法仍旧有效。

至此，事情已经无法挽救。在 1966 年 5 月 20 日，卡巴卡又一次做出了有利于奥博特的事，他要求中央政府于十天內迁出布干达。坎帕拉是布干达的首府，而恩德培——乌干达唯一有国际机场的地方——也在布干达。

根据奥博特事后致非洲各国首脑的秘密备忘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 月 23 日，在卡巴卡的王宫，为了准备最后摊牌，把武器分发给部落成员；破坏了通往首都的道路并设置了路障；破坏了从坎帕拉向东和向西延伸的铁路线各三十五哩；切断了通往金贾和內罗毕的电话线；袭击了警察局。奥博特说，当他于 5 月 23 日发现自己面临着全面的叛乱时，他下令对卡巴卡进行武装进攻。

这个命令于 5 月 24 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开始执行。第一次的进攻被卡巴卡手下的一百二十名警卫队打退了。但是他们抵抗不住由阿明上校亲自率领的上千名乌干达步枪队的第二次进攻。一场倾盆大雨妨碍了视线，卡巴卡乘机设法从后花园翻墙逃跑。多亏一辆路过的出租汽车把他和他的侍从副官卡滕戴上尉送到一个可以步行去刚果的地方，然后再转往布隆迪。这段旅程费了他们五个星期的工夫。他们再从布隆迪乘坐一架沒有标记的美国飞机去布鲁塞尔，然后再乘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伦敦。卡巴卡在伦敦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他死于 1969 年 11 月，终年 45 岁。

根据乌干达官方公报，门戈山的战斗只有五人伤亡，事实上是几百人。作者曾和当地附近居民谈过话，他们说很多人死得很不必要——他们都是门戈山周围的普通老百姓。

奥博特致其他非洲首脑的秘密备忘录中有一段话颇堪注意，他声称真正的争端是关于布干达政府能给卡巴卡个人多少款项的问题。与1963年的发展计划有关的两张支票共计九百万英镑，曾转给了卡巴卡，他随即存入伦敦的银行。<sup>①</sup>奥博特和反对派的两个成员显然看见过这两张支票。

卡巴卡住在伯蒙齐他朋友借给他的一套公寓房子里。他唯一的收入就是救济金。对于一些微小的奢侈品如廉价酒之类，他还得靠朋友们从当地酒店买给他。根据工党政府威尔逊先生的意见，不准爱德华·穆特萨爵士回到他曾服役过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这一老团队任上尉，外交部还建议王室不要招待他。英国为了取悦奥博特总统，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奥博特不论当时或后来都没有想要讨好英国的表示。

对阿明来说，他经历了这些事件而没有充分理解它们的政治含义。他感到高兴的是沙巴尼·奥波洛托不再挡他的道，他阿明终于掌握了乌干达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兴致勃勃地埋头扩充和训练军队，从而为他的领导素质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他很感激奥博特和他叔父费利克斯·奥纳马在议会就黄金问题攻击他时所给予他的支持——他欣赏前往刚果进行冒险活动的刺激，虽然对于由走私得来的金钱于心不安。<sup>②</sup>由

---

① 关于此事，布干达议会以后曾作了调查。卡巴卡为了给王宫警卫队购置装备，曾把九十万先令（四万五千镑）送往英国。

② 参阅1972年10月29日《星期日泰晤士报》。

于奥博特需要他的支持，阿明就乐于去袭击门戈山，虽然他本人与卡巴卡素无怨仇，并且把他看作一名优秀军官。但是这件事情他干得过分热心，以致要用卡车连运几天，才能把尸体运到尼罗河禁区以外的地段，扔在河里喂鳄鱼。以后，阿明又把乌干达军队里的机械化营和伞兵训练队开进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卡巴卡的王宫。这种对王宫的破坏和掠夺也是完全不必要的。

奥博特博士在门戈山战役中取得他同卡巴卡激烈斗争的胜利。这次军事政变有一个方面是奥博特没有能够了解其后果的，倒还是阿明比很有智慧的总理判断得更正确。那就是这次对卡巴卡的袭击对种族关系的影响。阿明很清楚，巴干达族是永远不会饶恕奥博特，也不会饶恕那些支持他的兰戈族人和阿乔利族人的。阿明知道，门戈山战役将无限地恶化乌干达本已紧张的部族局势。阿明以他农民的本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 第五章 和奥博特的最后对抗

奥博特博士一定相信，他对卡巴卡的处理已引起了巴干达族人的极大仇恨，甚至不值得设法去同他们和解了。在门戈山战役之后，他开始竭尽一切可能使他们丢失面子：他命令阿明把士兵驻进历代卡巴卡的古宫和被解散了的巴干达议会的房子“卢基科”；他把布干达硬分成四个区；他取缔布干达的各个政党；他根据紧急条令，拘留了每一个他要拘留的穆干达人，因为他怕这些恨他的人，他怀疑他们具有颠覆的潜力。最糟的是奥博特让他的表兄弟阿凯诺·阿多科领导的秘密警察——总务部的人——在布干达横行霸道。发生多起逮捕、袭击、抢掠和杀人事件。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在1966年5月到6月到底死了多少巴干达人。在1969年卡巴卡逝世时，奥博特阻止他以前的臣民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哀悼。当 they 要进入布干达历代卡巴卡的陵墓时，摆好了开枪姿势的士兵把他们赶了回去。最后，奥博特强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他当权期间一直未予解除。正如塞尔温·道格拉斯·瑞安在1971年6月的《姆瓦佐》上分析奥博特的经历时说：“对巴干达人的处理失当，肯定会使任何精心组织的政变得到乌干达腹地的自动支持。”

没有迹象表明阿明反对过任何这样的做法。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当时必须应付由于奥博特如此对待布干达族而在



军队中引起的种族后果。关于这一点，阿明出于农民的本能，早就预见到了。在所有重要的军事中心——金贾、莫罗托、姆巴拉拉、马辛迪、恩德培——都发生了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武斗。由于在军队和警察中北方人占大多数，不难想象发生了什么情况。关于被害人的可靠数字，现在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阿明作为武装部队的司令官，总是很快地到达出事的现场。他在恢复纪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勇敢和机敏，使他的声誉日益上升。在这时候，他仍与奥博特非常接近。奥博特于1966年8月24日宣誓就任乌干达的执行总统，他所起草的新宪法规定他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奥博特的地位依靠军队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靠阿明的忠诚，这一点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奥博特要把军队扩充一倍，这就给阿明带来了很多工作和无穷尽的问题。但是他乐于做这样的工作，就他有限的经验来说，他处理这些工作还是很有办法的。有一段时期，虽然有以色列和俄国的训练小组和技术顾问以及苏联的武器和装备，阿明还是设法贯彻他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部队守则。阿明不大尊重俄国人，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因为他不喜欢他们的政治，也不了解他们的态度。他们和英国军官完全不同。而且，正是英国军官把阿明造就成一个军人的，他们的军事制度也是他极愿保持的。

在这种新的统治下，从表面看来，乌干达的情况还算不错。1967年，奥博特签署了东非共同体条约，这是从英国殖民地时代起就议论很多的办法，它把东非三个国家组成一个经济实体。这个经济实体没有关税壁垒，有统一的货币，有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贸易和规划新企业，当然还有统一的陆、

海、空交通。奥博特也为他在教育上所取得的进展感到自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八是用于教育方面的。两年之后他能自夸地说，小学在学人数已由1962年的四十三万五千人增至1969年的六十三万六千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九千五百人增为四万二千人；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一千五百人升为三千四百人。他还促进了非洲化：到1969年文职人员中百分之八十是非洲人；所有农业生产和分配，包括各种市场的管理，都在非洲人手中；百分之四十五的零售商业属于非洲人，同时他们也开始从事商业和工业。

但是这仅是表面现象。奥博特知道得很清楚，事实上乌干达还远远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不仅仅是由于巴干达人仇恨他和继续阴谋反对他，而且也因为他自己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内部也有纷争。人民大会党党员已失掉了把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摧毁巴干达人的统治和保守主义。现在，他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对权力和特权的分配多寡发生争吵。此外，北方尼罗河流域的各部族间还有个人的和地区性的敌对情况，激烈的对抗情绪波及军队和警察，从而成为与阿明个人直接有关的问题。

在1967年，奥博特得出结论：假如他想把这个国家捏在一起，他必须给它指出新的方向；鉴于他的信念以及他对尼雷尔总统最近在阿鲁沙宣言中阐明的非洲社会主义的钦佩，奥博特宣布“向左转”。1968年，他强行在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若干“社会主义”决议。然后，又同他那为人所痛恨的表兄弟阿凯诺·阿多科拟定了《平民宪章》。1969年12月18日，他在坎帕拉体育场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

上提出了这部宪章。

《平民宪章》娓娓动听地大谈个人的充分安全、平等和自由，然后许下诺言，要结束既得利益者的统治，宣布要同贫穷、愚昧、疾病、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隔离作斗争，保证提高生活水平。《宪章》的积极建议是成立一个青年训练中心，规定没有工作的青年参加两年的劳动服务以代替服兵役。另外还要发展经济和教育，使更多的非洲人能够得到工作。由于没有足够的外国投资，乌干达必须通过人人都要捐款的国民安全方案自筹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最后，还要成立一个合作银行，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关于所拟订的外国投资(保护)法令，没有人十分了解它的意义。但是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干涉，对此奥博特自己党内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也是反对的。它并未受到热烈欢迎，在会上提出来的经过仔细讲解的要求奥博特把乌干达变为一党制国家的决议，也是毫无生气地一致通过的。

1969年12月18日，当奥博特走出会场时，他受到来自近处的枪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谋害他的生命)，子弹从他脸部穿透，严重地裂伤了他的舌头，人们曾认为他不能够再说话了。他对这次图谋暗杀案的反应实在是极端的。奥博特在病床上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解散除执政的人民大会党以外的一切党派，并授权阿凯诺·阿多科随意把人抓起来、关起来和驱逐出境。这时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奥博特非常不得人心，<sup>①</sup>而阿明的不愉快的任务是迫切需要解决部

---

<sup>①</sup> 据英美主要报纸的记者报道，在好几个地方，军队向公众开火，不少非洲人被杀害。

队士气下降和纪律松懈的问题。与此同时，奥博特冻结工资和薪金，虽然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当普通老百姓过着困难的生活的时候，却有确凿消息证明身居高位的人生活腐化。有个别部长拥有汽车多至三辆，城里城外都有房子。有一个人甚至还拥有一架飞机。

奥博特在康复以后，决定把政治引进民政机关和部队，以巩固他的地位。文职官员不偏不倚的英国传统被抛弃了，要想得到提升就得表示自己忠于人民大会党。根据阿凯诺·阿多科的意见，奥博特挑选他自己部族的人，把他们放到部队和警察的主要岗位，借以分裂军队；他收买和利用那些反对自己战友的高级军官，借以形成一支以内阁官署为中心的“敌对军队”。至此，奥博特和阿明的嫌隙就变得很明显了。阿明不能原谅奥博特把军队卷入党派政治，也不能原谅奥博特以总务部的名义，在他所讨厌的阿凯诺·阿多科的领导下，形成一支敌对部队，从而削弱了他的地位。

奥博特总统用众所周知的纳基武博声明进行回击。1970年5月1日他宣布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措施。国家将接管百分之六十的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和基伦贝铜矿，补偿费用由以后利润中提取偿还。国家垄断进出口，奥博特并指定由亚洲百万富翁贾扬特·马德瓦尼负责。

阿明和他的朋友没有时间去看这一大套意识形态；他们所要求的是提高军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而这种提高却毫无迹象可寻。与此相反，由于大部分警察忙于在布干达推进紧急条例，一般的治安大大恶化。虽然法律规定在乌干达私人不准拥有武器，但是谁都知道，在每个城市——如果不是在每个

农村的话——可以按日出租金租到武器。盗窃、敲诈勒索和“孔多行为”(由职业暴徒或孔多人进行武装抢劫)盛行一时。

奥博特和阿明之间最终的对抗发生在1970年夏天。据这两人周围的核心人物传说,他们的对抗是直截了当的;知识分子奥博特面对着的是尼罗河流域农民和朴实军人的愤怒。双方的指控旗鼓相当,各不相让。奥博特声称,他是在建设一个国家、一个统一的乌干达,在这个国家里,没有阶级或财富差别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将逐渐享受到安全富裕的生活。他抱怨军队给他的帮助少得可怜。阿明不能以谈论未来的政治格局来进行搏斗;他能见到的是奥博特和阿多科的专制、自由的丧失、普通人民的贫困,以及奥博特手下的人生活上的腐化和奢侈。奥博特回敬说,阿明不能约束他的部队,甚至有人卖了武器买酒喝,因此可以证明阿明并不忠诚,破坏了他的政治努力。两人互相指责了几个钟头,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也没有达成妥协。阿明最后的愤怒指控是:奥博特制订的1971年大选条例太复杂,连律师都弄不明白——因为每个候选人必须参加四个选区的竞选,得到全国四个不同部分的人民的支持。只有富翁或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才有当选的机会。奥博特的答复是怒气很盛的,完全不尊重阿明的聪明之处,但他不能否认阿明的话是有道理的。

从此以后,事情看得很清楚,一场不是奥博特便是阿明必须取得彻底胜利的、誓不罢休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奥博特不能简单地把阿明抓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太多了,并且他能够发动一场叛乱。所以奥博特只好小心谨慎地对付阿明。但计划已经拟定了,指定了两名准将分头接管陆军和空

军。1970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乌干达独立第八个年头——取消了，表面上说是因为纳赛尔逝世，实际上是因为阿明已被软禁，奥博特不能冒与军队为敌的危险。1970年10月9日，为了要维持一种情况正常的印象，奥博特在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出席的情况下为麦克雷雷大学改名东非大学主持庆祝典礼，并就任该大学校长。阿明被准许出席，并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有一个大学生对作者说，“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他，而是因为我们很高兴，在逮捕了这么许多人以后，至少有一个人——阿明——被释放了。”

这时由于英国向南非出售武器，奥博特卷入了同英国的争吵。他要去新加坡参加英联邦会议，以支持他的朋友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他们要迫使英国放弃把两艘护卫舰、三艘潜水艇卖给沃斯特的打算，如果英国顽固坚持的话，就要求解散英联邦。为了能够离开乌干达，奥博特不得不同阿明达成某种协议，而阿明也想获得自由，主要是因为他怀疑阿凯诺·阿多科正在策划要搞掉他。

1971年1月11日，在他动身去新加坡的前两天，奥博特把阿明叫进他的办公室。他桌上放着两份临时报告，一份是总审计长关于1970年的年度报告，另一份是关于高级军官奥科亚准将和他妻子在古卢被谋杀的报告。据总审计长声称，国防部1970年开支超过预算一百五十万英镑，还有一笔一百一十九万一千四百三十四英镑的开支是没有经过批准的，共计二百六十九万一千三百四十三英镑的开支没有由阿明的那个部说明原由。总审计长评论说，“会计标准下降得很多。”

总统和他的军队总司令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现在没有

记录可考。但据了解,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阿明的前途乌云笼罩。现在奥博特说,那时是以色列人把他的安排告诉阿明的;很可能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确实给了他一点暗示;但是即使并无此事,阿明军队里的朋友也能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971年1月13日,奥博特动身前往新加坡,阿凯诺·阿多科飞往伦敦。这时发生了一件足以决定历史进程的意外事件。1月24日傍晚,奥博特从新加坡打电话到金贾兵营军官餐厅,指示一个心腹副官逮捕阿明及其亲信。奥博特从远处,也可能根据尼雷尔的意见,清楚地看出应该怎么办。但是电话交换台的接线员离开了片刻,一个卡克瓦士官长穆萨偶然走过,拿起了听筒。他把电话给大卫·奥伊莱·奥乔克中校接通了,但偷听了他们的对话。几分钟之内,穆萨和同伙的西尼罗河地区的士兵们控制了军械库,以防阿乔利和兰戈族取得他们所需要的武器。

伊迪·阿明·达达少将那天出去打野鸭了。他大约在傍晚七点钟才回到家里,这时穆萨开了一辆坦克车来把奥博特的计划告诉了他。同时,国防委员会(奥博特不准开会已将近两年)里的阿明的朋友们准备实行他们的计划。

十八个月以后,据说阿明曾向《埃及日报》编辑阿尼姆·阿布尔·埃内姆叙述了所发生的事件,但说法不同。他说,在1月23日夜里,奥博特给奥伊莱·奥乔克中校打来了一份电报,指示他杀害所有非阿乔利和非兰戈族的军官。1月24日下午,兰戈和阿乔利族的士兵解除了其他部族士兵的武装,但是战斗爆发了。阿明是在当天下午六点钟打猎回来以后才知



道这件事情的。他立即与各营联系，叮嘱他们不要为某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打起来。然后别人才把奥博特的指示告诉了他。他在枪口之下被禁锢了八个小时，因为他拒绝接替奥博特的位置。他说，“我的想法是要把奥博特叫回来，解决纠纷。”后来他补充说，“当时如果我再不同意接管政府的话，我可能要被他们枪毙了。”

这个报道发表在1972年7月31日《埃及日报》上。它有两个漏洞：阿明的朋友们是如何能够看到奥博特打给奥伊莱·奥乔克的电报的，如果是穆萨士官长想办法弄到了电报，为什么根本不提到他呢？在1971年1月份里，穆萨士官长被普遍地欢呼为乌干达的救星之一。

1971年1月25日清晨二时，在坎帕拉可以听到轻武器、迫击炮和坦克炮声。当全城不时回荡着射击声时，部队把平民赶出了大街。士兵们包围了议会大厦，占领了广播电台、邮局、火车站，以及银行等其他重要建筑物。在开来一辆坦克向大门口开了一炮之后，恩德培机场关闭了。有若干非洲人死于非命。然后士兵们开始向挂在街头一座建筑物顶上的奥博特的巨幅画像射击，因为他预定要在那天傍晚回国，所以挂出了他的画像。两个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琼·保罗·德默斯和杰拉尔德·佩劳尔特不幸走进了射击线而被打死了。

政变发生时，坎帕拉的大部分居民正在睡梦中。非洲医学研究基金会（人们熟知的名称叫飞行医生会）主任迈克尔·伍德和两个朋友当时住在阿波罗旅馆（现称坎帕拉国际饭店）。那两个朋友一个是阿兰·林塞尔医生，他在马萨伊和卡克瓦部族中间进行癌症研究工作（也代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另一个是亨利·福伊医生。1月25日早晨，他们和一位旅馆侍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们要吃什么早饭啊，先生？”

“你们有些什么东西？”

“有炒鸡蛋、煎鸡蛋、火腿蛋、熏鳕鱼，还有，我们夜里发生了一场革命。”

“再说一遍——你们有什么？”

这个穆干达侍者眼睛发光，重复了一遍菜单，加上那条新闻。

“你说是一场革命？在哪里？”

“就在这里，先生。请看看窗外吧！”确实，几辆坦克停在议会大厦外面。人群从四面八方拥来。巴干达人在街上跳舞，又唱又笑，并且为阿明欢呼。有一张标语这样写道：“阿明——我们的基督。”有一种很难令人相信的安心的气氛，好象布干达刚从长夜恶梦中醒来似的。

乌干达电台开始解释说，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坏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列举很多事实：人民已经陷于忧患和不幸而怒火中烧；大量的无辜平民不经审讯而遭到长期的非法拘留，他们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名；全国紧急状态无限期地延长，这对每一个人都毫无意义；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人民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暴力抢劫和‘孔多行为’几乎天天发生，人们经常遭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当局却不采取任何步骤加以制止。人民感到完全没有保障，而‘孔多行为’则与日俱增。”电台揭露说，党内的“贿赂加上对人民的威胁，完全揭穿了所谓选举的结果是什么玩意

儿”。计划在 1971 年举行的全国选举的烦琐规定，的确引起了很大义愤。电台继续广播道：“附加税已经使我国的老百姓比以前更加贫困了。老百姓必须负担的捐税有这样一些：经济发展税、毕业税、营业税、社会保险基金捐。大人物逃避这些捐税或把它们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所收获的如棉花和咖啡的价格没有提高，有时还下降，而食品价格和教育费用却不断上涨。”

这正是普通乌干达人所要听的，这正是他们所感受到的。广播继续说：“把我国从非洲统一体孤立起来的各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例如，把工人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打发走，不准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使用乌干达货币，阻难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进口商品，停止在乌干达境内使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货币。一个有钱的领导阶层经常侈谈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却越来越富，老百姓越来越穷，总统就是这个阶层的主席，他们这个原则也是很错误的。”

了解阿明的人几乎可以从这段广播里听到他的声音：“此外，国防委员会从 1969 年 7 月以来就没有开过会，这使得部队的行政管理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结果，军队人员缺乏住宿条件、车辆和配备。很早以前就提交给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募兵计划一直没有实施。内阁官署训练了大批人员，其中大部分来自兰戈地区阿科科罗州、即奥博特和总务部长阿凯诺·阿多科的家乡，这样做的结果是内阁官署变成了第二支军队。于是乌干达就有了两支敌对的军队——一支在内阁里，另一支是正规军。1967 年拟定的兰戈发展总规划规定，乌干达的政治、商业、军队和工业方面的所有重要岗位都应由

兰戈地区阿科科罗州的人掌握和控制。同一总规划还规定，不得在其他地区、特别是阿乔利地区搞重要的建设。这是牺牲乌干达的其他地区来重点发展兰戈地区的阿科科罗州。”

兰戈发展总规划是否存在，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在1971年1月，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相信有这种规划。人们还相信乌干达电台的广播：“奥博特听从阿凯诺·阿多科的意见，力图使乌干达武装部队和乌干达其余的部分陷于分裂，其办法是提拔他自己部族的人，把他们安插在军队和其他重要岗位上，例如总务部长、进出口公司、乌干达肉类包装公司、公务委员会、乌干达纺织公司，以及将设在兰戈的俄国纺织厂。自1962年奥博特执政以来，军队一直是他的最大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军队一直试图用不接管政府的实际行动来为整个非洲作出榜样，我们一直是遵守这个原则的。因此，现在看到奥博特企图把内阁官署变为另一支军队以分裂和贬低军队，我们感到震惊。”

广播用一些必定直接来自阿明本人的话语作为结束：“由于上述理由，我们乌干达武装部队的军人决定今天接管奥博特的权力，并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的战友，我们借这个机会委托他担负起领导我们亲爱的祖国乌干达走向和平和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道路。”

之后，乌干达电台号召“每个人和一切政府部门继续照常工作”。电台还警告外国不要干涉乌干达的内政。“我们将与邻近的和所有的非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开始发展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的友谊。”电台还警告说，在另有通知以前，晚上七时到清晨六时半的戒严将继续执行。

然后，阿明亲自对人民讲话，他宣布说：“乌干达武装部队的军人已把政府委托给我，从而使我掌握了这个国家。我不是政客，而是个职业军人，因此，我讲话不多，在我整个职业生活中我讲话一向都是非常简短的。我曾强调指出，军队可以支持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文职政府，我至今并未改变这种立场。

“但是，乌干达目前存在的局势迫使我接受了乌干达武装部队军人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根据这样的理解，即我的政府将是一个看守政府，以待早日恢复到文官统治。在局势安全稳定之后，即将在全国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参加这种选举。因此，政治流亡者可以自由地回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在押的政治犯将立即释放。所有的人都要象往常一样上班工作。我将根据消息进一步提供情况和指示。乌干达共和国万岁。”

次日，即1月26日，阿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前总统自新加坡电话指示兰戈族和阿乔利族的士兵前往攻击并解除其他部族部队的武装。他是在1月24日深夜才知道这个计划的，于是就推行了一个反计划，其结果是接管了政府，并推他主持一切事务。他还说，被废黜的总统如果愿意，可以自由回来，并说他准备允许把布干达以前的卡巴卡即死于伦敦的爱德华·穆特萨爵士的遗体运回，按照传统的葬礼同他的祖先埋在一起。

巴干达人对此的反映是狂热的。但是，这与1月28日释放五十多名被拘留的人所引起的兴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被释放的人中有1966年被奥博特抓起来的五名前部长以及

阿明的老对手、前陆军司令沙巴尼·奥波洛托准将。释放仪式在坎帕拉的卡洛洛小型机场举行，机场上挤满了欢乐的乌干达人群。1962年肯特公爵就是在这里把独立证书交给当时的总理奥博特博士的。

阿明拥抱了前拘留犯，并对他们说：“再过几分钟你们就将获得自由并同乌干达其余的人民在一起了。你们将在一个异常兴奋和欢乐的时刻同他们会合在一起。”等到安全的情况许可，政府就会容许充分的政治活动。他又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产生仇恨和敌意的余地——只有爱和友谊。”

最后他说，“乌干达将留在英联邦之内，对于英国为使乌干达对独立有所准备而作的努力，我谨此表示热忱的感谢。”

在乌干达变动频繁的历史上，即使有欢乐的日子，也很难同1971年1月28日相比。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妥当，就要顺利地向美好的未来迈进了。

## 第六章 第一年

阿明将军大体上指派了文职人员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任职。他从那些受过英国不介入政治的传统训练的高级文职人员中物色人选。对这些人来说，在他们尚未见到阿明之前就在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自己的任命，多少总有点吃惊。但是他们都愿意接受任命。阿明把对外事务委托给他的姻弟瓦努梅·基贝迪主管。他是一位二十九岁的伦敦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校时给他的指导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坚强的性格，而是他那种安祥明理的态度。很少有人怀疑基贝迪是否有一定的能力在对外政策方面充当将军的顾问，但很多人怀疑，当阿明言行轻率时，他是否能够挺得住。以后的事实已经证明，阿明不仅不征求基贝迪的意见，而且只要他觉得合适，甚至不把他想推行的一项新政策告诉这位外交部长。

阿明政府中唯一的职业军人是 E. A. T. 奥比特里-加马中校，他被指派负责内务部。在政变仅仅两周以后，即在 2 月 8 日，阿明便命令他的文职部长取得军籍和参加军事训练，并且宣誓捍卫他这位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2 月 20 日，在精采的仪式中，陆军和空军军官把阿明晋升为陆军上将；在国家宫，部长会议请阿明出任总统。新总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宣布解除宵禁和紧急状态，但是那些希望很快恢复民主政治的人很感失望的是，他又宣布他要连任总统五年，在此



期间停止一切政治活动。

巴干达人兴高采烈，因为阿明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指定一个部长级的委员会，组织安排卡巴卡遗体的运回和安葬事宜。饶有趣味的是，该委员会只有主席阿布·马扬贾是穆干达人（他曾于1966年给调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被奥博特监禁起来，因为他批评了奥博特的某些专制措施）。其他五位部长瓦努梅·基贝迪、J. H. 盖萨、J. M. N. 齐库苏卡、E. A. T. 奥比特里-加马中校和查尔斯·奥博特-奥丰比都是来自非王国地区的。委员会有六周时间来为一套完全合乎习惯仪式的军人葬礼拟出细节。为了保证遵从古老习俗，委员会还指定了四个由巴干达王室成员和氏族首脑组成的顾问小组委员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巴干达人都要求把卡巴卡的遗体迁葬回国，其中反对最力的大概是被前奥博特政权驱逐出境而住到伦敦去的巴干达人。

英国的邮政工人罢工造成了乌干达与英国之间邮政交通的困难，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特别是前布干达的卡蒂基罗（总理）的忧虑。他们收不到国内的来信，想要在挂“海外电话”的长队里排上队，叫通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伦敦流亡者的怀疑态度的新闻报道却传到了阿明那里，他在1971年3月3日给他所有在国外的代表发了电报，声称关于已故爱德华·穆特萨爵士的葬礼事宜，他不愿被牵连到报纸或公开讨论中去。他还指示他们给反对葬礼的人安排赴坎帕拉的飞机票，好让他们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驻伦敦的乌干达高级专员公署为布干达的卡蒂基罗·恩扬贾-纳坎吉先生和前布干达首席检查官姆潘盖先生购买了来回飞机票，他们在

新总统保证安全通行的条件下飞往坎帕拉。

卡巴卡的儿子和继承者罗纳德·穆泰比王子的保护人和教父罗纳德·欧文上尉和卡巴卡的密友理查德·卡尔-戈姆少校(卡巴卡曾经住在伯蒙齐的他的那套房子里并死在那儿)收到来自乌干达的电话通知,说王室和布干达长老们并未改变于1969年给他们的指示——在恢复卡巴卡王统以前,卡巴卡的遗体应留在伦敦。要他们尽一切可能保证遗体不交给新政府。(遗体的具体地点在乌干达国内是不知道的,虽然奥博特的情报人员想尽办法寻找它。)

3月9日,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被请到伦敦的乌干达高级专员公署,由高级专员代表阿明将军对他们为已故卡巴卡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将军希望他们给予协助和出席在乌干达举行的葬礼。高级专员谈到阿明将军的“十三条”,其中的第十二条规定不恢复君主体制。他说他意识到葬礼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他不站在任何一方,只是执行命令。

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解释说,在更充分地了解布干达王室和卢基科(布干达议会)的愿望以前,他们不能协助把卡巴卡的遗体空运乌干达的安排,他们也不会参加在乌干达举行的葬礼。卡巴卡生前的愿望是,如果他在流亡中逝世,应当把他安葬在英国,等到卡巴卡王统恢复以后再迁葬到他祖先的陵墓里去。

高级专员希望知道,他们两人的行动需要得到王室里面的哪位成员的同意?这两个英国人提到了卡巴卡的姐妹姆波洛戈玛公主(她被奥博特拘留,后来被阿明释放)、罗纳德王子

的母亲莎拉·科索松科莱夫人和卡巴卡的叔叔巴德鲁亲王。高级专员告诉他们，一个由阿明将军的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将于几天内抵达伦敦，他希望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能向这个代表团表示他们的意见。

3月12日，由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提到的四个王室成员中的两个和布干达长老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希望遵照乌干达政府的安排，把爱德华·穆特萨的遗体运回国内。卡巴卡的寡妻向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阁下申请批准，把她丈夫的遗体掘出来运回乌干达。

乌干达高级专员公署用电话告诉欧文上尉，指名给他个人的文件已在邮寄伦敦途中。没有参加签名的姆波洛戈玛公主给她在伦敦的兄弟亨利·基梅拉亲王打电话说，她曾拒绝签署该文件，仍坚持反对把她兄弟的遗体运回乌干达。亨利亲王写信给伦敦主教（遗体葬在他所管辖的教区内），希望他拒绝为遗体迁葬提供方便。律师们也得到指示，在进一步谈判之前，如果有人采取行动想取得遗体，应向法院申请加以制止。

时间越来越近，离计划中的葬礼日期不到三星期了，邀请各国首脑参加葬礼的信件已在分发的过程中。阿明曾宣布葬礼是“全国和解的行动”，但他有很实际的理由相信，他的计划可能遭到失败。

3月14日，为了打开僵局，阿明邀请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到乌干达讨论葬礼事宜。欧文上尉在满足某些条件之后接受了邀请，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罗纳德王子将担任什么角色。十五岁的王子不愿他父亲的遗体运离英国，如果他

不能陪同运送的话。他也了解以前的政权宣布过，只要他一踏上乌干达的土地，他就会被逮捕。

就这些条件达成了协议，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于3月18日飞往坎帕拉。阿明将军亲自提出保证，在罗纳德王子呆在乌干达的时期一定对他的安全负责，并监督在巴干达举行的一切仪式。卡巴卡的姐姐姆波洛戈玛公主仍然拒绝签署请那两位英国人协助办理葬礼的文件，但同阿明会谈了两小时以后，她同意不再积极反对所作的安排。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因为她在巴干达人中间很有威望，她本来可以影响许多人不参加葬礼。

在坎帕拉，有几个代表团向卡尔-戈姆少校和欧文上尉表示，他们强烈反对在沒有恢复卡巴卡王统以前把卡巴卡的遗体迁回国内。但是他们直接了解到，巴干达长老们和王室大多数成员是希望在乌干达举行葬礼的，并且他们还取得罗纳德王子的母亲的同意，让王子参加葬礼。

在取得如此广泛的并得到阿明亲自保证以后，这两位英国人决定对总统的一切安排给予合作，把卡巴卡运回乌干达，按照习俗举行葬礼。

在欧文上尉在坎帕拉的期间，一个乌干达的特工人员向他明确地讲，卡巴卡喝的酒是在1969年11月21日被奥博特的一个特务下了毒药的。

对阿明来说，在他统治的初期，卡巴卡的葬礼是极为重要的，他个人的威信不仅取决于葬礼的举行，而且也取决于葬礼举行得很妥善。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需要得到英国人的帮助，但他的要求提得太慢，因而产生了后来的忙乱。

英国政府一接到关于提供一位军官负责拟定计划和监督仪式的要求后，很快就行动起来，并派出了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保罗·科德尔少校。他于1971年3月27日离英。他同阿明和谐地紧密合作，规划和排练错综复杂的葬礼程序——包括把棺材用直升飞机和炮车运送，经长途步行把它抬进教堂，然后抬进在卡松比的王家陵墓。在葬礼中，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乌干达陆军担架队和仪仗队的表现是无瑕可击的。

阿明愿意把卡巴卡的遗体运回国内，这一举动激发了深刻的感情——主要是在巴干达人中间，虽然不仅是他们。一月政变以后，布干达全境欢欣鼓舞，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六十三年内，拘留了三十五人，而在奥博特统治的五年内，却有四千多人被拘留，其中三千八百多人是巴干达人。巴干达人特别希望阿明能够同情地看待他们所尊敬的卡巴卡王统制度。尽管将军擅自要连任五年总统，他安排卡巴卡的遗体运回本国这一举动却使他们对王统的恢复抱有希望。

阿明让布干达人把坎帕拉附近的卡巴卡的陵墓和其他王陵修缮一新，是很聪明的办法。他们乘卡车和马车从布干达最遥远的地方赶来，自愿地一起动手。每天晚上，在收工以后，他们敲着鼓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回家。

当运载装在玻璃棺材里的爱德华·穆特萨爵士的遗体的飞机在恩德培降落时，六十名身穿肮脏白袍的老鼓手打起王家乐鼓来用音调宣告卡巴卡的逝世。王室成员和他们的朋友悲哀地挤在飞机跑道上。然后九名身穿正式军服的高大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战士把棺材从飞机的前头抬下来。阿明总统检阅了仪仗队，乐队奏了国歌，士兵放了礼炮七十三响，棺

材用直升飞机运二十哩路到破坏得很厉害的卡巴卡的旧宫，因为阿明要他最勇敢的部队机械化营和伞兵训练队向他们以前的总司令致敬。部队站成四方形的三条边，在第四条边上筑有一台，阿明、罗纳德·穆泰比王子、他的保护人罗纳德·欧文少校（原文如此。——译注）和英国高级专员理查德·斯莱特等人坐在台上。直升飞机把棺材徐徐降落在四方形场地的中央；于是在场的人列队从棺材前面走过，向乌干达军队的前总司令爱德华·穆特萨爵士致敬。

棺材又被从门戈山运往坎帕拉的纳米伦贝教堂，由西里尔·埃德加·斯图尔特主教出来迎接，停灵在汉宁顿礼拜堂里。在这里去掉外棺，列队走过的人能够看见玻璃棺里的爱德华·穆特萨爵士。他那用防腐香料保护好的遗体穿着总司令的军服，他的勋章放在他脚边的一个垫子上，他的脚上穿着擦得净亮的黑皮靴。人们的队伍至少有七哩长，呜咽的声音连成一片，许多人当众号啕大哭。

亲友们可以优先入内。突然，礼拜堂里送丧的人看到一个身穿军服的彪形大汉慢慢地走了进来，没有人陪同。阿明总统再一次前来致敬了，如果不是对卡巴卡，那也是对一位英勇的军官同事、一位优秀的军人表示敬意。正如他进来的时候一样，阿明悄悄地、毫不招摇地离开了教堂。三天以后他又出现，这次是以正式官职身分出席教堂里举行的主要礼拜的。斯图尔特主教的讲道以“再见吧穆特萨”作为结束。

接着就是布干达葬礼。一长列汽车最后一次跟在棺材后面前进，大路两旁挤满了致哀的人群。弗雷迪国王的儿子罗纳德·穆泰比王子的指导老师马克·艾默里是已故卡巴卡的

好友，他在1972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说：“卡巴卡在那里落葬的陵墓是全布干达最宏伟的建筑物，最神圣的地方……。棺材放在墓门外的棺架上，一位主教做了祷告，放了花圈。在我的脚边，有一个跪着的妇女不断地把头碰撞我们所站着的平台的台阶上，虽然她不停地呜咽着，她的眼泪一落到那晒热的木头上就几乎立刻干了。棺材运到了里面，放进墓穴，理查德·卡尔-戈姆在边上进行了简单的仪式。然后人们被放进来，虽然已看不到什么了，他们还是尽量往前挤……。人群散得很慢，布干达人将在以后的好几天在山头一带徘徊。葬礼快结束的时刻，在奏安息乐的时候，晴空突然下雨。一些传说想必就是这样开始的：连苍天都掉泪了。”

卡巴卡的葬礼在乌干达内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阿明表现出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主人，特别是对他的英国客人更加如此。葬礼举行以后，他亲自送他们到恩德培机场，甚至到飞机机舱里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当他最后离开时，他们自发地对他鼓掌欢呼。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怎么减轻阿明的基本问题：一月政变以来，已经紧张起来的部族形势的不断恶化。虽然巴干达人与政变毫不相干，它使北方分裂到这种程度，连阿明的西尼罗河的部族同胞都几乎同奥博特的兰戈族和阿乔利族的支持者打起仗来。阿明很清楚地知道，奥博特在军队里的支持者几乎在所有的军事机构里对政变进行了反抗，他们有许多人被杀掉了。1971年2月10日，布里奇特·布卢姆在《金融时报》上报道说，负责古卢兵营的上尉曾向她承认，在他被派去“清理事务”的第二天，“忠诚的军官和持不同意见的军官进行一



场较大的炮战”。奥博特在军队里的其他支持者带着武器和弹药逃进了森林，开始了游击活动。阿明宣布，自首者可以不加追究地得到原谅，可以不受伤害——但在若干情况下，这一保证显然没有被遵守。

阿明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得到干达人的支持；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就非恢复卡巴卡王统不可。但他玩弄这个想法。当卡巴卡的儿子、后嗣和根据巴干达族的规矩是卡巴卡的继承者罗纳德·穆泰比王子于1971年8月因学校放假回乌干达度假时，阿明把他介绍给巴干达长老们，并极其周到地款待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但在10月9日的独立九周年庆祝会上，阿明坚定地宣布，乌干达将仍旧是个共和国，不恢复任何王权。在这个问题上，阿明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这使帮助他取得政权的青年军官感到满意，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发生政治纠纷，他不能依靠南方。

尼雷尔总统的行为大大地增加了阿明的困难，他不仅拒绝承认阿明是乌干达国家元首，而且称他为“非洲自由和进步事业的叛徒”。坦桑尼亚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给阿明起个绰号叫“冲伯第二”。尼雷尔让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政府官员和由政府控制的报纸不断地攻击阿明及其政权。尼雷尔还把前总统奥博特安置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国家宫里，保护乌干达的一切难民，并准许他们从事游击战的训练。阿明对此的愤怒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作为一个卡克瓦人和一名军人的自尊心被伤害了，他渴望对“软弱、无礼和不可靠的尼雷尔”下手。尼雷尔和奥博特的攻击对阿明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算过分的。他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许多错

误，都是由于他在盛怒之下决心要向这些“一钱不值的家伙”证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非洲人。奥博特对政变的斥责特别使他愤怒——归根到底，难道不是他阿明根据奥博特的命令推翻了卡巴卡的吗？难道奥博特不也是通过政变建立政权的吗？阿明筋疲力尽，1972年10月不得不住进医院，这一部分是由于尼雷尔和奥博特所给他的侮辱，特别是因为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以及索马里、几内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刚果(布)的领导人跟着拒不承认他的政权。

当这位将军显然已经能够完全控制局势时，英国马上就承认了阿明政府。加纳、马拉维、利比亚和澳大利亚也很快就承认了，但乌干达最重要的邻邦肯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却保持沉默。尼日利亚的雅库布·戈翁将军是通过军事政变而获得目前的地位的，他宣布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他的高级专员继续留在坎帕拉。大部分其他国家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但是，2月2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上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冲突。以坦桑尼亚为首的一些非洲国家拒绝让阿明的代表瓦努梅·基贝迪及其随员占有乌干达的席位。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则制止奥博特的代表、前外长萨姆·奥达卡及其随员代表乌干达。最后，这次会议甚至连议程都未讨论就不得不休会了。显然，预定6月在坎帕拉(那里一座价值七百万英镑的会议大厦已将竣工)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将面临困难。结果会议延期至9月在摩加迪沙举行，但是阿明没有参加。不过，这次瓦努梅·基贝迪没有受到阻难就出席了。

比尼雷尔总统的攻击更为重要的，是乌干达军队中的部族斗争。1971年7月，在姆巴拉拉、莫罗托和金贾等地的兵营中，发生了阿明的卡克瓦部族人和兰戈、阿乔利部族官兵之间的冲突。这一系列流血事件的开始，是由于一名阿乔利中士害怕一群主要是卡克瓦族的新兵要杀害他，就用轻机枪把他们都扫倒了。瓦伦廷·奥西马中校是阿明一月政变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下令逮捕所有兰戈族和阿乔利族的士兵。后者之中很多人作了抵抗，在姆巴拉拉兵营被杀害的就达三百人之多。在莫罗托，死的人数很可能高达六百。在金贾，骚乱似乎是由于被拘留在军火库附近小屋内的兰戈和阿乔利族士兵从房顶上爬出来武装了自己而发生的。他们向任何想要接近军火库场地的人射击，最后被坦克的炮火所消灭。骚乱蔓延到了城市，因此平民也有了伤亡。

这时候阿明正在赴英途中。虽然派来援助乌干达的以色列人员的训练工作搞得很出色，并且所费不多，但是他们显然无法保证军队中的安全和纪律。阿明断定曾经训练过他的英国军官能够处理这种局势，因而他在1971年7月11日乘坐以色列执行任务的喷气机经特拉维夫飞往伦敦。

他在耶路撒冷拜访了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会谈中阿明明白地提出，要求以色列应供应他“一个小项目——几架鬼怪式飞机”。梅厄夫人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要“鬼怪式”。

阿明回答说，他需要用它们来对坦桑尼亚作战。梅厄夫人说她一架也不能给他，并问他为什么要对坦桑尼亚作战。阿明明白地解释说，他要为他的内陆国家重新获得曾为乌干达所控制的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使梅厄夫人吃惊的是，他

最后说出他心目中的海港是位于坦桑尼亚北部靠近肯尼亚边境的坦噶。

梅厄夫人劝他就港口问题和东非共同体协商，但是阿明回答说，因为尼雷尔拒绝承认他的政权，这是不可能的；他需要飞机来使尼雷尔恢复理性，所以要以色列供应飞机。<sup>①</sup>

这次对话发生在阿明和以色列友谊的高潮。根据一位欧洲的目击者说，在他动身赴特拉维夫时，在恩德培送行的以色列人很多，黑面孔的人几乎都看不出了。那时候，负责阿明人身安全的也是以色列军官。

但是，通常是机敏的梅厄夫人却没有考虑到，这个有着农民倔强劲头的伊迪·阿明是会不问来源地尽量弄到飞机的。如果他的伦敦之行得不到结果，英国人不供应他轰炸机，那么世界上有一个来源是会供应的——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阿明毕竟是个穆斯林，他或许可以认为他的穆斯林伙伴们会同情他那扩张乌干达的梦想。

访问英国仅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阿明出席了白金汉宫的午宴，对此他十分高兴。当女王问他这次访问最大的愿望是要得到什么时，这位将军明白地回答道，“一双十四号尺码的长靴和一个苏格兰管乐乐队队长去教我的士兵吹风笛。”女王表示愿意提供风笛手，由阿明从女王在苏格兰的离宫中挑选。（他这样做了，这个苏格兰人和他一起回乌干达——重新取道特拉维夫。）

之后，阿明同爱德华·希思首相和外相亚历克·道格拉

---

<sup>①</sup> 根据 1972 年 10 月 15 日《活报》和 1972 年 10 月 4 日“经济学家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外事报道》。

斯-霍姆爵士一起进餐。在表达了他的直至今天还是真诚的亲英情绪之后，他邀请一个英国军事训练队去恢复他的军队的士气。这个请求得到了同意，詹姆斯·豪斯顿上校和莱斯利·弗莱明上校于8月出发前往就职。

但是阿明还要求给他的军队提供装备和军事贷款。他特别需要豪克式和长剑式喷气机，以及装有地对空导弹的装甲车。这些东西英国人不愿给他，特别是考虑到他要实行进攻坦桑尼亚和“收复”坦噶港的疯狂计划。亚历克爵士准备卖给阿明三十辆萨拉森装甲车和萨拉丁装甲车，总值一百五十万英镑。此外，还愿向伊迪提供一千万英镑的民用援助，一俟具体的项目确定以后，这笔援助就可以及时处理，马上付款。这次援助将由英国掌管。

阿明非常渴望得到复杂的、高功率的现代武器以便扩张乌干达。对于他这种出自天真的信赖而提出的要求，亚历克爵士的反应使他极为失望。阿明由衷地承认英国朋友对乌干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不能相信他们竟会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刻不予支持。这使他想起了他同汉密尔顿上校的争吵，后者在他创业初期曾经拒绝给以帮助。从此就产生了英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嫌隙，虽然这在一年多的时间以后才变得明显起来。

阿明从英国回来后，获悉军队中进一步骚乱的消息，以及国防委员会秘书、代理总安全官瓦伦廷·奥西马中校领导的未遂政变的消息。阿明彻底信任奥西马，并把他从上尉提拔为中校。奥西马之所以反对将军，是因为阿明把一名卡克瓦族的青年军官查尔斯·阿鲁贝提升为他的上级，并指定其在

阿明访英期间主管军队。据说第二个与未遂政变有牵涉的人是 V. A. 奥翁吉,此人原为奥博特的部长,后被阿明留用。对一度非常接近阿明的奥西马的正式指控是:他错误地下令逮捕五位重要的文职官员,他们属于阿明的卡克瓦族妻子居住的西尼罗省阿鲁亚地方。他还以掠夺、强奸和恐怖行为等罪名逮捕了二十三名士兵。阿明的主要私人秘书兼内阁秘书亨利·卡耶姆巴则被解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1971 年 7 月 20 日。

最严重的变故发生在金贾,阿明从恩德培机场直接飞往那里。当他视察骚乱现场时,他显然深有感触。对这种现场情景他从 1964 年的那次哗变就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在那次事变之后开始在军队中飞黄腾达的。这一次阿明不仅失去了很多密友,而且还失去了几个他所最信赖的最好的军官。此外,有两个美国人来到姆巴拉拉兵营调查情况时失踪了,他们是自由撰稿记者尼古拉斯·施特罗和在麦克雷雷大学担任讲师二年期满的罗伯特·西德尔。最后事情弄清楚,原来这两个人在到达两天之后被哗变的士兵用大刀砍死了。

阿明对他军队的现状濒于绝望,同时知道英国训练队如果不是几个月也要几周以后才能来到,因此便陷进一次最不幸的外交冒险中去了。自从他于 1971 年 1 月取得政权以后,曾几次把他的注意力短暂地放在南非上面。他的兴趣似乎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他能为解决南非的种族局势作出一点贡献,他的威望和乌干达的威望就会大大提高。这一点可能对他颇为重要,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没有决定承认他的政权的合法地位。1971 年 4 月,他提出要去南非为非洲统

一组织“搞到那里的情形的第一手资料”。到9月底，他为了同一目的提出派一个调查团去。

阿明关于现场调查情况的主意来自马拉维总统班达，后者曾先去过南非，然后去过莫桑比克。阿明不同任何人商量，甚至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外交部长瓦努梅·基贝迪（他在纽约出席联大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在9月28日打电报给南非总理，大意说他想派个代表团去。他可能决定自己不去了，因为他感到南非人已经导演了班达的8月访问。但是，由于阿明一贯鲁莽（不象班达），他没有预先作出试探性的建议，也没有找中间人对局势预先侦察一番。

沃斯特的答复仅公布了一部分。在没有公布的那部分中，关键的一段话是：“鉴于非洲统一组织在6月通过的决议，象你所建议的这种代表团的来访将在我国被解释为对我们内政的干涉，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没有疑问，我们终将准备接待一个代表团，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们认为你亲自来访更为适宜（或者由你政府的一名或更多的成员来访）。”（摘自1971年10月15日《非洲机密》。）

这位南非总理似乎在设法使阿明了解，如果阿明不亲自去比勒陀利亚，南非可能接待包括若干乌干达部长在内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能够回去私下向阿明报告，而不向非洲统一组织报告。阿明没有理解这一点，他把沃斯特的答复解释为直截了当的拒绝。如果沃斯特对派代表团的想想法表示欢迎，但建议预先进行正式接触，探讨一下应当采取什么方式，那末他至少还能使谈判不致中断。而现在，阿明的主动性消失了。但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看出来了，沃斯特先生是希

望我访问南非的。”

阿明访问比勒陀利亚之行遭到乌干达学生、乌干达一部分报纸和瓦努梅·基贝迪本人的强烈反对。瓦努梅·基贝迪那时和现在都竭力反对与南非进行任何对话。他试图构成——但不太成功——这样一种说法，阿明曾对南非提出了一次挑战，而从来没有打算推行“接触”的政策。的确，阿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对话；并且从他的代表团（如果去成的话）可能参加的成员来看，他们调查的结果也只会赞成非洲统一组织所奉行的除在卢萨卡宣言<sup>①</sup>范围以内不进行对话的政策。但是，阿明不会排除任何最终可使他达到目标的同南非接触的方法，他的目标就是使人看到他正在做某种独特的、建设性的事情，以利于改进南非黑人的命运。

从阿明和班达的谈话看来，不能断定他的思想深处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他认为有可能象马拉维一样从他与南非的接触中得到好处，并得到一笔贷款为他那扩大了了的军队购买武器。南非有能力提供金钱和一些武器。不难想象，在坦桑尼亚边境上有一个由南非援助的国家这样一幅前景会使尼雷尔博士和卡翁达博士受到怎样的打击——然而，正是尼雷尔及其朋友们加在阿明头上的种种侮辱驱使他向南非提出不明智的建议的。

在1971年其余的日子里，乌干达还要在外交方面对付更多的困难。阿明和尼雷尔的竞相对骂在8月份和10月份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湖附近的边界冲突。回过头来看，两起事件

---

<sup>①</sup> 1966年，由东非和中非各国首脑发表的一个宣言，谈到南非用非暴力实行改变的可能性，并提出和南非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



似乎都可能出于偶然，而不是预谋。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无力打仗；但不幸的是，双方在共同边界上都拥有充分的兵力足以造成平民的伤亡。由于双方发表的数字不同，无法确定这些伤亡的确切数字，但数目是几十而不是几百。这场争吵的严重的一面在于尼雷尔帮助乌干达难民在坦桑尼亚进行游击战训练，并且也正是这些乌干达难民炮击了阿明的边防部队的。

阿明出于对尼雷尔的愤怒，拒不实行合作以维护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东非共同体。为了这个共同体，连固执的尼雷尔博士都愿意对阿明作某些让步。

这时，其他非洲领袖也试图改善阿明和尼雷尔之间的关系。头两个出面调停的是尼日利亚的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利比里亚的托尔贝特总统，后者派遣了他的副国务部长奥利弗·布赖特前往坎帕拉和达累斯萨拉姆。但是，他并没有比戈翁的使者、经济发展和建设局长谢胡·沙里加取得更大的成功。海尔·塞拉西皇帝试图十分谨慎小心地从旁协助，但他仅从卢旺达方面得到让步。阿明曾经关闭了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边界，卢旺达总统卡伊班达恳求把该国重要的出口物资空运出去，其代价是卢旺达承认阿明政权。最后，肯尼亚的肯雅塔总统在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作了大量的工作以后，参加了调停，终于拟订了使东非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的暂定条约。但是尼雷尔坚持拒绝承认阿明，也不愿同他发生任何关系。

1971年阿明将军在外交上的努力取得较好成绩的方面是同苏丹关系的改善。阿明和加法尔·尼迈里总统曾相互含有敌意地进行辱骂，主要是因为乌干达难民在苏丹南部奥维

尼-基布尔的兵营里接受游击队训练,奥博特还到那里去讲过话。尼迈里不满的理由是阿明能够帮助那些反对北方阿拉伯人的南尼罗河流域的叛乱者阿尼亚-尼亚人,<sup>①</sup>因此这位苏丹的国家元首怀疑阿明在以色列朋友的怂恿下正在这样干。但是7月间在共产党发动反对他的政变以后,尼迈里总统通过在4月份派驻坎帕拉的大使传达友好信件,从1971年9月起这两位国家元首开始互献殷勤。1971年底,阿明派一位大使赴开罗,给萨达特总统带去问候信件。阿明的以色列顾问对于他向他们的阿拉伯敌人所作的友好表示,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担忧的,没有公开记录,但是和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将成为阿明的不平常外交的另一后果。但在这种外交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以前,这位将军面临着更多的国内问题。

---

<sup>①</sup> 从人种学上看,近似卡克瓦族。

## 第七章 被嫌弃的亚洲人

阿明很知道普通乌干达人对他的政权所抱有的期望。1月25日的广播已经列举了他们的委曲,他现在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广大群众希望减少税收,降低生活费用,日子过得比较舒适和安全,不再有逮捕,不再出现腐化和盗窃。最重要的是,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离开学校时能够得到职业——有前途的职业,虽然他们不使用这些字眼。

减少税收是一个难题,因为乌干达国库空虚。总审计长的报告不仅说到国防部费用超支,而且还谈到去年财政年度有三百万英镑的赤字,包庇和袒护亲友的风气盛行,部长们不缴附加所得税等情况(虽然在这些违法者中有个人拥有三十九幢房子)。新上任的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阿波罗·基隆德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律师,曾任驻联合国和驻加拿大大使,他就老实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部没有钱。以前奥博特管理不善,使我们处于一种毫不令人羡慕的境地”。

因此,纵然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阿明也不能减少税收。这对乌干达人来说是最大的失望。他也无法降低生活费用,因为如果压低农民所出售的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就马上会起来反对他。唯一的希望是减少中间人的利润。他们大都是亚洲人,对于他们,阿明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这种看法是他早年在卡克瓦族地区同“杜卡”的老板们打交道时形成的。这些

老板以欺侮朴实的非洲人而闻名。此外，亚洲人也很不得人心，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都会给他带来有利的反应。在他执掌政权的初期，阿明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他进行极受欢迎的随时停下来视察一番的全国旅行时，人们成千上万地拥出来看他，那时他曾告诫亚洲人，如果他们不尊重非洲人，他们就会遇到麻烦。

关于恢复法律和秩序的问题，阿明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第一批措施中就有一项是解散总务部，他还答应对该部的活动进行法律调查。为此，他于1971年4月采取了行动，有几百名总务部的成员被拘留。

根据奥博特的命令拘留或囚禁的人中，有很多得到了释放，这一举动使公众极为满意。阿明探望了奥博特的父亲，对他很有礼貌，并照料了米里亚姆·奥博特夫人和她的孩子，人们对此反映也很好。但是，与推翻阿明的未遂政变有关或被认为有牵连的人都被逮捕了。据说那时关在坎帕拉的两个监狱里的人约有一千五百。在解除紧急状态以后，这些人事实上是被非法监禁的。3月份，阿明颁布了一条法令，授权政府可以不经审讯或没有正式拘留状把总务部的成员或军人拘留六个月。他们必须在9月12日以前受到控告或者予以释放。根据政府的宣布，4月份有二百人是这样拘留的。

5月，颁发了第二条法令，准许把那些因有具体材料可以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一直拘留到1973年3月；只能根据内政部部长的正式命令拘留他们，并须在三个月以内，由一个以高等法院法官为首的委员会对他们的案情进行审查。但是这个委员会从未举行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根据五月法

令的条款拘留的。9月11日颁布了第三号拘留法令，规定对于总务部的前成员和军人可以不经审讯或无拘留状监禁到1971年12月12日为止。关于当时被认为是在拘留中的六百多人，几乎没有有什么书面证据。《非洲机密》于1972年3月3日报道，“12月12日，没有颁布新法令，没有向在押人员发给拘留状，没有人被释放，没有人受到控告。但是在12月底，据悉他们已从坎帕拉的卢齐拉监狱转移到乌干达-坦桑尼亚边境上的穆图库拉监狱农场。”

也许有种种理由来加以猜测，但是作为阿明的主要关心对象的普通非洲人没有说出来。他认为他能够依靠法院对被捕罪犯处以重刑的办法来对付贪污腐化，但他制止不了“孔多行为”。老百姓对这种“孔多行为”恨之入骨，只要有人叫喊“贼——那是个贼——逮住他！”并把罪人捉住，人们就会不加讯问，把他揍死。这种非法地自行处理的举动的爆发使阿明感到为难和烦乱，因此他拒不签署由于他们自己掌握法律而被判死刑的二百人的判决书。首席法官德莫特·谢里登爵士抗议说，总统搁置了这项判决，以致法律制裁无法行使。他指出，在等待执行判决的人们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减轻罪名的条件却被判处了死刑，对他们的判决是应该减轻的，而其他人则犯有极为可怕的罪行，对他们的惩罚的任何减轻都是不可思议的。但阿明却不能理解这种区别对待罪犯的复杂问题。最后，德莫特·谢里登爵士辞职了，由民主党的罗马天主教领袖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接替，后者反对过卡巴卡，以后被奥博特关进过监牢。

既然税收不减少，生活费用不降低，“孔多行为”不能制

止,阿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普通非洲人了,他也无法满足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获得生活保障的愿望。面对着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他的念头又回到了似乎仍然控制着经济局势的亚洲人身上。他本人象普通老百姓一样对他们怀着怨恨,并用每一个乌干达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1971年2月他对亚洲人问题发牢骚说,“对付英国护照持有者是多么困难啊。”

1971年3月,一个在肯尼亚住了三十四年能说斯瓦希利语的肯尼亚籍英国人作为客人出席了波特尔堡的群众大会,阿明总统在大会上讲了话。这位英国人亲眼看见各个不同的亚洲侨民集团的领袖致送的礼品——银咖啡用具、银制装饰品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礼品,并且还伴以得体的讲话,赞美将军推翻了奥博特的政权。这些亚洲人可能已从阿明接受礼品时的面部表情看出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这个英国人还记录了阿明将军的讲话。将军用稍带拘谨的英语实际讲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他说:“在有些城市我对群众大会讲话,我发现欧洲人参加了,但是没有印度人。然而,在乌干达的印度侨民团体的人数是比任何其他民族多得多……我总是很坦白地、清楚地跟你们说话,因为你们必须正确理解我讲话的内容。在整个非洲、整个黑非洲,对印度人只有一种感情——恶感——这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侨民团体同我们完全割裂开来。在这里,或者在内罗毕,或者在其他地方,你们在社会活动中从来不与非洲人合作,也不参加非洲人的活动。我今天告诉你们,这是非洲人民唯一的秘密感情(热烈的鼓掌和欢呼)。我作为领袖,象我这样坦率地对你们,是

对你们有好处的。告诉你们，这对你们的前途是有帮助的。我不要你们把它理解为我恨你们。我并不恨你们。但是我要你们在社会活动中和你们的非洲兄弟姐妹合作。我的目标是统一乌干达。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忘掉上帝，做任何事情都要祈祷上帝保佑。没有上帝的保佑，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很大收获。有些人只是在困难时才祈祷上帝，这是不好的。你们知道，假如你们按照圣经里的话去做，按照古兰经里的话去做，或信奉其他宗教，假如你们去做礼拜，假如你们确实按照上帝的书里的话去做，我相信，甚至我国的经济也会得到改善。无论你们与非洲人一起工作，或是你们相互在一起工作，你们必须彼此忠实，你们必须忠于政府，忠于我们的国家乌干达。”

亚洲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得人心。他们墨守宗教、语言 and 传统(衣着也是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孤立了自己。特别是一些亚洲小商人，同没有经验的非洲人做买卖时在钱财上要奸，引起了愤恨。他们在农村做小买卖和放高利贷，受到敌视和猜疑。非洲人垂涎亚洲人的财富和地位，特别是因为许多人获得了高等教育和经验。对这些不时发生的攻击，亚洲人几乎是听之任之。

一般人认为，亚洲人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作为建筑铁路的合同工来到东非的。<sup>①</sup> 贾斯廷·奥布赖恩在其随笔《棕色的英国人》中概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从那时起开始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古吉拉特邦，小部分来自旁遮普邦，是

<sup>①</sup> 在三万二千名合同工里，一万六千三百十二人合同期满后回印度，二千四百九十三人死亡，六千四百五十四人因病残返家，仅有六千七百二十四人留下。

一些小商贩和失地的农家子弟，他们来到铁路沿线开店铺和从事其他服务性行业，并以此为核心逐步扩展成今日东非的亚洲人口。就他们来说，他们所维持的生计比他们在印度所能获得的要好一些，但他们主要是帮助英国人为他们的殖民剥削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sup>①</sup>

由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所谓亚洲人曾为“殖民剥削”提供帮助这种指责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实际上，亚洲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站在反对纳粹统治斗争的最前列，比处于萌芽状态的非洲政治团体给殖民政府造成更大的困难，而现在年轻的非洲人却谴责他们“拍帝国主义的马屁”。这些年轻的非洲人不是不知道就是认为最好忘掉，在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形成时期，它们的领导人中总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亚洲战士。很多非洲人似乎已经忘记，正是在非洲人还不会搞，欧洲人又不愿搞的时候，亚洲人把贸易、工业和商业介绍进来的。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洲人想要积极参与贸易、商业和工业了。正如对于东欧在三十年代反对犹太人和尼日利亚在六十年代反对伊博族人的情绪一样，真理和事实影响不了对亚洲人抱有近乎歇斯底里的偏见的社会舆论。

奥博特充分了解到这一点，早在1966年就对亚洲人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在共和国的宪法中，他加进了在任何非洲独立国家都无先例的条款，规定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发展地区，只有非洲血统的公民才能拥有土地、财产和商店。奥博特还

---

<sup>①</sup> 1972年8月由朗尼梅德信托公司出版。



通过法律，吊销了亚洲人的居住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劳动许可证。这些证书只有在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应例外处理时才能予以更换。这个政策剥夺了大量亚洲人的生计，奥博特还准备用最脆弱的借口来取消他们的乌干达国籍。整亚洲人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如果九十天之內他们不在地方官吏和两个证人的面前申请取得乌干达国籍，那就表明他们沒有放弃原来的国籍。甚至英国高级专员也沒有理解这项规定的重要性，等到他理解时已经太晚了。只是在后来才发现，比如说，根据这项规定，议会的所有亚洲人议员都不是乌干达公民。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刁难，亚洲人仍然能控制乌干达的经济部门。阿明决心结束这种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必须把乌干达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亚洲人破坏所得税法，私运货物出国，非法地把钱运出乌干达，弄到英国或其他国家，借此来破坏经济。只要亚洲人控制着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非洲人就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人。不能允许少数亚洲人象罗得西亚的二十五万白人统治五百万非洲人那样来统治乌干达。”

从1965到1969年，在他同奥博特亲密友好的年代，阿明会见过很多奥博特的亚洲朋友。他们和他在卡克瓦地方猛烈攻击的那些小“杜卡”老板截然不同。他们是知识分子，曾协助奥博特制定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属于左翼，因此阿明断定，他所不赞成的奥博特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亚洲的影响。还有奥博特私人依靠的亚洲律师，他们经管着他的基金会。<sup>①</sup>阿明觉得他们太老于世故，他与这些所谓奥博特的

---

<sup>①</sup> 该基金会是作为一个向人民大会党出版社提供财政支援的信托公司而成立的。奥博特为此曾通过一个奥地利基金会获得美国的款项。

“亚洲黑手党”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他对他们比对小“杜卡”老板更不信任，因为对后者他至少还能了解一点。阿明和很多非洲人的观点是：亚洲人“合法”地欺騙了非洲人；他们剝削了非洲人；他们向非洲人索取很高的利率；他们过着非洲人无法分享的生活；他们讲的语言——古贾拉特语和印度斯坦语——非洲人不懂。但是，关于奥博特为了平息非洲輿论而对亚洲人采取的强硬措施，阿明理解到什么程度是成问题的。

阿明所知道的，正如每个东非人都知道的那样，是在肯尼亚独立谈判期间，当时的殖民大臣邓肯·桑迪斯曾对肯雅塔担保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由英国负责。如果没有这个诺言，肯雅塔就拒绝在提出的独立条款上签字。为了换取桑迪斯的同意，肯雅塔答应不大量驱逐亚洲人（象 1972 年 8 月 5 日阿明要做的那样），而是把非肯尼亚公民的亚洲人逐渐排挤出去。

假如没有 1968 年英联邦移民条例，这个办法或许会行得通，亚洲人也会不经历一场危机而勉强生活下去。没有和非洲的领导人进行事先的磋商，也没有就那些失去工作和事业的亚洲人可否首先获得凭证去英国的问题进行调整，1968 年 3 月的联邦移民条例就单方面把从东非去英国的亚洲人的户数限制为每年一千五百户。这就意味着东非三国还得再赡养他们的英籍亚洲人达十年之久。

可以断言，肯雅塔、奥博特、尼雷尔都非常愤怒，最后他们促使英国于 1971 年 5 月把数目增为三千户，以后在印度的压力之下，又于 1972 年 5 月增加为三千五百户。但这时伊迪·阿明已经是乌干达的国家元首，他并不欣赏外交方法的细微

末节。乌干达每年分配到九百张凭证，而英国护照持有者约为四万五千人，这意味着约有八千到九千户亚洲人。即使英国人同意让乌干达得到所有三千五百张凭证（对此肯雅塔和尼雷尔是决不会同意的），也还要花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才能把亚洲人清除出乌干达。据英国内政部公布，在1968年3月到1972年7月，从东非进入联合王国的亚洲人总数为三万四千九百十二人，其中约有一万二千人大概来自乌干达。可是在这期间，离开乌干达的亚洲人有一万八千多人，因此，一定有六千人不是溜过了移民网，就是到印度去了。

阿明不想再等待。自1962年独立以来，与英国人的谈判和争吵一直在进行，但是就他所见，仍掌握着重大经济地盘的亚洲人的数目并无明显减少。这位将军反复说，乌干达必须从这致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970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和密尔顿·奥博特总统，尽管同表面上的现象相反，却一直在商谈亚洲人的问题，并将按照同肯尼亚协商的方针找到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希思准备增加乌干达的分配名额，奥博特则准备答应加速处理悬而未决的申请并恢复那些因技术细节失去国籍者的国籍。这个打开局面的行动可使二万名亚洲人在几年之内进入英国——此数不少于1972年实际进入英国的人数。这个协定在新加坡定了案，但是没有结果，因为当奥博特在新加坡时，阿明把他推翻了。

在阿明和英国的蜜月阶段，首相和外交部或许认为阿明会认可他们同奥博特签订的协定。但是他却与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就签订协定发生了争论，并且不作任何具体的

保证。

在他访问英国以及 1971 年 7 月军队中的大屠杀之后,阿明再一次回到亚洲问题上来。舆论变得有点不耐烦了,因为所希望的改进沒有一项得到实现。阿明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持他的声望。1971 年 10 月,他下令对亚洲人进行特别人口普查,不管他们是不是乌干达公民。1971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他召开了一次大会,亚洲人必须根据地理区域而不是按照他们所分属的各种人种和宗教团体推选代表参加。后一种划分办法自殖民统治时代起一直为历届政府所承认(虽然普通老百姓一般不予承认)。亚洲人第一次被要求打破他们的侨民团体的界限,共同面对非洲人。另一新措施是,在这次大会上不区分乌干达籍亚洲人和非乌干达籍亚洲人。

阿明总统非常客气地开始了他对亚洲人的攻击:“诸位阁下、尊敬的部长们、代表们、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知道,这是政府在这个中心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之一,来讨论乌干达不同团体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大约四个星期之前,我们讨论了穆斯林问题;仅在一星期之前,我们讨论了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教会的主教问题。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的公开声明和信件,指责我国的亚洲人侨民。在这次会议上,你们作为全乌干达各个亚洲人团体的代表,可以向政府简单地介绍一下造成我国非洲人控诉亚洲人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情况。象家庭中的父亲一样,我的目的是使这个国家的不同团体的人在永久的基础上建立起相互了解和团结。我可以肯定,在听了你们通过这次会议所表达的意见,看了你们呈交给我指定担任会议主席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奥博特-奥丰

比阁下的备忘录,以及今天下午对你们讲了这番话之后,我希望亚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在不同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鸿沟会缩小,如果不能完全消失的话。这样,我们全体——不论是公民或非公民、非洲人或非非洲人——都能在乌干达共和国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阿明赞扬了亚洲人团体所做的贡献,然后又重谈他的老话题:“由于殖民政府的政策,你们得到特殊待遇,有机会在当时的乌干达保护国的所有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稳稳地站住了脚。你们的团体利用这一政策建立了你们自己的商业和贸易组织,这些组织对全国的经济生活起了很大作用。”他称赞马德瓦尼和梅赫塔家族对商业和工业生活所作的特殊贡献,也称赞他们扩大了教育和医药设施。他对那些从事政府各种工作的亚洲人,特别是法官、推事、医生、工程师、教员和会计等表示敬意,所有这些人对乌干达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他继续说,“有几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现在要坦率地和你们谈谈,因为这确实就是这次会议的目的。”阿明数说了他的不满。第一,乌干达政府向乌干达人、甚至非乌干达的亚洲人提供了在当地和海外教育机构中受教育的机会。有些人还得到政府津贴。例如,自1962到1968年间,政府资助了四百一十七名亚洲人接受工程师教育。“但是,现在在这四百一十七人中只有二十人为政府工作。在同一时期,政府资助了二百一十七名亚洲人接受医生训练,但是现在为政府工作的不到十五人。”九十六名律师,只有十八名为政府工作。据阿明说,这些由政府出钱培训而以后又拒不为政府工作的亚洲人“欺骗了国家”。此外,甚至那些在

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出于自私的理由——主要是不愿调离恩德培、坎帕拉、姆巴勒或金贾——不久就辞职不干。他们许多人除了在政府部门工作之外，另有商业利益，例如拥有店铺、车库和运输行等，他们从中得到相当数量的款项，当调他们北上的时候，他们不愿放弃那些企业。阿明特别愤恨地谈到了那些亚洲医生如何拒不北上，不愿到古卢、索罗提、阿帕克、阿图图尔、伊干达等地和到布塔比卡精神病院去改进边远地区的医疗事业。

然后，阿明转而谈到一个特别使他愤怒的问题：“这就是你们不愿同我国非洲人结成一体的问题。使人特别感到痛心的是，第一批亚洲人来到乌干达大概已经有七十年了，时间已经过得很久，但亚洲人团体却仍然在它自己的天地里生活，以致我国的非洲人很难，比如说，同亚洲姑娘结婚。粗略地统计一下，在乌干达非洲男人和亚洲女人结婚的只有大约六对。即使如此，这六个男人都是在外国而不是在乌干达同这些女人结婚的。问题变得更严重的是，当乌干达境内的非洲人试图和亚洲姑娘恋爱并结婚的时候，甚至发生了一两起姑娘自杀的事情，因为她们想嫁给非洲人的事被父母发现了。”从五个不同部族娶了老婆的阿明，说话很带感情。对他说来，这恐怕是亚洲人所犯的最大的罪行。

他继续说，“我知道，乌干达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社会关系继续疏远的一个原因是殖民政府的政策。它规定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都有完全分开的学校、医院、住宅区、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甚至公共厕所也是如此；而供非洲人使用的设施质量最次，数量少得可怜。当然，我们改变了这一切，但还

有亚洲人留恋过去，象从前的殖民政府一样，认为非洲人低他们一头。”

阿明接着列举亚洲人在买卖中的“不正当行为”：把糖、玉米和锄头等商品从乌干达私运到邻近地区；囤积商品制造人为的缺货，以便抬高价格；把前面的房间租给非洲人，自己留用后面的房间、厕所和厨房等设备；通过不规矩的竞争手段迫使非洲商人削价出售商品；向非洲商人比向别人索取更高的价格；用记两本帐册的办法逃避所得税，其中一本使用古贾拉特语或印度斯坦语，非洲的所得税官员根本看不懂。他指责亚洲人用重贿搞到贸易执照、护照、投标、国籍申请、医药治疗、城镇地皮、建筑计划、酒餐馆的营业执照；总之，贿赂和舞弊盛行。于是他告诉到会的亚洲人，到1971年1月25日尚未获准的国籍申请都以“逾期自动撤销”论处。这大约包括一万二千份申请。他在结束讲话时说：“由于你们拒绝在我国同非洲人齐心协力，因而正是你们自己，造成了非洲人对你们的这种感情。”他警告他们要“自我检查并改正任何影响你们侨民团体的缺点”。

亚洲侨民团体第一次回答了阿明的指责。在一个经过仔细准备的备忘录中，就阿明的指责逐条进行辩解，指出阿明所讲的由政府资助的亚洲学生的数字是错的；在一个宗教、社会和部族习惯和传统都根深蒂固地互不相同的社会里，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是困难的，还援引了非洲人对不同部族之间通婚所持的反对意见。关于囤积居奇、破坏外汇管理条例、走私和违犯所得税法令等的控告，亚洲人领袖要求政府对犯人依法制裁，因为这样做就会表明除亚洲人外还有很多人也犯有

同样的罪行。这个亚洲人备忘录解释了亚洲人在他们的企业被充公以后为什么不能放弃房子后部的厨房和厕所设备，以及乌干达当局为什么喜欢把职业给予亚洲人律师、医生和会计等等的问题。备忘录在结尾时断然认为乌干达政府应当纠正社会制度的弊害，使这个制度不再产生那些把责任归诸亚洲人的不良行为和种族之间的其他误解。“在乌干达的人数很少的亚洲侨民团体——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缺乏立宪的权威或组织的力量，不能单独进行当前看来很需要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势所必然，拥有权力和组织机构的政府必须在乌干达的变革进程中采取主动并进行领导。”

会议以后，一片奇怪的平静整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



## 第八章 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

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阿明怀着失望的心情从伦敦回来了，虽然这是没有道理的。他向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要求军事援助时，因胃口太大，未能如愿以偿，不得不同意只由英国提供一个军训小组和三十辆装甲车。结果，将军和英国政府建立的接触本来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却因阿明在其本国挑起的新的动乱而遭到破坏。英国军训小组来到时，乌干达军队中正在实行清洗，更糟糕的是阿明还从事了一系列涉及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外交冒险。

1972年1月5日晨，阿明的老朋友休·罗杰斯中校抵达恩德培机场。他已被委任为乌干达境内的英国军训小组组长，是来安排住宿、补给和装备，并计划各项课程和训练的。他在机场上接到通知，阿明将军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

会见在指挥部进行，这是坎帕拉卡洛洛山上的一座私人房子，阿明就在这里处理国家事务。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见。阿明将军依然是当年的伊迪，不一会儿他就和休·罗杰斯用斯瓦希利语闲谈、开玩笑，就象他们当年那样。罗杰斯称阿明为“阁下”，但是随着谈话的进行，他不再称“阁下”了。他在乌干达期间，只要他们单独在一起，他和将军都同以前一样，彼此直呼教名。

阿明告诉罗杰斯，他已准备在当天下午六时为他举行招

待会,后来那个招待会举行得确是非常出色。阿明不厌其烦,把休·罗杰斯的几乎所有的老朋友都请到坎帕拉,共约二百人。名单是阿明亲自开列的,其中有些客人经历两天行程才赶到。

接着是罗杰斯的使命遭到挫折的阶段。乌干达政府在坎帕拉的国际饭店招待他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月,但是他还不能开始任何工作,因为乌干达和英国政府的协定还没有签字。他想把他的军训小组派出去进行工作,但是当他问到为什么拖延时,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磋商妥当。2月初,罗杰斯去金贾视察了他熟悉的兵营,但是他所能做的,也仅仅如此而已。

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正式建立推迟了,当时罗杰斯还不知道阿明正在指挥乌干达军队的又一次血洗。

1月17日阿明宣布,所有拘留在穆图库拉监狱农场的前总统奥博特的同情者,除了十五人以外,已经全部释放。这似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在2月4日,将军告诉新闻记者说:其余的十五名拘留犯打倒了穆图库拉的守卫,逃到了坦桑尼亚;在边境那一面,坦桑尼亚军队把他们抓住,又把他们交还了乌干达当局。坦桑尼亚政府于2月5日否认曾把任何乌干达拘留犯交还乌干达,并说,事实上二十三个逃跑的幸存者已在布科巴,其中四人因重伤住院,其余的十九人即将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四天之后,在坦桑尼亚中部塔波拉附近的潘加莱营地,十九个“乌干达避难者”对记者说,自从阿明攫取政权以来,乌干达军队中有四千到五千兰戈族人和阿乔利族人被解职。他们还详细地叙述了于1971年12月28日被送到穆图库拉的拘

留犯的真实下落。那里共拘留了五百一十名军人和一百二十名前总务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牢房是彼此隔离的，但他们都是兰戈族或阿乔利族人。

十九名避难者还告诉记者，1月11日，警卫叫出一小批军官，把他们带到丛林中枪杀了。这同样的事天天重演，等到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杀光，就该轮到年轻军官了。避难者说，有两伙人试图逃跑，结果是在监狱围墙之内，在他们的难友面前被枪杀了。又有几批人被带走，但是没有听到枪声，被带走的军官也没有回来。避难者估计这些人是被割断喉咙而死的。行刑队是由靠近乌干达边境的苏丹境内的卡克瓦族人组成的，拘留犯称之为阿尼亚-尼亚队。避难者在新闻记者会上发誓说，到2月4日为止，原来五百一十名拘留犯中只有一百零二名还活着。

阿明将军的政府对这些说法未加评论，只重申大约六百名的拘留犯已于12月28日移至穆图库拉，此后大部分已被释放。罗杰斯和任何熟悉阿明政变前的乌干达军队情况的人都知道，只有大约三千五百名兰戈人和阿乔利人在军队中服役。因此，十九名避难者说有五千名兰戈人和阿乔利人被逐出军队，而他们是兰戈和阿乔利族人中仅有的幸存者，这似乎是谎话。罗杰斯自己也能看到，直到今天，还有一定数量的兰戈人和阿乔利人在乌干达军队中服役，他根本不相信避难者所说的开亨式的恐怖故事，<sup>①</sup>认为那是拙劣的宣传。

---

<sup>①</sup> 1941年8月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苏联不久，被苏军关押在斯摩棱斯克以西战俘营中的一批波兰军官，亦被德寇所俘获，并将他们押到开亨森林全部杀死。——译者

问题在于所说的被释放的人，其中若干人还在英国军官中有朋友，却一个也没有被见到或听说过。罗杰斯特别担心的是原刑事调查处处长穆罕默德·哈桑。十九名避难者说，哈桑病了三天，所以没有参加逃跑，在狱中被枪杀了。避难者坚持说，越狱过程中共有七十九人被杀，只有二十三人得以越过边界，进入坦桑尼亚国境。

就在这次阴森可怖的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1972年2月9日），国防部长查尔斯·奥博特-奥丰比宣布，他曾把拘留在穆图库拉的原总务部的六十四名工作人员予以释放。他没有提到其余五十六人，从那时起似乎也没有人见到或听说过他们。获释的六十四人各自回到家里，接触了朋友，但是他们对于潘加莱记者招待会上的故事，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只讲他们曾听说在越狱之前，穆罕默德·哈桑就病了。

血洗穆图库拉的余惊未平，阿明又制造了另一起外交上的惊人转变。他抛弃了以色列人，结交了阿拉伯人。

将军和以色列人的直接争端，是他欠了他们的钱——大约九百万英镑——包括飞机场、训练设备和几个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具体经济建设项目的费用。以色列人在农业上给予乌干达以巨大的帮助，他们教乌干达人以家禽饲养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和范围广泛的农业技术。以色列专家为贫瘠的卡拉莫贾地区详细拟定了一项移民和经济发展计划。在国防方面，在奥博特当权时，以色列教练就帮助乌干达训练飞行员和空军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个装甲兵团，训练了炮兵。1971年，阿明在掌权之后还竭力要求扩大训练的内容。以色列人用他

们自己国防部队的标准装备去帮助乌干达。在教育方面，以色列专家为幼儿园老师组织训练班，帮助乌干达建立了一个全国青年运动组织。以色列医生在乌干达进行了医药调查，并亲自在乌干达从事医疗工作。六名乌干达学生在耶路撒冷的医科学学校毕业，现在正在积极开展医务活动。最后，以色列还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乌干达进行帮助，包括开办地方行政、税务和电子计算机使用等训练班以及训练地方警察等项目。

以色列各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建筑项目，特别是建筑住房以及道路、机场等商业性兴建事项。还计划由乌干达人和以色列人共同经营联合企业，例如杀虫剂工厂、速溶咖啡厂、旅游机构和养牛场等。所有这些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本来会给乌干达经济带来上百万英镑的收入。

但钱还没有开始流进来。以色列不是一个富国，以色列人决定向乌干达人索还他们所欠九百万英镑的半数。这使阿明恼羞成怒。他无法偿还以色列人的债务，不仅如此，他给军队和文职官员开支薪饷都有困难。

阿明同以色列的关系还受到一个军事因素的影响——他要清除与苏丹接壤的北方边境九百五十名奥博特的追随者，他们是在欧文·吉布尔兵营<sup>①</sup>由苏丹的正规军军官训练后，渗入乌干达进行游击队活动的。此外，据了解奥博特还曾在—一个苏丹哈里发和一个伊玛姆的化装和掩护下，四次乘坐直升飞机访问兵营，并对追随者讲了话。阿明知道得很清楚，在离乌干达仅几小时行军路程的地方，就有这么一支武装精良

---

<sup>①</sup> 原先的阿尼亚-尼亚庇护所，苏丹的尼迈里总统把这块地方交给奥博特使用。

的劲旅,对他的政权构成一种隐患。

因此,当苏丹的尼迈里总统在1971年7月的共产党政变流产之后,决定结束对南方进行了十七年之久的内战时,阿明就利用他对阿尼亚-尼亚人的影响,解决了他们与北方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激烈的争吵。阿明对苏丹持友好态度,这就开始引起了以色列的敌意。

尼迈里总统已经对之宣战的以色列人认为,苏丹的内战是他们反对尼迈里斗争中的有用的“第二战线”。苏丹境内的和平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阿明和尼迈里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以色列人对阿明欠债的不满,而这笔钱阿明连一小部分也偿还不了。

这时候,欧文·吉布尔兵营已经关闭,阿明同意去访问喀土穆。与此同时,他改善了与开罗的关系。萨达特总统施展了他高超的外交技巧,说服阿明也去访问他。他向阿明保证,乌干达的财政问题可以通过卡扎菲上校得到圆满的解决,因为利比亚的国家元首每年约有九亿八千万英镑的石油收入。利比亚的人口仅二百余万,它的财政情况很好,即使花很多钱于社会福利,改善住房和教育事业,还有巨额余款可供别的用途。因此从阿明的角度来看,难道还有什么事会比听从萨达特和尼迈里的劝告去访问卡扎菲上校更为合理的吗?阿明预定前往西德,途中在开罗停留。在波恩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得到了有关民用援助的诺言,但是没有得到贷款和复杂的武器。因此,在归途中,阿明在2月7日赴的黎波里对卡扎菲作了二十四小时的访问。他们一定相处得很好,因为卡扎菲向阿明提出了作三天正式访问的邀请。

在坎帕拉，阿明召来了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伊曼纽尔·恩祖布加阁下、坎帕拉英国圣公会主教邓斯坦·恩祖布加（同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无亲属关系）和乌干达的大法官萨伊赫·阿布杜拉拉扎克·马图武，命令他们和他一起于2月12日飞往利比亚首都。“请注意给我祈祷，”阿明对他们吼叫道，“当我在利比亚时，每时每刻都要为我祈祷，以保佑我作出正确的决定。”

三位宗教领袖奉到这种不平常的命令有点吃惊，他们虔诚地祈祷。大主教恩祖布加又回的黎波里去了罗马，继续他的祈祷，并在暗地里向教皇和他的朋友解释他在利比亚干了些什么。

卡扎菲和阿明的会见是心灵的相会。卡扎菲首先把他的客人看作一个优秀的穆斯林——阿明是笃信伊斯兰教的——并向他指出，他不应当被以色列人所包围，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压迫他们的阿拉伯穆斯林同胞。然后卡扎菲又把阿明当作一个比较年长、比较聪明的人物——这是出色的一招——要求他去同乍得总统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会谈，而卡扎菲却几乎和托姆巴巴耶打起仗来，因为后者虐待了他的北方地区的柏伯尔族和阿拉伯居民，这些穆斯林住在蒂贝斯蒂山区，自称为乍得解放阵线。

阿明及时地从的黎波里飞到拉密堡，通过译员同托姆巴巴耶商谈了两天。由于乍得总统也急于要停止他那财政拮据的穷国所不堪负担的内战，他乐意倾听对方的意见，乐意表示和解。这样阿明就能够胜利地回到的黎波里，带回了正是卡扎菲想要听的消息。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之下，卡扎菲向阿明

提供了财政援助，比以色列向乌干达提供的援助规模大得多，条件也优厚得多。

1972年2月14日，卡扎菲和阿明发布了联合公报，公报声称：“两国首脑保证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办事，保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保证为解放被侵占的土地、为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的权利所作的斗争。”利比亚和乌干达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卡扎菲上校接受阿明将军提出的访问乌干达的正式邀请，日期以后确定。

公报继称，两国首脑保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以及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的人民。他们要求“英国应该结束在罗得西亚的少数白种人的统治，以便让津巴布韦人民享受合法统治他们自己国家的全部权利”。两国首脑拒绝和南非谈判。公报最后称，“会谈是经利比亚邀请，在兄弟般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阿明回到坎帕拉后宣布，利比亚已经同意“为乌干达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支援”。

所有这种同阿拉伯人的调情，使乌干达和以色列的恶劣关系达到顶点。以色列大使迫切地希望会见阿明，弄清楚以色列的伟大朋友乌干达总统为什么突然抛弃了以色列。难道他们没有尽力为他服务吗？阿明使以色列大使相信，他和卡扎菲上校的新友谊并不会改变他同以色列的关系，假如他不是迫切需要金钱的话。考虑到卡扎菲答应提供的援助，阿明不再为金钱问题担心了。

乌干达新闻部于2月23日宣布，由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成员马海迪少校率领的利比亚十人代表团正在访问坎帕拉，来安排经济合作，帮助穆斯林机构，兴建清真寺和学校，并为它



们提供教员和书本。2月28日，乌干达和利比亚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

三天之后，阿明召见了以色列大使，扬言要关闭以色列大使馆，理由是以色列教官玩忽职守并从事颠覆活动。（在此以前，阿明一直是高声赞扬以色列人的卓越工作的。）

在此后的三个星期内，反以色列运动越来越带恶意。3月22日，乌干达新闻部宣布，阿明总统不愿续订现有的乌干达和以色列军事训练协定，因为一家以色列报纸宣称，阿明由于国内的反对，取消了对埃及的访问。那篇文章暗示，总统决定这时留在国内，是因为爆发了严重的部族骚动。

3月14日，在阿明即将再次访问埃及和苏丹的前夕，乌干达临时宣布，阿明因某种疾病而取消这次访问。事实的真相是，尽管将军进行了某些外交冒险（或者由于这些冒险），他在国内再次面临着一场部族斗争的爆发。在他访问利比亚期间，驻在坎帕拉的马利尔机械化营发生了部族间的战斗；城里充满了谣言，说西尼罗河的阿鲁尔族和马迪族为一边同阿明的卡克瓦族为另一边发生了战斗。还有谣言说，在靠近坦桑尼亚边境，在穆图库拉的守卫部队中，甚至在边境哨所的部队中，都发生了类似的部族磨擦。阿明一有可能就亲自巡视乌干达所有的军事单位。就在这个时候，阿明宣布废除参谋总长一职，设立三个新的职位予以代替：陆军司令、空军司令和空降兵司令。这事进一步证明了阿明是担心有可能发生政变的。当他这位总统出国时，部队的行动由国防委员会集体控制。很明显，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在将军出国期间由一人获得控制权。

3月23日，即乌干达新闻部发布公告的第二天，以色列“坚决否认关于以色列干涉乌干达内政的任何指控，并对乌干达政府根据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来估计以色列的政策表示遗憾”。于是，以色列宣布决定调回所有在乌干达服务的以色列军事专家。

同一天，阿明作出答复，命令所有在地面部队里的以色列军事教官离去，并重复了“以色列人搞颠覆活动”的谴责，他要以色列情报人员“打点行装尽早回以色列去”。以色列于是召回了它所有的军事教官。

3月25日，阿明撤销了向以色列购买军火的订货单，中断了以色列各公司所承担的民用建设项目。3月27日，他命令所有以色列人员离开乌干达。3月30日，他下令关闭以色列大使馆，并指控以色列在乌干达保持了一支七百人的强大的“潜伏军队”。3月31日，以色列公布了在乌干达工作的以色列人的实际数字——一百四十九人；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共是四百七十名以色列人。4月8日，最后一名以色列人员离开了乌干达。

果尔达·梅厄夫人一定还记得1971年7月的那一天，当时她拒绝了阿明对鬼怪式飞机的要求，并对他想在印度洋获得港口的野心给予切实的劝告。现在，阿明把他以前的以色列朋友不光彩地撵出本国之后，就把乌干达的命运交托给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友谊，特别是交托给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而这个人甚至连其他阿拉伯领袖也认为是靠不住的。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阿明和英国政府之间新形成的关

系必须加以培养,特别是,就是在这种国内和国外的紧张气氛下,罗杰斯中校自1972年1月以来一直在等待着把英国军训小组作为一个有效的单位建立起来。1972年4月15日,英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协定终于签了字。4月28日,罗杰斯的军训小组全部到达,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他们于1972年7月1日开始对乌干达军队实施第一期教练课程。

在准备阶段的初期,乌干达人给罗杰斯和他的同事一切可能的协助。在金贾和坎帕拉,他们同乌干达军队的关系都是极好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奥博特-奥丰比会见了军训小组的全体成员并宴请了他们,他还特地去解决任何出现的问题。还有来自总统的友好的、鼓励性的信息。

但是这个蜜月阶段是短促的,罗杰斯中校注定了不会呆得太久。阿明对内同亚洲人、对外同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的纠纷,不久爆发为乌干达在将军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迄今所经历的最激烈的变化。

## 第九章 阿拉伯人来了,亚洲人走了

1972年4月到5月在乌干达是平静的月份。被誉为东非最喜欢传播闲话的城市坎帕拉,也没有出现新的谣言。甚至军队中的部族磨擦也似乎消逝了。阿明用他的一部分时间在坎帕拉国际饭店游泳池处理国家事务,另一部分时间则用于视察军队各单位。他劝士兵相信,只有部族和睦才能建成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一支强大的军队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乌干达。阿明心情舒畅,他不仅和他的士兵谈话,还拉手风琴,并且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4月19日,阿明宣布利比亚同意在乌干达修建两座一百张床位的医院,训练乌干达飞机驾驶员和技术人员,并为乌干达武装部队提供教官。可靠的看法认为,阿明已经从利比亚得到一千万英镑的援助,作为驱逐以色列人的报酬。但是还必须有人代替以色列的援助人员,阿明向埃及总统萨达特要求给他派专家、医生和工程师。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及时的,但是说萨达特正在考虑阿明总统的要求。

5月底,一个伊拉克代表团访问了坎帕拉,阿明提出要“成立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区域性军事联盟”,他还说“围绕着非洲大陆的海洋都属于非洲或阿拉伯国家”。5月,以伊斯兰世界联盟总会长为团长的一个沙特代表团来到了坎帕拉,要在坎帕拉成立一个最高伊斯兰宗教会议。

虽然阿明特别注意和乌干达的基督教社团的领导保持友好，一般的乌干达人——尤其是布干达人——都开始担心伊斯兰教将在他们的国家里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东非从来不曾有过军事独裁，阿明是第一个；现在人们的问题是：“伊迪会不会把乌干达变为东非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阿明热衷于促进伊斯兰教，在受过教育的乌干达人中导致了另一个引起分裂的问题。这是最不必要的，因为部族冲突从来也没有真正平静下来。

6月2日，阿明公开宣布他将出席非洲统一组织在拉巴特召开的会议，同时还要访问若干伊斯兰国家。他很明显地担心在他出国期间可能发生问题，因为他在托罗罗叮嘱他的部队要逮捕任何在他们之中制造混乱的军官——“就象1971年7月在我去英国期间所做的那样”。在其他地方，他长篇大论地谈到1971年7月的部族清洗，承认那次有一千名阿乔利人和兰戈人被杀。这次他丧失了他的农民本性；他重提一年前的血腥清洗，唤醒了至少是暂时处于潜伏状态的部族情绪。6月10日他在恩德培机场起飞前又一次提到7月事件，他说今后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假如他们那样干，他就回来把他们揪出来。

他在去拉巴特的途中曾在的黎波里停留。他在的黎波里发表了长篇讲话，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保证“在非洲各地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之后，他就同感到非常满意的卡扎菲上校一起去拉巴特。其他非洲国家首脑都很想会见这位大兵总统，因为他已经开始成为头条消息中的风云人物，他为了和他的穆斯林教友在一起而同以色列朋友断了交。

阿明表现得非常可爱和彬彬有礼——直到有一次会议，他出人意外地要给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表演如何用手帕把人闷死。“这就是我对茅茅惯用的办法，”他苦笑着说，“这是一种使身体适合玩橄榄球或足球的极好锻炼。”这次首脑会议的主人、摩洛哥哈桑国王对此却不感兴趣。

在阿明到达拉巴特的当天，他收到代理总统、国防部长查尔斯·奥博特-奥丰比的惊慌失措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去，因为卢格巴拉人正在准备打仗。他们是西尼罗省最强大的部族，并且他们能从苏丹南部边境的那一边获得他们远亲的帮助。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是阿明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的明星，正在兴高采烈，他拒绝回去。

在收到第三封电报后，阿明于6月18日乘飞机返抵乌干达。他立即开始对部队和军官讲话，因为从奥博特-奥丰比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卢格巴拉人不仅是在准备打仗，而且还准备推翻政府。卢格巴拉集团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看来可能是由于缺乏领导人物——6月9日两名有才干的卢格巴拉族军官安德里亚·阿达米上尉和他的一位同事的被谋杀，可能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阿明回国三十六小时之后又动身赴埃及，并从埃及开始了他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伊斯兰国家的访问。他同每一个国家都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在非洲进行合作来反对以色列，为推广伊斯兰教采取行动，以及增加乌干达棉花和咖啡的销售量。当他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他于2月份赴麦加朝圣，取得哈吉头衔），费萨尔国王授给他伊斯兰教的最高勋位。阿明于6月23日回到坎帕拉

后宣布，他在访问阿拉伯各国时，所得到的允诺的援助共达四千万英镑，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自他取得政权以来，他第一次就英国给乌干达援助的相对数量作了贬抑的评论。

7月6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到达坎帕拉，阿明让他们住在以色列大使的官邸里。这很合乎他的幽默感。7月底，他宣布同利比亚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卡扎菲上校给予乌干达三百四十万英镑的长期贷款，并答应每年购买一千一百六十万英镑的乌干达咖啡和棉花。<sup>①</sup>

8月4日，阿明赴东乌干达的托罗罗——乘直升飞机，这是他的习惯——给部队讲话。在他长篇的讲话中，他提起亚洲非公民的问题——自从2月底他向阿加·汗保证，凡是忠诚的伊斯迈尔教派都可以不用担心他们的前途以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谈过。他对阿加说，他和他的政府并不反对亚洲人，只是反对那些从事走私和囤积居奇等舞弊行为的亚洲人。他的目标在于加强绝对的宗教团结，假如要他给予任何帮助的话，他将通过穆斯林最高委员会而不是通过个别集团给予帮助。阿明赞扬伊斯迈尔教派比任何其他亚洲人更和乌干达打成一片。可是这次在托罗罗，可能出于一种冲动，他继续说道，“我将要求英国为所有在乌干达的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负责，因为他们破坏我国的经济。我要乌干达公民、特别是乌干达黑人来掌握经济，我要你们部队帮助我保卫我国不受破坏分子破坏。那些决心不要当地国籍的人，特别是那些鼓励舞弊的人，在乌干达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他直率地宣布，现在

---

<sup>①</sup> 以后阿明说利比亚将大量增购乌干达的咖啡和棉花，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数字。

必须强调乌干达人，特别是那些属于非洲种族的乌干达人都  
有工作可做。

白厅对此大为吃惊，阿明总统自己的外交部长瓦努梅·基  
贝迪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好路经伦敦，在前往加勒比海地区  
参加一次会议和到华盛顿去会见尼克松总统的途中。亚历  
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对阿明的发言是认真看待的（虽然其  
他观察者认为这不过是他又一次对士兵的感情的冲动，第二  
天就会忘记的）。英国发表了一个谨慎的声明，提出需要进行  
部长级的协商，并建议基贝迪先生在返回乌干达途经英国时  
访问外交和联邦关系部。

可是，阿明于8月5日在全国广播中以更加威胁的口吻  
重复了他的声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  
持有英国护照的乌干达亚洲人在三个月内、即11月8日前离  
开乌干达。他说受影响的约有八万亚洲人，这就是说，他把有  
乌干达籍的亚洲人也包括在必须离开之列。他说他将召见驻  
坎帕拉的英国高级专员理查德·斯莱特，要求他安排他们的  
离境。阿明还宣布他决定收买巨大的乌干达英美烟草公司的  
加工工厂和香烟厂，他声称，英美烟草公司象亚洲人社团一  
样，“正在破坏乌干达的经济”。

在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的董事长 R. P. 多布森先生说，  
这一宣布是晴天霹雳；他的地区经理帕特里克·希伊先生说，  
“这个很赚钱的工厂雇用了大约六百五十人，我们一向和阿明  
总统关系很好。”

接着就发生了英国和乌干达之间撕破了脸皮的相互指  
责。8月5日内政部政务次官戴维·莱恩先生在內政部怒气



冲冲地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很拥挤的海岛，入境移民必须并将继续严加控制。”对此阿明回答说：“亚洲人一直要用最小的投资攫取最大可能的利润。他们挤牛奶，但是不把牛喂饱以生产更多的奶。他们阻止非洲农民和商人学习他们的技术，他们用投机倒把、私藏通货、诈欺取财和类似的不法行为来破坏经济。”英国报界认为，阿明的决定是可怕的决定，不仅不人道，而且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坎帕拉一次摩托车比赛会上，阿明反驳说：“我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所有的亚洲人必须走。”在伦敦，外交部长瓦努梅·基贝迪同样坚决地声称，亚洲人必须走——“但乌干达籍公民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决心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到以下这些亚洲人：他们决定不要求国籍，但是乐意一年一年地呆下去，生活过得很好，把钱汇到国外，并阻碍我们乌干达人——特别是非洲人——在商业和工业上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倒霉的亚洲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去英国的入境凭证的数目并未增加。8月7日，哈克尼中央区的工党议员科林·戴维斯先生在下院建议增加东非亚洲人的入境名额和加快入境签证，他被一些保守党的后座议员嘘了下来。一个刺耳的声音说：“亚洲人在这里是不会幸福的，假如他们大量涌来的话……”亚历克爵士扬言要重新审查所有英国和乌干达的经济安排。在这愤激的时刻，阿明和利比亚巨富卡扎菲上校的新友谊可能暂时被忽略了。

次日，从坎帕拉传来了阿明的反驳：“我决心要在亚洲人的问题上给英国一点教训。我在采取行动之前得到了神的指导。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上帝告诉我要执行这次的驱逐。造

成目前形势的责任完全在于英国政府。”在宴请苏丹外交部长的午宴上他又说：“我准备牺牲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和我自己，以争取乌干达的利益。”宗教狂热现在已变成爆炸性局势的一个因素。

8月9日，阿明废除了所有非乌干达人（不仅仅是亚洲人）的入境和劳动许可证，而且立即生效。他邀请英国高级专员吃午饭，而斯莱特先生最近几天来正一直在迫切要求会见总统。但是这次午宴会见不是通常给予高级专员或大使的那种待遇。斯莱特先生被带到阿明指挥部的顶层，那里已经汇集了很多记者、电视记者，在部长们和文职官员中挤来挤去，喝着酒并相互开着玩笑。在场的还有焦急不安地挤在一起的十五名亚洲侨民团体领导人以及印度和孟加拉的高级专员、巴基斯坦大使。他们都挑选了咖喱鸡或冷鸡。在这种喧嚷忙乱中，斯莱特先生没有机会和阿明进行认真的谈话，他至多只能把首相爱德华·希思先生的一封信塞到乌干达总统的手中，并希望能使阿明了解这封信是来自英国首相的。

8月10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在伦敦广播说，“要在三个月内把公正地处理亚洲人的事办妥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公众是很公正的，我认为他们喜欢看到正义获得贯彻，假如我们有绝对的义务——正如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这样的义务——去接受那些具有英国公民资格的人们，我想公众是会很焦急的，我们也分担他们这种焦急的心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是希望见到对这些人、这些亚洲人的公正的处理。”

然而英国政府仍对阿明可能改变主张抱有希望。在外交

大臣广播的同一天，内政大臣要二十三家航空和轮船公司注意，不能把没有签证或没有联邦移民标准证件的亚洲人载入英国。不经过适当手续，亚洲人不得溜入英国。已经有几百人因无签证而被拘留，还有一批人在世界各地被推来推去而不得入境。

8月10日傍晚，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杰弗里·里彭飞往坎帕拉，去劝说阿明改变其驱逐亚洲人的想法。里彭以为他在第二天可以见到阿明，但是在他到达时，他接到通知说，“总统阁下的日程很紧，只能在8月15日星期二会见里彭先生。”

里彭先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英国对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承担责任，但是他有三点要求想要和总统讨论。第一，合理地延长他们离去的时间；第二，放宽允许留居乌干达者的类别——阿明允许医生、牙医、会计和少数其他专业人员留在乌干达；第三，对亚洲人提供适当补偿。

里彭先生虽然是英国政府的高级成员，却没有一位乌干达部长接见他；但是他和亚洲人的领导人举行了有益的讨论。他继续飞往内罗毕，但是没有能见到肯雅塔总统，因为他不在城内，到北面约一百哩、不到两小时汽车路程的地方去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总统因有一个不能失约的早就预定的约会而没有接见里彭先生，但是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和外交部长约翰·马莱塞拉和他谈了话。就在里彭先生将要返回伦敦时，他收到了阿明总统准备在8月14日星期一会见他的电报，正式的请柬已送往专员公署。因此，里彭先生就飞返坎帕拉，又等了三十六个小时，终于在恩德培的国家宫与阿明总统谈了话，并被招待午宴。里彭先生对谈话内容从未发表声

明，只说阿明对于所有持英国护照的亚洲人离境的最后限期没有作出让步，虽然他答应让他们在离去之前不受损害。将军在午宴上表达了他对女王的敬意，他说，“在我的办公室内有两帧女王陛下的照片。她有十六年是我的总司令，我深爱英国人民，但是我不喜欢英国的某些政策。”

至此气氛有了好转，但是好转并不持久。两天之后，外交部长瓦努梅·基贝迪在华盛顿发表了严厉的讲话。<sup>①</sup>他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知道了里彭先生的访问，十分恼火。因此他谴责英国进行“经济勒索”，对乌干达采取狂妄自大和侮辱性行为。基贝迪说，“由于英国人狂妄自大，不愿增加亚洲人入境签证的数目，乌干达决心要教训他们。”

于是阿明决定进一步作出努力：8月17日取消了对专业人员的豁免；警告乌干达公民说要检查他们的证件，因为自称是乌干达公民的人比可能拥有这一身份的人要多得多。这个威胁使亚洲人更加惊慌。最后，在8月19日阿明宣布他要驱逐所有的亚洲人，不管他们是英国籍、乌干达籍、肯尼亚籍还是坦桑尼亚籍。

驱逐乌干达籍亚洲人，是很多乌干达人难于接受的过火行动。麦克雷雷大学学生起草了措词强硬的备忘录，抗议这种非正义行为；在备忘录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基西姆巴·马西科。（坦桑尼亚入侵后不久他就失踪，坎帕拉谣传他被军队杀害了。）麦克雷雷大学的教职员也表示了意见，副校长弗兰克·卡拉马祖发表了一个勇敢的声明，他也在

---

<sup>①</sup> 基贝迪当时在华盛顿向两个美国人尼古拉斯·施特罗和罗伯特·西德尔的家属提供赔偿，他们是于1971年在姆巴拉拉兵营被害的。

坦桑尼亚入侵后失踪了。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恩祖布加阁下宣布，他不仅不同意驱逐乌干达籍亚洲人，而且不同意所采用的清除英国护照持有者的方法。由于阿明总统以前曾宣布他得到基督教会的支持，这个声明使他非常恼火。他把大主教置于警察监视之下，扬言要把他解职，并且说，“我只要花二十分钟就可以找到代替你的人。”<sup>①</sup>

然后，这个不可预测的阿明又一次做出了一件意外的事：8月22日他在宴请苏丹外交部长曼苏尔·哈立德的午宴上宣布，关于驱逐乌干达籍亚洲人一事，他已改变了主意，只要他们的文件完整，欢迎他们留下。这种主张的突然改变有一个有趣的解释。伊恩·格雷厄姆少校是所有英国军官中与伊迪·阿明最亲近的。他在乌干达服役了十七年，能说一口标准的斯瓦希利语，有一段时间甚至与阿明合住一个帐篷。将军提到他时，也称他为最亲密的朋友。格雷厄姆少校已退休回英国，阿明对亚洲人、特别是乌籍亚洲公民的处理使他大为吃惊，他主动地飞往乌干达，并于8月20日同他的老朋友伊迪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讨论。格雷厄姆少校说话没有吞吞吐吐，而是对伊迪大嚷大叫，说他对他自己公民的所作所为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伊迪接受了伊恩·格雷厄姆的严厉批评，同意改变政策。他还向格雷厄姆少校透露，他和杰弗里·里彭的所谓谈话是“可怕的”，因为里彭所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这不是他用的

---

<sup>①</sup> 《新闻周刊》11月6日的报道，金贾的荷兰籍主教约瑟夫·维利盖尔斯“被捕后在马金迪军事监狱关了二十四小时，他在狱中被全身剥光，得不到吃喝”。

那种英语，阿明的基础英语与英国大臣的外交词令可能是相距太远了。但是格雷厄姆少校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翻译。他知道阿明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向一位英国大臣暴露他的英语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有失面子。

阿明答应他老朋友的每一件事，他都信守不渝。他甚至枪决了他自己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因为这个军官抢劫了一辆亚洲人的汽车，被当场逮住。早些时候，一些亚洲人根本不敢驾车行驶二十四哩路到恩德培机场，因为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坎帕拉和恩德培之间遭到抢劫和杀害，他们的汽车被“接收”，他们的尸首被抛在路上。虽然阿明总统不得不收回他自己的诺言，即每个亚洲人在离开乌干达时可以带走一千五百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可以收回其余的资金，但是那种抢劫杀人的事不再发生了。假如阿明不取消那个让步，乌干达就会真正破产。储备金只有二百八十万英镑，并且在这一年，国民格林德利银行、巴克莱银行和标准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头一次得向它们的总行借款，来为乌干达出口棉花、咖啡和进行铜的生产提供资金。

众所周知，英国空运亚洲人虽然开始时较慢，以后突然加快了速度，并且在11月8日的期限以前早已撤离完毕。有几个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和印度帮了忙，让一些亚洲人入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属于专业人员或技工。10月底，联合国处理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萨德鲁丁·汗亲王甚至还组织了对无国籍亚洲人的营救。

我们不得不令人悲叹地写下这样的记载，就是驱逐亚洲人的举动使伊迪·阿明·达达将军不仅在乌干达，而且在整

个东非，竟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好多非洲人认为，亚洲人是殖民时代的遗迹，早就该处理了。1963年，肯雅塔总统在得到邓肯·桑迪斯保证从肯尼亚撤走英籍亚洲人（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之前，一直拒绝在独立协定上签字。

阿明为什么选择1972年8月4日这一天下令驱逐所有非乌干达籍的亚洲人，人们对此有许多猜测。最不严肃的猜测是说一位亚洲女人不理睬他，阿明回答说，“我有四个老婆，她们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工夫去找别的女人。”有些牵强附会的猜测是，英国人没有满足他的武器要求，所以他实行报复。后者可能有点道理。然而最可能的解释是，阿明异常担心部族冲突和居民中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试图寻找一种统一乌干达的方法。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过奥博特。实行“节约的预算”，可能由于军事开支过多、缺乏资金而解雇文职人员，生活费用高涨，给予穆斯林以优越地位——所有这些问题都招致乌干达居民的忿懑，损害阿明的声望。排斥不得人心的亚洲人，可使一些人得到很多外快，他们将接收亚洲人的产业，占有其企业和店铺，这似乎是把乌干达人团结起来的一种有效办法。至于这种政策是否合乎道义，阿明将军对此显然毫无不安之感。

## 第十章 未遂的入侵

几个月以前到达的罗杰斯中校的军训小组，是由四名连长和十二名士官组成的。7月1日开始的第一期教程是关于连的指挥和训练。陆军司令弗朗西斯·南格韦索中校主持了教程的开幕式。

气氛极为融洽，只有一名当步兵学校（也在金贾）校长的军官反对过英国军训小组。8月25日第一期教程结束时，要求参加下一期的申请者名单超额三倍。有些指挥官向罗杰斯要求道：“你是否也能为我们办一期训练？”罗杰斯十分乐意扩展军训小组的工作以帮助较老的军官。只发生过一件事。9月8日，军训小组人员的一些妻子儿女由一名上士带领，乘两辆卡车去穆尔奇森瀑布动物园游玩。在归途中，他们的卡车被另一辆卡车所阻，从车中跳出两个手舞左轮手枪的平民。他们命令在第一辆车中的上士下车。他拒绝下车，就发生了争吵。这两个非洲人把他拉下了车，开始揍他，把他打倒在地。他们威胁妇女，如不照他们的吩咐去做，就要枪杀她们的孩子。上士设法重新控制了局面，并要求这两个人送他们到最近的军事哨所去，碰巧那就是马辛迪兵营。司令官穆罕默德·阿里斯中校（现为乌干达陆军副司令）看到这批英国人的证件和通行证，知道这些人是英国军训小组的成员和家属，就立刻向他们道歉并记录了关于经过情况的陈述。然后他派人



送上士去医治受伤的眼睛，并请每个人吃了午饭。

罗杰斯很忙，觉得他和他的军训小组工作搞得不错，因而没有注意一桩显然是在军事范围以外开展的新事件——这就是戴维·杰弗里斯·琼斯法官，一个脾气很大的、不妥协的威尔士人，根据阿明的命令，主持对两个美国人失踪事件的调查。尼古拉斯·施特罗和罗伯特·西德尔两人是于1971年7月在姆巴拉拉兵营失踪的。

阿明答应这位法官要惩罚罪犯，不管是谁，即使是他最好的军官。法官以他一贯的彻底精神进行工作，不久就以法定的身份控诉姆巴拉拉兵营的高级军官阻挠调查。有关的警察不是不愿意，就是吓得不敢回答他的询问。但是，在一个曾在姆巴拉拉兵营服役的军官逃往坦桑尼亚以后，查询工作出人意外地突破了沉默的阴谋。西尔弗·蒂希比卡少尉在他的宣誓供词中描述了这两个美国人是怎么死的：他们是被乱斧砍死的，尼古拉斯·施特罗是“因为太傲慢了”。他们的尸体被烧化了，残骸埋在附近的丛林里，以便日后再挖出来扔到河里去。他们的一辆汽车被焚烧之后弄到离坎帕拉西北二百五十哩的月亮山上，在荒凉的布兰加隘口推下了悬崖。一群小学生在那里发现了汽车，琼斯法官和他的法律助手根据车牌号码和部分的车身底盘确认这就是他们的那辆汽车。

事到如今，对于事情的经过，法官的心里已经很清楚。他在报告中写道：“显然，这两个美国人是死于非命的。他们实际上是被乌干达陆军的西姆巴营的人员杀害的。”应对此事负责的人计有：指挥官瓦里斯·阿里，一个由阿明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卡克瓦同族人；副指挥官赛义德·朱马少校，一个由

阿明硬塞进该营的前出租汽车司机；西尔弗·蒂希比卡少尉（已逃往坦桑尼亚）和斯蒂文·塔班。

杰弗里斯·琼斯法官接到许多无名电话，对他提出警告，如果他竟敢发表他的调查结果，那就干掉他。为此，他连忙悄悄动身去肯尼亚，但事先作了安排，等他离开乌干达之后，他的调查报告一定能够呈报给司法部长恩坎博·穆盖瓦先生。他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封辞职信，说明他要事后告辞，由海路返回威尔士。

多亏阿明发表了这份报告，但是据了解，他的朋友瓦里斯·阿里和赛义德·朱马并未受到任何处罚，更谈不到审讯杀人犯了。据说瓦里斯·阿里在发生谋杀案时并不在军营里，但他帮助掩盖事实真相，庇护凶手。

当阿明把担任乌干达公共关系学院院长长达十七年之久的迈克尔·戴维斯驱逐出境时，英国居民中间更加忧心忡忡。科林·利格姆在为《观察家报》新任记者马丁·梅雷迪思所写的一封简况介绍信里，把迈克尔·戴维斯列为“消息灵通人士”。梅雷迪思发出的报道使阿明很不高兴，因此他也被驱逐出境。有关迈克尔·戴维斯的怪事是，在六个月以前，英联邦事务部秘书长阿诺德·史密斯曾要他担任一项职务，戴维斯根据阿明的要求加以谢绝，将军为此把共和国勋章授给了他。戴维斯离去不久，他的一位好友、著名的法律事务所马扬贾-克拉克公司<sup>①</sup>的阿尼尔·克拉克，被保安人员——或者是冒充的保安人员——从家里绑架走了。在那个时候，有一

---

<sup>①</sup> 见本译文第 37 页。

些塞内加尔人、冈比亚人和塞拉利昂人因为犯了冒充保安人员的罪行而被捕。

但是所有这些都并没有影响罗杰斯和他的军训小组，甚至外交部宣布取消由英国警官训练乌干达警察的安排也没影响他们。8月26日星期六，阿明通知罗杰斯说，他想于8月28日星期一对参加训练的人讲话。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所有参加军训的四十名军官都找到并集中在金贾，等待总统讲话。伊迪讲得很好，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军事训练，他提到他在罗杰斯手下服役过，也讲到在肯尼亚北方边境地区的比赛中他的那个连队获得第一名的事迹。<sup>①</sup>他讲了近两个小时，从军事讲到政治问题，简要地说了一下重新组织各区的计划，最后，他愤怒地责骂坦桑尼亚和坦桑尼亚对乌干达领土的袭击。然后他视察了英国军训小组所用的教室和训练设施。前一天，阿明曾经在十九名年轻军官的毕业典礼上讲了话，他称赞英国军训小组，说他希望每个乌干达士兵都能接受军训小组的教程。

8月31日，罗杰斯请了一星期假，到内罗毕他的朋友那里去。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由于《每日镜报》的一篇文章，阿明显然发现了一项英国企图杀害他并对乌干达进行入侵的阴谋计划，此事将由英国军训小组领导，该小组每个成员都是间谍，对这个国家的情况都很熟悉。于是，阿明号召人民监视英国军训小组的成员，因为他们是潜在的入侵者。

根据罗杰斯的判断，处理这个荒谬控告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阿明冷静下来，采取比较理智的看法。因此，他就按原计

---

① 见本译文第17页。

划继续呆在肯尼亚，直到9月7日才返回金贾。他估计会在边界遇到麻烦，但是卫兵对他非常客气。他的汽车没有被跟踪，金贾看来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9月11日星期一，他去兵营，然后去坎帕拉陆军总部，要求会见总统。国防部长查尔斯·奥博特-奥丰比已经对此作了安排，会见确定在9月13日星期三。罗杰斯当着代理陆军司令的面向部长诉说了一批观光者在9月8日的遭遇。他们诚意地向他道了歉，并答应要严厉惩处罪犯。在这以后，阿明抛出了他的炸弹：晚上八点，乌干达电台宣布，英国军训小组应于9月17日星期五中午以前离开乌干达。

次日早晨就不准军训小组进入兵营。步兵学校校长，以前只有他经常捣乱，这时却感到很苦恼，向罗杰斯道歉说：“没有陆军司令部的命令，我无能为力”，意思是说他无法准许他们进入兵营。乌干达同事们对英国军官和士官们的离去表示伤心和诧异，尽可能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罗杰斯到陆军司令部，要求装运行李，要求在离开以前不受干扰地呆在宿营地，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他们派一名军官，带了一个杂役队和五辆大卡车，负责装运事宜。只疏忽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前来接管宿营地的乌干达士兵竟在清晨八点就来到了，这使太太们着了慌。但是，军训小组和家属在金贾旅馆吃了午饭，然后由政府出钱，让他们搬到坎帕拉国际饭店。朋友们在那里为他们举行了晚宴。最后用车把他们送到恩德培机场，一直送上飞机跑道，免除了一切海关手续，也不查询他们关于所携带的货币和购买的东西的问题。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使机场带有节日气氛，好象他们正在受到欢迎，而不是被撵走似的。随军训

小组来教乌干达人吹风笛的风笛少校、苏格兰边防军的吉姆·威尔逊，在飞机场上了吹起了风笛送他们走上飞机。他吹奏的曲调是《勇敢的苏格兰》。

临行前一天，罗杰斯得到消息，说阿明想要见他，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无法安排。他们起飞了二十分钟以后，罗杰斯接到阿明发来的无线电报说：“以罗杰斯为首的一行在乌干达期间所进行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逗留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祝他们一路平安，并准备在将来作为游客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忘记罗杰斯中校在我国期间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们全体人员在逗留期间为训练军官而作的一切努力。”

阿明在对新闻记者的发言中说：“我没有和英国军官争吵，也没有和英国在乌干达的公民争吵；我是和英国政府争吵。”

那么，为什么要驱逐英国军训小组呢？可能有三个原因，也许每个原因都是阿明在作出决定时的形成因素。首先，使阿明掌权的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不再是经过训练的军官，而是穿军官制服的其他身份的人，他们认为英国军官具有他们认为不应有的影响，他们对此不满，因而坚持要阿明把他们送走，他不得不听从。第二，罗杰斯和他的同事正在使人重新怀念旧式的军官，并根据这种形象来训练青年军官。从国防委员会的观点来看，这就包含着一种危险，即还活着的老军官（有些在改变以后经过大屠杀而幸存下来）可能重踞要津。最后，我们可以想象，阿明知道在坦桑尼亚边境正在酝酿着麻烦，他要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人离开，免得双方为难。

在英国军训小组动身的同一天，传来了坦桑尼亚军队入侵乌干达并占领基奥特拉、库库托和卡利西佐三城的消息。入侵者于9月17日凌晨在穆图库拉越境，打败了由五名警察和十名士兵组成的弱小的边防力量。他们进展很快，不久就到了离坎帕拉不到一百哩的地方。坦桑尼亚宣布，在任何边境地带都没有坦桑尼亚士兵，声明这是乌干达内部阿明的军队和自称为乌干达人民军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之间的战斗。这两个说法都与事实不符。

与此同时，阿明命令坦克开到坎帕拉的街上；五十二名英国公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连同各个欧洲籍的记者，都被抓了起来。所有英国主要报纸的记者，《卫报》的约翰·费尔霍尔、《每日电讯报》的克里斯托弗·芒尼恩、《每日快报》的约翰·哈里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唐纳德·麦卡林以及美联社的安德鲁·托奇，都被送进马金迪军事监狱。在坎帕拉流传着关于这个监狱内发生暴行的可怕谣言。这五名英国记者亲眼目睹一些确曾发生的暴行。阿明在这个时期犯了一些错误，这是其中最糟的一个——让负责的新闻记者亲眼看到他们怎样用大槌把“民族敌人”的脑袋砸碎。

但是，另一场意外的幸运不久就使这些暴行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这时，阿明还不知道奥博特策动的从坦桑尼亚入侵的计划出了毛病。入侵计划预定由蒂托·奥凯洛上校和戴维·奥伊莱-奥乔克中校<sup>①</sup>执行，后者是桑赫斯特<sup>②</sup>训练出来的军

---

① 他就是奥博特自新加坡打来电话，指示他去杀死阿明及其卡克瓦族人的那个军官，电话接错了，给忠于阿明的士官听到了。

② 桑赫斯特是英国的一个地方，英国著名的军事院校设在该地。——译者

官,以前一直在姆巴拉拉任指挥官,对地形非常熟悉。计划预定由九百多名持不同意见的乌干达人向坎帕拉推进。据奥博特认为,他们会得到一支强大的第五纵队——由心怀不满的乌干达人、受到屈辱的公务员和绝望的亚洲人组成——和那些出于种族原因反对阿明的士兵的自发支持。与此同时,一架东非航空公司的 DC-9 型飞机预定要从基利曼贾罗国际机场运输八十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去占领恩德培机场,并消灭阿明的空军。果然,9月15日清晨二时,三名非洲人就在机场守卫和控制塔守卫的鼻子底下从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劫持了一架东非航空公司的 DC-9 型飞机。其中一人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驾驶员,能够驾驶 DC-9 型飞机。但是当飞机接近基利曼贾罗的跑道时,他未能打开那个使轮子脱离防滑机件的闸,因此在降落时所有的轮子都卡住了,四个轮胎都爆炸了。在基利曼贾罗又没有后备轮胎,突击队因此未能起飞。这个行动就此完结。

这一不幸事件意味着那些在维多利亚湖附近徒步进入乌干达的入侵者失去了空中掩护,而阿明却仍保持着对恩德培和空军的控制。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游击队并未得到人民的支持,阿明的供应并未受到任何干扰。此时阿明是否知道有关 DC-9 型飞机的事件,我们还不清楚,但他想必已经断定,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应当向新朋友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求援。事实上,他已于9月14日提出要求,说明存在着英国人和以色列人协同坦桑尼亚人入侵的危险。卡扎菲答复说,只有当入侵真正发生时才派支援部队。但是为了缓和他的拒绝,他提出承担三百万美元的贷款,来顶替美国参议院因阿明“亲希

特勒”的电报(见第 182 页,本译文 130 页)而搁置的贷款。但是现在入侵已成为事实,情况就不同了。

卡扎菲上校信守诺言,派遣五架美制赫尔克里士式运输机,载有三百九十九名“壮健的利比亚突击队员”和足够的武器装备。阿明知道利比亚的援兵已经出动以后,便轰炸维多利亚湖畔的布科巴城,在坦桑尼亚引起了惊慌。很明显,尼雷尔曾经准许乌干达游击队在坦桑尼亚进行训练,并从坦桑尼亚的领土上发动侵袭。他没有进攻性空军,他的军队驻在莫桑比克边界。尼雷尔最不希望把他的军队北移。我们现在只能这样估计,他和他的朋友奥博特一样,幻想游击队将在乌干达受到支持。不过,如果 DC-9 型飞机把八十名突击队员运到了恩德培,占领了机场,摧毁了(或截获了)阿明的空军,其结果就可能很不相同。

9 月 19 日的情况是,在入侵四十八小时以后,奥博特的军队被打败了。阿明知道这一点,现在他开始清算旧账。9 月 17 日就动手实行大逮捕。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震惊的,要算是逮捕审判长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了。他是个极有名望的穆干达人,当过第一任首席部长。他被上了手铐,从高等法院里拖了出去,扯掉了领带,丢掉了鞋子。别人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阿明发誓说军队与此事无关,甚至向记者招待会担保说,“我们正在寻找审判长”,但在坎帕拉许多人相信是他下令逮捕基瓦努卡的,还可能已经把他处决了。原因在于审判长敢于批评阿明的政权。9 月 17 日,一个被逮捕的英国商人唐纳德·斯图尔特由于申请人身保护而被带到审判长的面前。基瓦努卡听说斯图尔特从 9 月 7 日以来就在没有受



到控告的情况下被关在监狱里，便立即把他释放，并说：“你能出去，就该满意了，别人还没有这么走运呢。”阿明对基瓦努卡的大胆评论极为恼火。麦克雷雷大学副校长弗兰克·卡拉穆佐也是一个思想开明、有高等文化的人，他也在这个时候不见了。乌干达银行前行长约瑟夫·穆比鲁也同样不见了。前内政部长巴兹尔·巴塔林加亚和安科累族最高酋长内凯马·巴纳穆卡的遭遇也是一样。这些人中有几个是乌干达知识阶层的优秀分子，刚好都是罗马天主教徒。<sup>①</sup>

阿明不难就军事形势作出估计。他知道尼雷尔曾经答应支持奥博特的个人事业，但他也知道尼雷尔的部队不能离开邻近莫桑比克的南方边界驻地，因为他们要在那里支援反抗葡萄牙的自由战士。如果阿明要进一步证明尼雷尔支持奥博特重新掌权的企图，那么，与不幸的 DC-9 型飞机有关的一切就足以说明问题。坦桑尼亚不愿向东非航空公司、甚或东非民用航空指挥部透露它所知道的劫持 DC-9 型飞机的情况。事实上，坦桑尼亚拒绝以任何方式协助调查，虽然修理飞机就花费了东非航空公司六千英镑。

阿明在等待卡扎菲的期间，又轰炸了姆万扎和穆索马——尼雷尔就是在该城附近长大的，它也是尼雷尔的妻子们的家乡。尼雷尔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控诉，但他没有得到热情的答复。阿明的回答是：“我要命令乌干达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

<sup>①</sup> 《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旅长……被告知说，如果他再走近一个军事基地，就杀掉他。金贾的步兵兵营的两个上尉，由于排值勤表时照顾信天主教的士兵星期日做礼拜，被枪决了。据传出来的消息，军队中的基督徒如不改变信仰就必须退伍。”

摧毁坦桑尼亚的兵营，因为敌人正在那里策划另一次的入侵。<sup>①</sup>尼雷尔和他的朋友奥博特训练出了象任何游击队一样善战的游击队；他们在英国、坦桑尼亚和以色列部队的支持下入侵了乌干达，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平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在他们能够进入我国以前就给予痛击。”他下令轰炸更多的坦桑尼亚城市。他一定知道，整个非洲也知道，坦桑尼亚人民由于他们的领导人不能回击而极为失望。他们甚至说，既然坦桑尼亚没有空军，而阿明倒有空军，尼雷尔本来就不应该鼓励发动入侵。

接着，阿明遇到了另一件意外事故。利比亚的飞机，载着突击队员践约起飞，在开罗加油，然后在苏丹的上空满怀信心地向乌干达飞去。这时，尼迈里总统强迫它们降落，没收了武器，命令它们飞回基地。苏丹严守中立，坚决不同意它们飞越国境。卡扎菲上校非常恼火，骂尼迈里是叛徒、心怀恶意的家伙和其他一些不堪入耳的名称。他还给尼迈里打了一个电报说：“愿上帝宽恕你……”与此同时，他那五架巨型运输机卸掉了武器，重又起飞。无论如何，它们第二天终于在恩德培出现了。这是1972年9月22日的事。不十分知道它们走的是那条航线。一种说法是，当苏丹护航人员离机以后，它们拐了一个大弯，低空飞行——为了避免雷达——毕竟还是通过苏丹领空飞到了乌干达。另一种说法是，乍得的托姆巴巴耶总统和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总统对于飞越他们领空的事是较为通融的，他们比尼迈里（他现在正从好几个西方国家得到援助）

---

<sup>①</sup> 这些兵营位于莫罗戈罗和巴加莫约。

更需要卡扎菲的慷慨赠款。蒙博托总统也乐于对飞越扎伊尔领空的飞机眼开眼闭。

事到如今，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很有可能直接冲突起来，其他非洲领导人由于那两位总统缺乏涵养，越来越感到为难，因为那种行径只能使经常来自罗得西亚和南非的诽谤言论显得振振有词。非洲统一组织派新上任的秘书长恩佐·埃坎加基前往内罗毕和肯雅塔会谈，索马里外长奥马尔·阿特赫访问坎帕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向尼雷尔和阿明递交了巴雷总统的私人信件。蒙博托总统运用了他的影响，海尔·塞拉西皇帝从中牵了线，最后是非洲老政治家肯雅塔讲了一番尼雷尔和阿明都不能不予理睬的话。

当利比亚飞机被扣留在喀土穆时，阿明曾同意暂时停火。如果尼雷尔从边界撤军，他同意停止轰炸坦桑尼亚城镇。但当利比亚飞机终于抵达时，阿明的地位较前增强了，他利用这事在心理上产生的有利影响，让坦桑尼亚代表团在摩加迪沙干等了四天，然后瓦努梅·基贝迪才姗姗来迟，宣布阿明同意签订正式的和平协议。索马里人为了努力使阿明和尼雷尔凑合在一起，特意邀请他们两位参加10月21日的革命纪念庆祝会。这时，阿明对他的胜利和他的强有力的地位很有把握，准时到来，发现自己和尼雷尔坐在同一座台上，彼此只隔三个座位。坦桑尼亚总统仍然不愿同阿明握手，并匆忙离开看台，乘车到摩加迪沙机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

下一步的事态发展是，阿明把他的怒火发泄在不幸的亚洲人侨民的身上。第一，他坚持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由东非航空公司运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东非航空公司没有如

此大规模的空运设备。同时，他命令所有办过手续、取得迁出证明的人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乌干达。蒙博托总统访问坎帕拉之后，治安有所改进，加上英国的积极合作，这一艰难的任务终于在原定期限内顺利完成。

阿明根除有关亚洲人的问题，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在这件事情办妥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外国的、即主要是英国的茶叶种植园主。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在乌干达的英国人大概有七千名，共约占有价值二千七百万英镑的财产。11月6日，阿明总统召见代理英国高级专员约翰·亨宁斯先生，要他提供有关在乌干达拥有农场和私人公司的所有英国公民及其家属的详细情况。亨宁斯先生回答说，他准备要求所有英国公民到高级专员公署进行登记，登记以后他就可以向总统提供详细情况。阿明于是告诉亨宁斯先生，他要在11月20日会见所有在乌干达拥有农场的英国人代表。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极重要的会见。他向亨宁斯先生保证，英国人的农场不会收归国有，但他将要求农场主把农场卖给乌干达人。到1月份为止，一切都将由乌干达人来经营管理。

在乌干达的非洲人中，几乎没有人有足够的钱真正能按市场价格购买英国人的农场和企业。

阿明向亨宁斯先生保证，当乌干达的亚洲人问题和英国农场主问题得到解决，乌干达和英国的关系将空前改善。他说，那时他将写信给英国政府，要求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将解释他政府的政策，并同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共饮香槟。他还赞扬希思先生，称他是“一个少有的政治家”，象他阿

明一样,经历了许多困难。阿明说,“如果希思先生访问乌干达,我将给他极高的荣誉。”他把希思同丘吉尔相比,因为丘吉尔统治英国的时候正逢它经受轰炸,“虽然丘吉尔没有受到政治问题的干扰”。

就在第二天,11月7日,阿明在纪念穆斯林的伊迪·乌尔·菲特雷的宴会上,发表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讲话。他说,“把非公民的亚洲人驱逐出乌干达,仅仅是我们所宣布的这场战争的第一次战役。我们已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现在我们必须进入第二次战役——这次战役对乌干达全体人民来说,是要下定决心克服他们可能会经历到的任何暂时的困难。”

要在乌干达找到任何会干电力修理活的人已经变得日益困难,也没有人会干从建筑房屋到修理锁等十多种手艺活,一个好的亚洲“芬迪”(技工)却能干这些活,这种人几乎干什么活都行。亚洲人临走时付给他们的乌干达非洲佣人一个月的额外工资,但等钱用完以后,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乌干达非洲人就要失业,此外还有几千名职员、店员、加油站工人、鞋匠助手等也是如此。还应该提一下医院,有些医院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职工,阿明现已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去招募医生和护士。的确,这些暂时的不便可能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期。

在作者写本书的时候,又出现一种平静的局面,因为阿明正在为费萨尔国王的访问作准备。阿明将恢复他的彬彬有礼、安详沉静的本性,俨然象一个他在内心深处很羡慕的英国指挥官那样。几天以后,他又将变成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打算——并且决定——把一切外国人赶出乌干达。他梦想乌干达最终将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他曾发誓,乌干达

将成为一个纯黑人的乌干达。

毋庸置疑，驱逐亚洲人的举动大大提高了阿明在群众中的威望；他击退“一个敌对世界”的入侵这一件事加强了他的势力；他的军队对他保持忠诚——他能够把它说成是拯救国家的手段，说成是全国统一与和平的中心。巴干达人已经从迷梦中觉醒过来，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担心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增长，许多乌干达知识分子对军事独裁政权所做的许多事情感到羞愧——这一切在目前并没有什么关系。阿明现正高高在上，并从他那些富有石油的阿拉伯朋友已经提供或者答应提供的款项上取得信心。

## 后 记

### 对伊迪·阿明的评价

因为本书必须付印，<sup>①</sup>关于伊迪·阿明的狂风暴雨般的开头两年的故事到此必须结束。他以后究竟如何，他究竟将给乌干达带来什么，只能猜测一番。有许多可能性，其中包括这种可能，即他将成功地贯彻他的政策，使乌干达成为第一个完全由黑非洲人自己掌握的非洲国家。如果阿明还有其他梦想——他说他的一切梦想都能实现——他可能知道他的前途。

然而，关于阿明的个性还可以简单地说几点最后的意见。不论他会进行什么新的冒险，他的个性看来不可能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他的运气和本能已经把他带得很远了——从西尼罗省的一座草屋到恩德培的国家宫，比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所经历的路程都长得多，因为这不仅是长途跋涉的路程，而且也是经历很长时间的路程——仿佛是经过了几个世纪似的。

伊迪·阿明出生于一个边远的部族，但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族中所有的成员都意识到这一点。卡克瓦族有许多世纪同外界没有接触，它的生活条件能使现代世界联

---

<sup>①</sup> 1972年11月9日。

想起石器时代来。阿明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对此很感自豪。伊迪参加英国非洲步枪队后，证明他比他的班里、连里、最后是团里的任何人都强悍。当他成为乌干达轻量级拳击冠军时，他意识到他是在身体方面全国最强壮的一个。这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自豪感。

伊迪·阿明总是说，英国的军队训练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值得自豪的军人。他希望在军队中发迹，并努力求其实现。甚至在殖民地时代，他就步步升职，虽然他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英国的军事训练培养了他的领导才能，这种才能在1964年兵变时受到考验，并使他不断得到提升，一直升到乌干达陆军的最高职位。阿明的英国朋友们认为，如果他的经历仅限于职业军人的经历，如果时代不是那么充满着暴风骤雨，如果他能结交训练有素的军官同事，从而不断地受到教益，他就会成为非洲最优秀的指挥官。

随同罗纳德·穆泰比王子赴坎帕拉参加卡巴卡葬礼的罗纳德·欧文上尉大部分时间都和阿明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阿明的彬彬有礼和体贴周到。每当有什么事搞得不十分妥善，或者例如警察太粗鲁时，将军就以低沉平静的语调发出指示。他会对他的副官说，“弗朗西斯，请你告诉我，中国大使是否参加葬礼？”“弗朗西斯，请叮嘱警长，态度要温和一点。”“弗朗西斯，请注意卫队是否已经吃上晚饭。”罗纳德·欧文曾任英国近卫步兵团上尉，据他看来，阿明具有一个英国指挥官的风度，再加上他本人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

但是，阿明不仅是乌干达军队的总司令，他过去是、现在



仍然是乌干达的总统。对于这种地位，英国非洲步枪队的训练所能给他的准备是不够的。就象一个在独立以前对伊迪很了解的英国高级军官所说的，“他有一半能象任何一个英国军官那样行动，但他还有未经驯服的另一半，一有机会这一半就会冒出头来。”当他已是一个军官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了搜集非法武器的任务，他把所有的非法武器都缴来了，但却发生了打断人们骨头的事。他在处理图尔卡纳劫牛犯时，就出现了三具尸体。在上述两件事中，阿明均因缺乏证据而被宣告无罪。当他根据奥博特的命令在刚果建立训练营时，传说有两名部族人在鲁温佐里山区被枪杀。这次没有进行调查，因此这个传说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但是，甚至在他的英国军官朋友们的头脑里都毫无怀疑，阿明在上述三件事情中都“使用了过分的暴力”。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他在执行决定时就好象在战时进行军事活动一样。

更往后来，他在对付乌干达军队里的“敌人”和某些文职人员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是那些作为朋友和伙伴而了解他的人所几乎不敢相信的。但是穆图库拉的血洗和坦桑尼亚入侵后相当数量军人的失踪，以及审判长、麦克雷雷大学副校长、乌干达银行前行长、一位前内务部长等颇有名望的文职人员的失踪，都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到的不过是其中的少数罢了。

对于一个具有西方头脑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往往是不可思议的，除非在战时。但是我们的十四或十五世纪的祖先比起我们自己来却和阿明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在五百年前的欧洲，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有权势的暴君能

够泰然自若地毁灭他手下的受害者。我们的十五世纪的祖先也会理解阿明的浓厚的宗教信念，虽然他是个穆斯林。宗教在他的一生中起了中心的作用，他不仅是一个信仰者，而且还认为上帝在他这一边，指导着他每天的方针政策。这听起来似乎象是梦幻，但是在象阿明这样一个天真的人的心目中，这就是力量的源泉。此外，宗教是唯一约束他的骄傲和野心的因素。他真心实意地宣布：“我随时准备为乌干达牺牲生命，如果我的死能使乌干达繁荣强大的话，我乐于死去。”

阿明在 1971 年 4 月和罗纳德·穆泰比王子第一次谈话时，对他的宗教信念作了有趣的说明。王子和欧文上尉才到乌干达，他们进入恩德培国家宫仅仅半个小时，将军就冲了进去。他毫不浪费时间，对罗纳德王子说：“我要你了解，奥博特正在尽最大努力要谋杀我。我的保卫措施是不错的，但在你父亲的葬礼期间，我必须站在前面，而你必须站在我旁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子弹打中我，我是不怕死的，我将去见真主。但我要你了解，一颗对我发射的子弹可能杀死你。我希望你祈祷，并为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一个深于世故的人是不会以这种表达方式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说话的。事实的经过是，罗纳德王子很注意地听着，将军一走，他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呆了足有两个小时。过了很久以后，欧文上尉问他那时他在干些什么。他回答说，“我只是坐着想，然后我理解到，象我这样的人必须大胆地面对这种情况。”如所周知，在与卡巴卡葬礼有关的所有典礼中，或以后在将军把王子介绍给布干达长老们时，都没发生什么事。但是阿明的话却在卡巴卡的儿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

痕迹。

阿明的悲剧在于：他所上升到地位不仅他对之毫无准备，而且带来了他还来不及去理解的各种日常问题。他有一个清晰的幻想——使乌干达完全由黑非洲人控制，并改善它的内陆国家的地位。现在还很难估计，由于他驱逐英国籍亚洲人并把乌干达籍亚洲人放逐到边远村落，乌干达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能够经营“杜卡”和小企业的非洲人是有的，但在现阶段，懂得具有国际联系的大企业的错综复杂情况的人几乎还没有。如果阿明的富有石油的朋友肯给他款项，他就可以——象尼雷尔一样——雇用有经验的人来管理银行、工厂、进出口贸易和开发蕴藏丰富的本国资源。

象卡扎菲那样的富有石油的阿拉伯统治者，愿意在非洲心脏地带保持一个依赖别人施恩的穆斯林，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一直愿意支付他的开支。这使阿明能够赶走亚洲人，赶走在乌干达的英国和希腊种植园主和旅馆老板。同阿拉伯统治者的这种有利可图的友谊究竟会维持多久，目前还不能知道，但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和科威特的国家元首也在津贴阿明，他在最近期间不会破产。当他下令驱逐以色列人时，他还在他们离乌前给几个人打了电话，对他们所做的优良工作表示感谢。阿明也要在罗杰斯中校离开前同他见一次面，但由于时间紧迫，他象前面一章所提到的那样，给飞机上的罗杰斯拍发了热情洋溢的表示感激的电报。伊迪有可能把一些乌干达亚洲人请回去——当他那古怪的良心或经济上的必要性可能有此要求的时候。具有乌干达公民身份的亚洲人是他的俘虏，只能听他的摆布，没有选择的余地。

许多人对于阿明在外交政策上态度多变，感到迷惑不解。他在处理同南非的关系方面肯定表现出了他的天真无知。但是，他解雇以色列人这一举动不管多么忘恩负义和令人遗憾（在国际政策方面，除了阿明以外，许多人也被冠以上述词句），从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援助来看，却暂时为乌干达赢得了报酬。他的驱逐亚洲人之举使他不仅在乌干达而且在东非普遍受到欢迎，如果无视这一事实，那将是很不现实的。三千二百万普通非洲人，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保留意见，在这一问题上却把阿明看成英雄。东非住有许多亚洲人，这是大英帝国的遗产之一，很多非洲人感到这一现象应随帝国政权的消逝而消逝。这件事过去未能实现，现在阿明将军居然能将它完成，他们感到高兴。肯雅塔总统对于任何可能干扰肯尼亚振兴经济的事都感到担心，因此对于阿明驱逐亚洲人而使局势不稳的做法很不愉快，因为舆论可能迫使肯雅塔自己也采取一些类似的方式与之竞争。但普通非洲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从一个乌干达人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灾难莫过于阿明完全不懂井井有条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对待他的部长们和文职官员就象十九世纪一个执行军事训练任务的中士对待一排新兵一样。在坎帕拉有人坚信，当他的财政部长带来不受欢迎的消息时，阿明打了他一记耳光，但这位部长却没有辞职。他们并不否认，在9月12日，当阿明口授致瓦尔德海姆博士的“希特勒”式的电报（抄件送果尔达·梅厄夫人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时，乌干达外交部首脑保罗·埃蒂安格居然不敢告诉他电报将传为国际丑闻。

其中最要不得的一段是这样写的：“以色列人是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应当把他们从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彻底赶出去，因为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而不是那些被英国带到那里去的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那些英国的恶棍们在世界各地他们过去据为殖民地的国家里乱划疆界，错误百出。德国是最合适的地方，在希特勒任总理和最高统帅时，他烧死了六百多万犹太人。这是因为希特勒和全体德国人民都知道，以色列人不是为世界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在德国土地上用煤气把以色列人活活烧死。全世界应该记得，巴勒斯坦人是在德国的帮助下，使奥林匹克村的那次行动得以实现的。”

保罗·埃蒂安格先生曾任乌干达驻英国的高级专员，但他无法制止阿明将该电报全文交给记者。反应非常强烈，因此阿明才同意既不把这个电文送交联合国，也不送给其他任何人。然而这时损失已经造成。现在无从肯定，阿明是否已经懂得什么是煤气室，是否已经了解这种暴行在世界各地造成多么大的恐怖。

尼日利亚记者彼得·埃纳海罗不仅是一位优秀作家，而且对他的非州同胞异常了解。他说过，“我遇见过一些人，他们自称曾在阿明夺权后仔细研究过他。他们深信他是这样一种人：在他开始处理棘手问题时，脑子里还是空空的。只有在他开始当众讲话时，解决问题的办法才突然充满他的头脑。很明显，他就立即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免得忘掉。然后，为了证明他对自己的信念并不缺乏勇气，他命令他的部长们执行‘我的政府的决定’。这就是几千亚洲人怎么会奉命在九十天

的期限内离开乌干达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也是阿明何以会口授那封电报，替阿拉伯朋友向瓦尔德海姆博士提出抗议的原因。这封电报所包含的惊人段落，在西方世界使他受到极大损害，虽然——说来可悲——在非洲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外，对他没有不良的影响。乌干达人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总统平易近人，征求他们的意见，秘书不在时他自己接电话，总是用一种他们都懂得的方式讲话，表达一些他们乐于倾听的内容。阿明在表达其同胞的恐惧和忧虑的能力方面，同伊诺克·鲍威尔很是相象。

最后，必须谈一谈阿明和尼雷尔的关系。尼雷尔对待阿明的态度使阿明作为一个男子汉、特别是作为一个军人的自尊心大受挫伤，关于这一点，任凭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分。尼雷尔顽固地拒绝与他会见，并拒绝和他同席而坐（如前章所述），这更加深了他的创痛。阿明的这种恼怒可以从尼雷尔批评他对亚洲人的政策以后他给这位坦桑尼亚总统的一封信里得到证明。（尼雷尔没有大批地驱逐亚洲人，但的确也用了同样粗暴和不很正派的办法毁了他们，这一点阿明似乎并没有察觉。）阿明在他的信里说：“我向你保证我非常爱你，如果你是一个女人，我会考虑把你娶来，虽然你已白发苍苍；但因为你是一个男人，这种希望就落空了。”在斯瓦希利语里，这种“提法”有双关含义，可以被解释成极大无礼。由于姆齐伊·肯雅塔的调解，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阿明给尼雷尔发去一份电报，对他让奥博特避难一事表示感谢。他说，尼雷尔的行动表明“我们非洲人能够照料自己人，即使迫于形势，他们只好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也不必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受帝国主义

思想的灌输。”尼雷尔没有答复。

我再一次会见伊迪·阿明将军是在1972年2月24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全非贸易博览会上。我和一位朋友坐在总统包厢旁边的席上，就近看到了一个精采的镜头。肯雅塔总统检阅了肯尼亚步枪队，他们的表演几乎可以和英国近卫营媲美。当他回到总统包厢时，他接见了由头等重要人物组成的贵宾：埃塞俄比亚皇帝、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干达总统以及其他许多人。坦桑尼亚由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代表。我惊奇地看到他被安排坐在阿明旁边（他曾以许多难听的名词骂过阿明）。阿明正处于情绪最温和的时刻，他微笑着向左右鞠躬，用明显的怡然自得的神态看着他那位矮小短壮的邻座，而卡瓦瓦却怒容满面，不予理睬。我感到这一次是乌干达胜过了坦桑尼亚。

开幕式结束以后，我遇到一位非洲朋友，他认识东非的所有领导人。他在总统包厢后面，也看到了阿明和卡瓦瓦的表演。这是在举行潘加莱记者招待会以后两周的事，在那次会议上，有十九名乌干达人向记者叙述了穆图库拉血洗的情况。我问那位肯尼亚朋友对阿明如何看法。

他回答说，“不要以为他疯了，不要以为他有自相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强悍的非洲军人，他的一举一动就象一个古代的最高酋长。不要小看他——他刚去过利比亚——事实上他去过两次——可以打赌，他保险会把以色列人撵走。到那个时候，他的富有石油的阿拉伯新朋友就会资助他。这是一项聪明的政策。只有上帝知道伊迪将怎样处理他

的亚洲人；他和我们这些人一样，是想赶走他们的。我可以肯定，只要牵涉到亚洲人，他是不会手软或照法律办事的。使伊迪气得发疯的是朱利叶斯(尼雷尔)不和他说话——但他的寿命可能比朱利叶斯来得长。我唯一确实相信的，是他尊敬英国军人。你们应该派一个准将而不是派文职官员到坎帕拉去当高级专员，这样就可能使伊迪获得好的印象。”

谈到这里，几个人过来打招呼，打断了我们的话头。终于我和这位朋友又谈了一会儿。他的最后的劝告是：“留心观察伊迪——要相信他的精明和运气。在非洲，只要有‘巴哈蒂亚蒙古’，<sup>①</sup>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就在这时刻，阿明将军向我们漫步走来，我的朋友又把我介绍给他。他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出于外交礼节，他假装还记得我们在古卢的会见。他的举止完美无疵，看着这位高大的黑将军满面笑容地对着我，看到他那贵族般的手和尖尖的十指，几乎不能令人相信，这位就是那个下令血洗穆图库拉的人。他走了以后，我把我的反应告诉我的非洲朋友。他摇摇头说，“你对非洲知道得很多，但你是那么一个地道的欧洲人，你仍然不能了解我们。你知道在布隆迪发生的事——也许有十万胡图族人被杀害，而不仅是几百名士兵——孕妇被开了膛，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小孩被撕成两半……”

我求他别说下去了。我对这些事太清楚了。

我的朋友取笑我说，“你看出你是多么带有欧洲性了吧？这是一个极古老但又极年青的大陆。如果你要对我们的发展

---

<sup>①</sup> 斯瓦希利语，意思是“上帝赐福”。



继续进行观察,你就必须习惯于你们欧洲从前也用过的办法。此外,你听到过一个叫做厄尔斯特<sup>①</sup>的地方没有?”

太阳照耀着,人们活跃地交谈着,博览会在一个有着树林、灌木丛和花卉的公园里布置得富丽堂皇。这里是非洲景色的一面,据我看来,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积极遗产。另一面,正在进行着血腥的政权争夺。在这场争夺战中,伊迪·阿明是主角之一,我们必须理解他的背景和他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只有时间——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弥平伊迪·阿明和我们西方世界之间的隔膜。但是,如果他被杀害或失踪的话,乌干达可能又会回到互相残杀的内战中去。不管你对阿明观感如何,到目前为止,在乌干达还没有一个能比他干得更好的人。伊迪·阿明·达达将军和他的部队是处在乌干达和刚果式的混乱之间。

---

<sup>①</sup> 厄尔斯特,系爱尔兰东北部地区的旧称。现在的北爱尔兰内还有原厄尔斯特的九个郡中东部六个郡。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英国至今面临着北爱尔兰问题(也有称之为厄尔斯特问题的)。从1169年起英王以受命于罗马教皇,讨伐天主教内的异端,开始了征服爱尔兰的战争。十七世纪初,英王没收了厄尔斯特区的民族的领土,赶走当地居民,建立了统治。历史上英王室曾多次对爱尔兰民族的反抗进行残酷的“讨伐”,并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在政治上、经济上对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极端歧视。1948年爱尔兰脱离英国本土成立了共和国,但该岛东北部仍属英国管辖,称为北爱尔兰。从此,英国的全称即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译者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